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学友文库

南北乱世

 **E-BOOK**
网络资源 电子图书

南北乱世

魏道武帝始末

世运多变，盛衰交替，自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后，华夏黎庶，又无宁日。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匈奴王刘聪攻破氏安，晋愍（音mǐn）帝司马邺出降，北方各少数民族首领蜂起，争分天下，遂有十六国政权的攻伐征战；江东则因淝水大战，阻住了前秦苻坚的南下锋芒，维持了东晋司马氏政权的百年残喘，从而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公元420年，刘裕南方建宋，是为永初元年；而此时鲜卑族拓跋珪早已统一了北方，建立了史称北魏的魏国政权。从此，长达169年的南北朝时期开始了。

公元386年，拓跋珪受族中部落首长推戴，即了代国王位，独掌大权。他任用汉族士人张兗为长史、许谦为右司马，指导政治，为表示不受晋朝封号，改代国为魏国，是为登国元年。执政伊始，重农息民，稳定政局，他在旧都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旗）一带锐意发展农业，随后推展到五原和稠阳塞外；同时，对过惯游牧生活、叛服无常的部落首长加以诱导。这些部落首长称为“大人”，他们不懂得服从一个固定国家国王指挥的好处。拓跋珪把征伐缴获来的俘虏和牲畜，依据战功大小分赏，让“大人”们尝到甜头。很快，魏国便成为坚强的好战集团，从登国三年（公元388年）起，拓跋珪先后攻取了东胡库莫奚、敕勒高车、回纥高车、南匈奴刘衡辰等部，获男女及杂畜四五百万，黄河河套地区各部纷纷归附，从而占据了广大肥沃牧地，国富兵强，准备南下中原。

登国十年（公元395年），魏军又在参合破（今内蒙凉城西南）大破后燕慕容宝军，虏敌5万，俘获文武将吏数千、器甲资财无数。次年，拓跋珪亲率大军45万攻后燕，取并州（今山西晋源）、出井陘（今河北井陘县），天兴元年（公元398年）终于打破后燕都城中山（今河北定县），统一了黄河以北的州郡。同年，魏国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次年拓跋珪宣布称帝，他就是魏道武帝。魏道武帝治国，除军事掠夺外，更依汉例，设立正规的政治机构，招揽人才、祭奉周孔；同时解散游牧部落，致力亲耕籍田、广兴产业，使经济日趋繁荣。

魏道武帝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为鲜卑贵族所不容，皇帝与贵族间的矛盾日见加剧，拓跋珪从此陷于难以解脱的困境。

魏道武帝心地残忍，疑心极重。在他的群臣中，最得信任的是张兗，这位堪称北魏第一谋士的人物向拓跋珪力荐中原名士崔暹，崔暹在拓跋珪率兵攻打后燕都城中山时，提出用桑椹补充军粮的办法，令民间广为征集，以抵租税，从而解决了大军缺粮的难题，取得攻城的胜利。对此，本应褒奖，可当时崔暹或许无意中饶舌，讲了一个典故，说古人认为鸣声极丑的鸚鸟，一旦吃了桑椹，就会吐音宛转动听。说完，还为自己博学而颇为得意。不料，拓跋珪听了很不舒服，认为崔暹故意讽刺鲜卑人不开化并怀恨在心。由于当时战事紧急，一时顾不了这些，尽管接受了崔暹的建议，而且确能奏效，但他对崔暹仍旧耿耿于怀，不久就借故杀了崔暹，并对他一向信任的张兗也以妄荐过失加以贬责，毫无宽厚可言。

攻打后燕慕容宝得胜之后，因嫌对方没有望风而降，竟大发脾气，并将5万俘虏在参合陂一次全部杀死，极度的残忍致使天下人士闻讯为之一惊。

从此，拓跋珪的军队每战必遇顽强抵抗，因为谁都不愿重蹈参合陂的覆

辙；而各地一些本愿归顺魏国的东晋官员也因害怕当崔逞第二而另投他方。种种教训，才使拓跋珪稍微收敛暴行，装出一些宽容姿态，而内心却感到十分压抑郁愤。

拓跋珪致力改造鲜卑旧俗，遭到保守势力的顽强反抗，皇帝与贵族关系十分紧张。对此，拓跋珪惊慌烦躁，不知所措，有时几天吃不下饭，彻夜不能入眠，常常自言自语、疑神疑鬼，总觉得满朝文武人人都有野心，宫中内侍个个皆怀恶意。他时时留意防范，只要发现稍有可疑的地方，哪怕是捕风捉影也一律加以击杀。天赐三年（公元406年）。他特地下诏道：“人皆以为汉高帝乃受命于天，其帝位并非争夺而来。今群臣亦应安分知足，谨守臣道，方可保禄于天年，流余庆于后世。”意思很明白，谁要保全身家性命，就不能反对他。事实上，要夺他帝位的人也确实存在，如鲜卑大臣穆崇、拓跋仪等，但大多数人还是支持他的，他这样一闹腾，反弄得满朝惶恐、人人自危了。

拓跋珪最后精神崩溃，卧病在床，经御医诊治，服了寒食散，反觉病情加重、以致神经错乱，如颜如狂，完全失去理智。结果被他的儿子拓跋绍所杀。

南朝刘裕称帝

晋安帝司马德宗隆安三年（公元399年），“五斗米道”道徒孙恩，乘东晋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和民众不断起义反抗的机会，从海岛聚众起事，先后攻破上虞、会稽，江浙民众纷纷响应，很快从1000多人发展到几十万人，他们以宗教为纽带，号称“长生人”，其中有许多亡命之徒，作战十分勇敢，但同时滥肆杀掠，具有很强的破坏力。

朝廷派谢琰、刘牢之率兵镇压，双方经过几十次激战，永兴元年（公元402年），在刘牢之的部将刘裕的攻击下，孙恩军彻底崩溃，孙恩投海自尽，残余部队由卢循率领，在沿海一带作乱，刘裕一面追剿，一面招降纳叛，壮大自己的力量。

就在朝廷全力对付孙恩、卢循的时候，以桓玄为盟主的藩镇，也乘机扩张势力。他先后吞并诸藩，占据了长江中游以西的广大地区，接着挥戈东下，一举攻破晋都建康（今南京市），元兴三年（公元404年），桓玄废了晋安帝，自立为国君，国号楚。

桓玄登基，变得更加骄奢昏淫，而这时刘裕已经羽翼丰满，他率兵来到军事重镇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西进京都，一举破城，灭了桓氏一族，恢复了晋安帝的帝位。这样，刘裕自然成了东晋的大功臣，并牢牢掌握着朝政大权。

刘裕出身破落的低级士族，小名寄奴。因家贫不能读书，从小务农，兼做樵夫、渔夫、小贩，又喜欢赌博，还曾为欠赌债被人绑在马桩上整治过。这种经历既使他懂得民众的苦处，又养成了他敢于冒险的性格。他凭着勇悍善战、屡立大功，从一个小军官爬到大将军的位置上，且治军严明，身先士卒，与当时普遍的腐败风气截然不同，因而深得民心。

刘裕掌握东晋实权后，为了取代司马氏，坐上皇帝宝座，更加蓄意树立自己的威望，从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开始，带兵北伐，进行了消灭割据势力的统一战争。他先后攻破南燕（今豫、鲁一带），杀了南燕王慕容超，

收复青州；南下击溃卢循，收复广州；攻克江陵，杀了割据者刘毅；力取成都，灭了割据者谯纵；直捣襄阳，赶跑了割据者司马休之。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东晋境内，全由刘裕势力统治了。

第二年，刘裕见后秦国皇帝姚兴已死，幼主姚泓继位，国内发生内乱，认为时机已到，便率领王镇恶、檀道济、沈田子等，兵分五路，水陆并进，大举攻伐后秦。

沈田子一路人马，绕道南阳，势如破竹，直逼后秦都城长安。后秦皇帝姚泓亲率重兵迎战。在长安东南，后秦几万兵将，将沈田子等1000余人围了个水泄不通，沈田子却毫不畏惧，他振臂高呼：“我们历尽千辛万险，今日已打到敌都城下，此时不拼，更待何时！”并带头向重围冲去，众将士一时群情激奋，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竟奇迹般把后秦大军冲杀得七零八落，把敌军赶进城内去了。

檀道济一路所到之处的守敌也望风而降，大军很快直抵洛阳。檀道济善于收买人心，不杀无辜，即使俘获的敌兵，也都释放回家，有效地瓦解了敌军，壮大了自己的队伍。

王镇恶一路，进入敌境，同样屡战屡胜，破虎牢关、栢谷坞，经浞池，会师洛阳。接着，攻打潼关要塞，被后秦守将姚绍挡住，王镇恶因军粮缺乏，只好驰告求援。

刘裕接到报告，急忙沿黄河往上游送粮，逆水重舟，行进缓慢。而北岸的北魏守军则虎视眈眈，不时便突袭一下，抢船劫粮，还杀了一些运粮士兵。刘裕只好先调兵解决魏军，粮船才得以运到潼关。可是，这一来二去，却耽误了不少时间。

幸亏王镇恶得到当地百姓的帮助，坚持到军粮运达。恰好这时姚绍病死，代守潼关的姚讚又得知刘裕兵到湖县（今河南老潼关东），知道大势将去，悄悄逃走了。

大军进潼关后，王镇恶率领水军，乘坐蒙冲小舰，从黄河入渭水，直达长安附近的渭桥。由于北方向来没什么舟楫，后秦军队见王镇恶的船舰外面没有人撑篙，却逆流猛进，吓得以为是天兵降临。

王镇恶带兵在渭桥上岸，饱餐一顿，又下令放开缆绳，任船舰随着渭水急流漂去，他指着长安城北门对兵士们说：“我们已经离家万里，打到敌国城下，眼下衣物粮食都随船顺流漂去，想回去是不可能的了，就是困在这里，无衣无食，也是死路一条。唯一的出路就是死战，攻进长安，立功受赏！怎么样？”众人齐声道：“行！”王镇恶见士气旺盛，当即冲在最前面，很快把守桥秦军冲得落花流水，又把出城接应的姚泓打了回去，晋军一鼓作气，攻陷长安。至此，姚泓投降，后秦宣告灭亡。

随后，刘裕大军也赶到长安，各路人马论功行赏。班师回朝前，刘裕派亲子刘义真和王镇恶、沈田子两将军一起守长安。没想到王、沈两员虎将互不买帐，刘义真又控制不住，晋军发生内讧，沈田子杀了王镇恶。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占据陕北、内蒙一带的夏国首领赫连勃勃，趁机发兵攻城，晋军抵挡不住，长安得而复失，只保得潼关以东地区。

尽管如此，这次北伐仍然是东晋百年来最辉煌的一次战绩，刘裕因功被封为宋王。两年后，刘裕完成了一系列兴利除弊的军事、政治措施后，认为东晋朝已没有存在必要了，于是，黄袍加身，废晋建宋，他就是宋武帝。

宋武帝刘裕从一个贫儿成为南方君王，除了政治、军事才能以外，与他

一些优良品质分不开。比如，他坐上皇位后，仍旧清简寡欲，事事严整有度，车马不加装饰，后宫不奏音乐，内府不藏财宝，甚至连床脚上的金钉也令人取下，换上铁钉。当下属献来光彩艳丽、价逾百金的虎魂枕时，他只取此枕可治刀伤的作用，敲碎了分给将士医治创伤；他患有热病和刀伤，需要睡在冷物上，有人献上石床，他却嫌奢侈耗费，下令毁掉，以免上行下效，不可收拾；女儿出嫁，嫁妆绝无锦绣金玉；日常回到家里，马上脱掉公服，只穿普通衣衫，脚下则拖双连齿木履。他喜欢逍遥散步，每次只带几个随从，从不要任何仪仗。刘裕不仅内外奉禁，处处节俭，还能不忘穷时，当年做工，种地的家什农具，一直保存在身边，至死没有改变。

自刘裕建立了统一南方的宋朝后不久，北魏也与日俱强，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了其它北方小国，于太延五年（公元439年）统一了北方，结束了五朝十六国的长期分裂局面，开始了维持日后一百多年的南北对峙格局的南北朝时期。

因时度势，国运日昌

北魏天赐六年（公元409年），魏道武帝被其子拓跋绍所杀，道武帝长子拓跋嗣又以忤逆子弑君父之大罪处死了拓跋绍，然后自己即了魏国帝位，他就是明元帝。

拓跋嗣为了解决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的矛盾，采取了调和的办法，命南平公长孙嵩等八大臣共听朝政，共议政事。“八公”参政后，矛盾对立的局面大为缓和，正当明元帝准备好好治理一番时，自然灾害又严重威胁着魏国。

当时魏国大地因连年霜旱不断，京畿之内饿殍遍地，朝野不宁。部分朝臣建议迁都邺城（今河南安阳市丰乐镇），以避灾凶，而汉族大臣崔浩、周澹则坚决反对，认为迁都害国，万不可行。他们分析形势，指出太行山以东广大地区的汉人至今仍称魏国为“牛毛之众”，以为鲜卑人畜众多，国强且富，不敢造次。如果一旦迁都，便极易暴露魏国眼下人稀粮缺、生计艰难的致命弱点，那不是伸出头来让人死揍吗？而主张迁都的官员则认为救命要紧，不迁都势必坐以待毙，如何能渡得难关？双方各执一辞，争论十分激烈。

明元帝觉得崔浩的忧虑很有道理，又恐百姓因饥生变不可收拾，所以委决难下。这时，崔浩提出用马奶和蔬菜充饥，可以熬到秋熟，总有一些收成，再用秋粮渡过难关，等到来春草生，一切便可迎刃而解。明元帝听从了崔浩的意见，决定依计行事，同时为防万一，又特地挑选出一批最穷困的鲜卑人移居到东部的定、相、冀等州去，责令当地汉民每户出租米50石来养活他们，以保证日后可以用这批人充作兵源。

魏国当时的外部形势也十分严峻，北方的柔然国日见强大，而且野心勃勃、觊觎魏国，魏国却只有招架之功，断无还手之力，甚至为确保京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的安全，后来，不得不筑长城两千余里，以求固守；南方的后秦也国势正盛，还占有黄河以南的州郡，对魏国虎视眈眈。明元帝采取隆基固本、内和外揖的政策以保天下，等待时机。

与此同时，南朝刘宋政权愈见强大，宋武帝北伐后秦，收复了黄河以南丧失的州郡，以争夺黄河以南沃地。由于天灾造成的经济困难，魏国用兵机会大大减少，而长期以掠夺征战为业的鲜卑人口与日俱增，大量穷困已极的国人，给明元帝的压力十分巨大，稍有不慎便会闹出内乱。

好不容易等到宋武帝永初三年（公元 422 年），南朝传来刘裕驾崩的消息，北魏明元帝大喜过望，打算趁宋朝因治国丧而无暇外顾之机，磨刀霍霍，准备立即大举渡河南侵，以转嫁危机、解脱困境。不料，大臣崔浩又出来极力劝阻，这次明元帝无论崔浩怎样据理力辩也听不进去了。鲜卑人野蛮好战、掠夺战性的热血在他周身沸腾，企图走出即位以来的重重难关，满足举国上下穷困国人的要求，使攻掠成为摆脱困境的大政方针。

明元帝挥师大举渡河南侵，其势有如饿虎扑食，然而宋军守将并不畏惧，双方经过多次浴血苦战，到第二年，北魏终于夺得了司州全部和兖州、豫州的大部分地区，占领了许多州镇，北魏举国上下，欢欣鼓舞。从此，南北朝长期对峙的形势开始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魏明元帝拓跋嗣踌躇满志之时，不料身染重疾、医卜无效，于北魏泰常八年（公元 423 年）冬十月病卒西宫，死时年仅 32 岁。

拓跋嗣死后，他的长子拓跋焘继位，这就是史称太武帝的魏国又一杰出人物，在他的统治下，魏国逐日强盛，武功达到最高峰，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战争，成为鲜卑族的光荣和骄傲。

魏宋争雄

正当刘裕广聚人才，力求富国强兵，准备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不料天命不永，只做了两年皇帝，就撒手归天去了。继承皇位的是太子刘义符，小名车兵，他就是宋少帝。刘义符武有勇力，文通音律，本当有所作为，可当他坐上皇位后，却做了些不该做的事，如恣意游乐及诛杀庐陵王刘义真就是例证。由于少帝“所为多乖失”，被皇太后揭发出来，并由辅政大臣尚书仆射傅亮、司空徐羨之和统军将军谢晦等动手，乘少帝在华林园观乐呼唱之时，突然下手，收了玉玺，先废为营阳王，随后便将他杀掉了，死时只有 19 岁，这年是景平二年（公元 424 年）。

取代少帝登上皇位的是他的三弟宜都王刘义隆，小名车儿，史称宋文帝，他身高 7 尺 5 寸，自幼聪慧，14 岁时就能听讼断狱，又博涉经史，显得颇有作为。

刘义隆即位后改元元嘉，他恐怕重蹈少帝覆辙，下手除掉了傅亮等一批辅政大臣，亲自掌握了朝权，然后一门心思治理国政，体恤民情，解除冤狱，因而深得民心。他特别重视发展经济、弘扬文化，注意选拔贤才。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宋朝国力大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气象。

与此同时，北方的魏太武帝同样治国有术，兵强马壮。他曾趁宋朝国丧之际，举兵南下，占领了宋朝的司、青、兖、豫四州的大部分土地，把势力扩展到洛阳和淮河流域。

面对北魏的逼人气焰，强大的宋文帝再也忍不下这口气了。元嘉二十六年（公元 449 年），宋朝君臣拟议北伐，彭城太守王玄谟更是踊跃，力主马上出兵，认为宋军一到，北魏必亡无疑。宋文帝很高兴，他要仿效汉武帝派霍去病击溃匈奴，在漠北大山狼居胥上，筑坛祭天以誌胜利的故事，当即准备发兵攻打北魏。

南北两强，谁都想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吞并对方，爆发战争势所必然，只看哪边先动手了。

次年，魏太武帝拓跋焘亲率 10 万步骑攻打宋朝悬瓠（音 hù）城（今河南上蔡县东），宋朝守将陈宪坚守苦战，硬是没让魏军攻破城池，拓跋焘由于兵员损失惨重，只好暂时罢手。接着，宋文帝发兵，分水陆几路开始北伐，魏太武帝当然不甘示弱，带着号称百万的雄兵，离开平城，南渡黄河前来应战。宋军主力在王玄漠的率领下与魏军主力在滑台（今河北省滑县）交战，这一仗由于宋文帝盲目自信，加上王玄漠的指挥不力，结果惨遭败北。倒是宋将薛安都能干，大破北魏于洛州，收复了陕中和潼关。

反过来，魏军则乘胜攻打彭城，宋文帝之子、徐州刺史刘骏决心坚守，迫使拓跋焘移兵南下江苏，锋芒指向盱眙（音 xū yí）。盱眙是座小城，可是战略地位却十分重要，守城的是太守沈璞，此人很有见识，早在他履任之初，就忙着深挖沟濠，坚筑城墙，广聚军粮，作好了防守的充分准备，随时准备报效朝廷。果然不出他所料，一场恶战即将爆发。大战前夕，奉命北救彭城的辅国将军臧质，因兵败退到盱眙，这时，他身边只剩下 100 人马，沈璞将他迎进城内共同守城。

由于拓跋焘见盱眙城小而藏粮充足，于是留了几千人攻城，意思是拿下此城，夺粮济军。他则继续率大军南下，直打到长江北岸，与建康城仅一水之隔了。

兵临城下，局势危急，宋文帝以天堑为防线，加强戒备，准备与北魏决一死战。

此时，魏太武帝寻思道：“如果下令进兵，强渡天堑，手下这些北方兵勇，大多不习水性，必然牺牲巨大，况且也不一定能拿下建康。再说，去盱眙攻城夺粮的人马，怎么还没有送来捷报，万一有什么意外，粮食到不了手，就是占了建康，也势难持久。到时候宋军反攻过来，手下将士孤城背水的，失了接应又断了退路，那如何是好？”想到这里，他拿定主意，暂缓进兵。

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公元 451 年）正月，拓跋焘率军回撤，见盱眙城竟然还没攻下，他一面暗自庆幸没有鲁莽进攻建康；一面又大惑不解，北魏兵一向骁勇善战，怎么打了许久，竟无尺寸之功呢？于是，立即下令围城，几十万大军重重叠叠，把座小小盱眙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明，他要“不战而屈人之兵”，于是派人给城里送了一封信，让人家赶快送些上等好酒来慰劳将士。这意思很明白：宋军如果识时务的话，就赶快献城投降，给自己留条活命，以免城破之时，玉石俱焚，追悔莫及。

信送出去后，这位北方皇帝便在主帐中坐等佳音，他深信宋军不出三日必然就范无疑。没想到宋军很快派人来到帐前，送上一罐封得严严实实的東西，当即拔牙塞子，顿觉骚臊扑鼻，原来竟是一罐馊尿。这下可把他鼻子都气歪了，当即下令：“踏平盱眙，刻不容缓！”

北魏军士奉命连夜在盱眙城外筑起一道围墙，并选择东北城为主攻目标，就近采东山之石填平壕沟；然后在君山外的河道上搭起骨架，派重兵守卫，以堵截航道。

完成攻城准备后，拓跋焘怀着险恶的心理，写信给臧质、沈璞道：“我即将攻城，派来攻城的兵士都不是我们鲜卑人，攻东北城的是丁零人和匈奴人，攻南城的是三秦的氏人和羌人。假设丁零人战死，正可以减少我在常山、赵郡一带的麻烦；匈奴人战死，则可以减少我并州方面的威胁，而氏人、羌人战死，我关中一带就更为平安。反正不管杀了你们宋人，还是杀了这些人，对我都有好处，你们就尽量拼杀吧！”臧质立即回信指斥道：“你这奸邪的

心怀我十分明白，你这四条腿的东西，屡次进犯我宋国，东路挨过王玄漠猛打，西路遭到梁坦的狠揍，你难道忘了？要知道‘虏马饮江水，狝狸死卯年’的童谣就快兑现了！既然你要来送死，我怎么忍心让你活着回去呢？打吧，如果你被乱兵杀死，算你幸运；如果被我抓住，那对不起，我可要把你绑得结结实实，用毛驴把你押往建康示众，然后再要了你的命！至于我本人，决不贪生，为国粉身碎骨，在所不惜。废话少说，你就赶快攻城吧！”

原来魏太武帝别名狝狸，他读完来信，大怒不已，立即派人做了张铁床，上面放着铁犁，扛到城下对臧质喊道：“等我破城之时，一定把你抓到铁床上犁掉！”

臧质并不在意，他又写了一封信，叫人广为抄写，散发到北魏军营中，用拓跋焘的原话，把他利用非鲜卑人卖命的诡计揭露出来，劝北魏将士不要上了他借刀杀人的当，还劝诫他们道：“大丈夫应该学会转祸为福，你们谁要是杀了拓跋焘，我上报朝廷封他为开国公侯，给一万户封地，赏布和绢各一万匹。”

北魏军攻城开始了，他们先用钩车钩住城墙口，想往上冲，结果被城上宋军用粗绳将钩车死死拴在城墙上，一动也不能动，到了晚上，宋军用大木桶装人吊下去，将钩车运进城里。接着北魏改用冲车进攻，由于城墙十分坚固，每冲一次，不过撞下几升碎土，仍然无济于事。拓跋焘气极了，逼令攻城军士赤膊上阵，硬往上爬，前面被宋军射死、砸死，后面再上，谁后退就当场砍掉脑袋。就这样不停地猛攻，北魏军死伤不计其数，尸首堆得和城墙一样高，盱眙仍然固若金汤。

激战进行了30天，北魏兵力减了一半，这时拓跋焘得到消息，宋文帝已派遣水军由海路进入淮河，从他背后袭来，而彭城方面又要断他陆上的归路，再加上军营里传染病流行，将士病死众多。面对此情此景，拓跋焘仰天长叹，然后焚毁辎重，急匆匆解围退兵北去。

魏太武帝南侵失败，一路上为了泄愤，野蛮地纵兵烧杀掳掠，甚至刺婴儿在长矛上，舞动取乐，以致北魏军队经过的郡县，一片焦土，不见人迹，春燕归来，只好在树上营巢。

在这场大战中，宋朝经济遭到巨大破坏，国力大减；北魏兵马死伤过半，失去了战斗力，好不容易强盛起来的南北两朝都因此大伤元气，感到疲惫难支，迫切需要休养生息；而在此后一、两年内，宋文帝遭弑横死，魏国的境况也很不妙，双方谁也没有力量再较量武力了。

魏太武帝的成与败

魏太武帝崇尚武功，重用崔浩，依靠崔氏谋略和鲜卑人的强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始光元年（公元424年），拓跋焘继位，此时柔然大将大檀发重兵南下，长驱直入袭扰云中郡，威胁旧都盛乐，太武帝率将士昼夜兼程，用三天两夜时间赶到战地，大檀不等太武帝喘息，就发起进攻，将太武帝人马团团围住，包围圈竟达50层之多，敌军骑兵前锋已逼到太武帝马前，魏军见状大惊失色，而太武帝却面色自如，毫无畏惧之心，鼓励将士奋战。柔然大将大檀派其任于陟斤为先锋，来取太武帝。太武帝不慌不忙，沉着应战，下令军士放箭。一声令下，箭如飞蝗，将于陟斤射杀马下，大檀一时失去主张，惊恐万状，匆忙退兵，云中之围就这样轻易得解。

经过这场较量，太武帝信心愈足。次年，大举出击柔然，兵分五路并进，太武帝率主力从中道进军，左翼为平阳王长孙汉、汝阴公长孙道生，西翼为东平公娥清、宜城王奚斤、将军安源，五路大军蜂拥而出，直抵漠南。他们留下辎重，跨轻骑疾进，将士各备 15 日军粮，深入沙漠地带。柔然守军惊骇万分，不敢应战，仓皇北窜，魏军大获全胜，由此边境安定。

始光三年（公元 426 年），太武帝决定再次对外用兵，以振国威。他率领鲜卑人，一举攻下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始光四年（公元 427 年），又攻破夏国都城统万（今陕西榆林），乘胜追击，于次年俘获夏国国主赫连昌，到魏明元帝神䴥（音 jī）四年（公元 431 年），终于攻下夏国最后都城平凉（今甘肃华亭县西），灭掉夏国。大胜而归，占领了关中地区。西定以后，又于次年，即延和元年（公元 432 年），出兵东征后燕国，兵围燕国都城龙城（今辽宁北票市南），尽管未即破城，但威势不减，终于在四年后灭了后燕，从此整个辽河流域归于魏国版图。太延五年（公元 439 年），拓跋焘再次西征，发大兵攻伐北凉，九月，魏兵攻至姑臧（今甘肃武威市），北凉主沮渠牧犍出降，北凉宣告灭亡。自此，十六国大乱后的分裂局面结束，黄河流域一统于北魏政权之下，民众也因此稍觉安定。

魏太武帝连年用兵，屡战皆胜，除疆域扩大外，战利品不可胜数，于是大赏群臣。而受赏将士，早已每战必有掳掠，他们个个“多获美女珍宝，马畜成群”，成了大富豪，再无一点从前的穷酸相了。即使没有出征的朝中文武官员，也因主子饱发战争财而大沾其光，分得了数量可观的奴婢和牲畜，以供驱使。

由于鲜卑拓跋部本来就人口不多，如今疆域扩大，更是人以稀为贵。此后，每遇战事，便尽力驱使汉人和杂夷充当头阵，鲜卑骑兵则殿后督战，以保存力量。这样，鲜卑人当然高兴，胜则有大功重赏，败则可先逃性命，但是这必然引起汉人和杂夷对朝廷的不满。久而久之，鲜卑人堕落了，汉人和夷人离心，北魏政权的根基受到动摇，盛极一时的政局开始衰败，噩运也就随之到来了。

魏太武帝在军事上的连连胜利，使魏国变得更加富足，北方的柔然在战争中走向衰落，再不敢来进犯魏境；赞誉之声不绝于耳。于是，南朝的存在便成为魏太武帝眼中之钉，在成功后的飘飘然境界中，他多么希望像这几年的征战一样，心想事成，顺利地打到南朝都城建康，一举而统一中国啊！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 450 年），魏太武帝制定了新的方略，为实现其美梦，决定南侵。他亲率大军，攻伐宋朝。此时，宋朝皇帝刘义隆，在位已经 27 年，政权稳定，国力强盛，不是轻易可以对付的。

魏宋大战，魏兵拼了命也没能攻破宋国的重要城镇，最多只能在城外杀掠一番，用野蛮的屠杀和破坏寻找安慰。可是，烧杀掠抢，严重的伤害了广大南朝民众，等到宋朝王师一到，百姓无不竭尽所能，帮助朝廷对付魏军。魏军在这样的沉重打击下，死伤大半，战斗力迅速下降。魏太武帝实在回天无力，只好放弃目标，于出兵的第二年退回平城，至此美梦也随之一幻灭。

这是魏太武帝当权后受到的最沉重打击，他在平城舔伤期间，因遭到国人的怨恨，威望急剧下降。特别是国内那些鲜卑人，从未遇到过如此惨重的伤亡，受到极大震撼，此后一听到和南朝军队打仗的事，心里就惶恐不安，深怕一去难归。

魏太武帝拓跋焘一世英武，为统一北方功绩卓著，到头来却因侵宋失败，

惹得民怨沸腾，朝中文武也颇有微辞，这些都渐渐传到他的耳中，他忍也不是，发作也不是，心里越发觉得烦闷难解，加上问策无人，偏又有南来投降的 5000 余户在中山谋反，甚至连他的冀州刺史渠万年也背叛他参与谋划，准备取而代之。种种不祥之兆，使他心神不安，疑窦环生，脾气变坏，侍从则因畏惧于无意中获罪，凡事躲躲闪闪，结果存有异心的宦官中常侍宗爱利用这个机会，不等他缓过神来，就在永安宫中下了毒手，将他杀死。魏太武帝死了，从此，北魏开始走向衰乱。

耿直清贫话高允

崔浩是历经几代魏主的汉族老臣，因多谋善断、料事如神而颇得鲜卑贵族统治者的信任。可是，在他内心深处，还是偏向他所出身的汉族士族阶层，用人也总爱先考虑士族人选，鲜卑贵族对此当然很有意见，时间一长，这个疙瘩变成了死结，解起来就费事了。

情形果然如此，魏太武帝北伐柔然，又平定后燕、西凉，武功卓著，一时民富国强，心里乐滋滋的，觉得自己无愧天地祖宗，很希望有部书能把他的功业连同他祖宗的光荣历史统统记录下来，流芳百世。要想实现这个愿望，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著史。

崔浩是魏国最有学问的人，又特别受到他的信任，他想：“若论著书，舍崔浩其谁？”当即命人把崔浩请来，让他总揽此事，崔浩领命，召了一帮士族文人就干了起来，鲜卑贵族对此虽有不满，但自己大字识不了几个，手下人也没这个墨水，只好作罢。

那么一大群士族人士聚在一起，想法就和太武帝不同了。他们按照汉人写史“笔则笔，削则削”的传统，力主据实陈辞，决不溢美，就连皇帝做了坏事，也不避讳而照录纸上。太武帝哪里知道这些规矩，看见写史的人整天伏案勤书，心里美滋滋的，只盼早日写成，好光宗耀祖、举世赞誉。时间过得飞快，经过几年的辛勤劳动，一部 30 卷的魏国史写成了。崔浩最后审阅，他通读完全书后，心里十分满意，觉得自己用人不错，暗暗称赞撰史诸公笔下不凡。

当魏国史献到御座前时，太武帝高兴极了，他哪曾想到这书还会有什么问题，于是大大褒奖一番。崔浩又奏请将魏国史全文刻在石碑上，让万民观看。太武帝听了，当即拍案叫绝，立刻命人召募工匠，镌刻碑文。石碑又很快刻好并一一竖了起来，国人纷纷前来观看，太武帝见这情形，心中好生得意。

鲜卑贵族也来看热闹，尽管他们大都胸无点墨，但树碑立传，称颂祖上功德，他们总是打心眼里乐意的。谁知不看还罢，一看可不得了，怎么碑上那些字大都不是他们眼熟的称颂之辞呢？再听旁人摇头晃脑一念，心中也明白了七、八成。原来碑上把他们祖上干的坏事、丑事和种种隐私全刻出来了，这不等于拿钱请人砸自己祖宗牌位吗？这还了得！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挤挤嚷嚷把状告到太武帝那儿，强烈要求立即毁了石碑，严惩崔浩和那帮士人。太武帝这才如梦方醒，气得七窍生烟，当即传令照准，让人火速将石碑砸碎，立即逮捕崔浩及全部著史文人。

太子拓跋晃得知消息，马上想到他的老师高允可能遭到不测，因为高允是奉诏著史的骨干，很难幸免于难。为救恩师，太子也顾不得许多，抢先把

高允接进府来，告诉他形势不妙，让他先在自己府中躲避，以免被抓，然后带他去面见父皇，乞求宽恕。高允一方面感谢太子恩情，一方面也想面谒君王，好把道理说明白，以免皇帝受蒙蔽，铸下大错。因此也不多说，就答应下来。看来，高允对魏帝还是很信任的哩！

次日，太子带了高允一起来到宫中，太子上前禀告道：“高允是我恩师，他为人生性胆怯，一向光明磊落，遵奉法度，从不乱来。著史诬祖之事，与他无关，并非崔浩同党，恳请父皇格外开恩，饶他这次吧！”太武帝见爱子求情，也动了心，加上他也不想把士族文人全部杀掉，以免引发更大矛盾，因此点了点头，就传旨高允入见。等高允拜见后，太武帝便发问道：“著史诬祖的阴谋可是崔浩一人所出？我想你大概没有写那些混帐话吧？”太子听了，在一旁好生欢喜，这不是明摆着要帮他洗刷罪过吗？于是马上对高允示意，叫他快说。不料高允早有准备，他说：“崔浩并无阴谋，书中的《先帝纪》和《今纪》是崔浩和臣下合写，因崔浩事多，由臣下执笔，经他过目后呈上的。”此言一出，太武帝父子均为之一惊，太武帝转向太子道：“可曾听清？高允说得明明白白，是他亲笔所写，叫我如何饶得了他？”太子顿时语塞，想了一下才说：“高允为人忠厚，见父皇威严，语无伦次，他今晨还对我说那是崔浩所写，想必刚才是口误所致。”太武帝于是又问高允道：“太子所言，可是实情？”高允大声答道：“为臣不敢诳言欺君。太子所说，无非欲救臣不死，以报师恩，其实今晨并未与太子有此对话。”太子一听就急了，心想高允这个人也是，这么不要命地直说，图个什么呀？太武帝见高允如此，心中也很纳闷，便转脸向太子道：“高允可真耿直呀！至死不悔，实在难得，就凭这，我决定恕他大罪。不过，给崔浩定罪的诏书，可得由他来执笔，方好开脱。”太子连连点头。

高允获免，可回去后怎么也不动笔代拟诏书。太武帝左催右催，仍不见动静。最后逼急了，高允对来说：“请奏明圣上，微臣还想面君一次，方敢动笔。”太武帝答应高允的请求，召其进宫。高允奏道：“非是微臣抗旨，实因微臣不知崔浩还犯有何罪。若仅以著史一事而论，当不致判处极刑。”不等高允再说下去，魏太武帝已经脸色气得铁青，拍着桌子大叫：“来人，将他绑了起来！”又是太子在旁一再央告，太武帝的气才渐渐平缓下来，将高允松绑，放了出去。然后对太子道：“要不是他如此耿直，令我震惊，说不定这次还要有几千连坐呢！看来，放下他也不算坏事。”尽管高允侥幸得免，太武帝却无论如何不肯放过崔浩，管他什么诏书不诏书，一个命令，崔浩满门抄斩，并诛连九族，其它著史士人则本人当罪，杀头了事，对家族男女算是格外开恩，免了灭门之祸。

事后，太子问高允道：“恩师何故要如此对答呢？”高允告诉太子说：“历代史书都有如实记载帝王言行的先例，并非崔浩故意作为，如今已成惯例，为的是给后代留作借鉴，也让为帝者慎言谨行，因此必须据实陈辞，不为尊者、贤者讳，这才是史官应尽的职责。再说崔浩主持修史，可能有些地方言语过激，但总观全书，并无差错。我与他同室著书，倘若该杀，也应同赴阴司，做史官就不能怕死，你如今把我救下来，叫我如何向世人说得清楚，这么活着，可不是我的心愿哪！”太子听了，深为感动，便不再责怪高允。自此以后，高允耿直的名声可就天下无人不知了。

高允不仅耿直不阿，而且安于清贫。太平真君十二年（公元451年），太子不幸夭折东宫。次年，魏太武帝遇害，宦官伪称太后之旨扶拓跋余继位，

旋即为太武之孙拓跋濬取代，他就是魏文成帝。文成帝早知高允耿直，对他颇敬重。一次，文成帝对群臣说：“你们应该学学高允，他为人忠诚耿直，不像你们当中有些人，只图升迁，总爱顺着我的话往下说，把自己的想法藏在心里，这可不好呀！”群臣连连点头称是。司徒陆丽趁机禀道：“陛下如此敬重高允，可知道他家中情形？”文成帝让陆丽细说端详，陆丽请文成帝亲自前往观看。到了高允家，文成帝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高允一家人住在茅草盖顶、土砖垒墙的几间低矮小屋中，与平民百姓没有两样，要不是有人指点，他万不会想到这就是自己身边大臣的“华居”。屋里坑上铺着麻布被子，家里人身上穿的丝棉袄子已陈阳变色，而厨房里只有一些咸菜，真是别无长物。文成帝看后感慨地说：“高允如此清贫，真意想不到啊！”

耿直、清贫的高允为官清正，前后历经五代君王而不衰，且寿数绵长，活到 98 岁，这在那个时代确实堪称奇迹。

文成凿云岗

魏文成帝拓跋濬能始终信任直言无忌的高允，还能亲自到高允家的茅舍走一趟，作为封建时代的一国之君是很不容易的。

文成帝没有武功，鲜卑军队骠悍骁勇的特点，也因长期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享乐生活丧失殆尽，堕落成社会的多余的人，加上对宋战争的惨败，谈战色变的恐惧心理一直笼罩在他们心头。因此，北魏政权的对外战争基本上已经停止，靠掠夺暴富的途径也已掐断。这时，国内存在的掳掠来的大量奴隶，以及汉人和杂夷对鲜卑人的反感又愈益加强，国内矛盾时刻都可能爆发成社会动乱。文成帝每虑及此，就无比忧心忡忡地训诫官员切莫恣意扰民，因此也就特别看重高允的耿直、清贫，视他为官员楷模了。

文成帝更不敢得罪鲜卑贵族，他年纪轻，威望也不足以震慑群臣，只能深藏机悟，耐着性子慢慢养威布德，静待时机。当然，他明白作为一个皇帝，大言警世嚷嚷一阵，只要不采取严厉行动，老百姓听了舒服，官员们也是可以承受的。于是，屡下诏书，斥责地方官吏串通富商大贾，重利盘剥细民，贪赃枉法，以营其私。他规定官商犯赃达十匹织物以上者，处以死刑。又诏令平民，不得因穷困而出卖子女为奴婢，凡已出卖者，必须赎回。

诏书下来，大官看了，暗暗一笑置之；富商大贾看了，行事变得隐蔽起来；而细民百姓却叫苦连天，衣食全无，哪有钱赎回至亲骨肉，哪还有心思去问官商犯赃之事。于是，天下一时倒显得更平静起来。

文成帝又虑及官员和富商大贾通过婚嫁手段结成利害同盟，下诏规定贵族和士族“不得与百工、伎巧、卑性为婚”，以固礼义，如有违反，加罪处罚。

可是，谁也没见过皇帝因此而处罚过谁，也就把诏令置之脑后了。人们原来怎么做，现在还这么做，民众的痛苦倒日见加深。

没有生计的民众，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势必起来反抗，而文成帝最害怕的正是此事。早在他继位后的次年，即兴安二年（公元 453 年）冬，在行幸信都、中山，观察民风时，听说河间郡所辖鄯（音 mào）县（今河北任丘县）有贫民因年关难过而攻取富户的事，当即勃然大怒，亲自赶到该地惩办“贼盗”，把年满 15 岁的男子全部杀死，而 15 岁以下的则全部作为奴隶赏赐给随从官员。对敢于反抗的民众进行如此残酷镇压，他倒是挺坚决的。

文成帝处在严峻形势的夹缝中，麻烦事实在不少。为了缓和矛盾，他看中了佛教，并做出十分诚心的样子。本来，佛教早在魏国流行，只因魏太武帝觉得佛教讲究慈悲为本，不合鲜卑贵族杀伐掠抢的口味，而信奉道教。公元446年，盖吴率军反叛朝廷，魏太武帝亲领大军征伐，在长安一座佛寺发现叛军藏有大量的弓箭长矛等兵器以及成套酿酒的工具，还有富家寄藏在寺内的大量财物，更有供贵家子弟淫乱的密室。这更增强了魏太武帝灭佛的决心，他当即勃然大怒，责骂众僧，从此视佛寺为魔窟，下令毁寺杀僧，并诏令天下僧尼立即还俗，日后凡有再敢建寺拜佛者，一律抄斩满门，决不宽宥。

文成帝擅改祖制，恢复佛教，也是情势所迫。他知道天下佛教徒不少，而且至今信仰未改，与其任其偷偷摸摸，不如公开准许，还省得许多麻烦，也更便于利用“四大皆空”麻痹人心，免得天下作乱。于是，诏令重修佛寺、再塑金身，让还俗僧尼重新出家，并亲自给佛门新收弟子剃度。从此，佛教在北朝便迅速传播开来，信佛的人十分满意，都称赞当今皇上圣明。

有一天，文成帝跨马出巡，迎面来了个和尚，低头赶路，口中还念念有词地背诵经文，竟不觉闯了圣驾。这时，文成帝的随从迅即抓住和尚。和尚一见这阵势，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文成帝见状，忙挥手令左右放了和尚，还笑着说：“我的马认识善人，他身为佛门弟子，行路也不忘诵经，可谓虔诚之至，何罪之有！”说完，下令把和尚请进宫里。

和尚法名昙耀，出家多年，在魏太武帝禁佛期间，还将袈裟、经卷秘密保存着，如今开禁，自然更是虔信佛祖有灵。

文成帝从此便常召昙耀入宫讲说佛法，琢磨佛理。昙耀则趁机进言，建议文成帝造佛寺、建佛塔、刻佛像、印佛经，广积善缘，还说文成帝百年之后一定升天。文成帝果然动了心，详细询问了做这些事的要求，昙耀说：“且说佛像，常见的不过高一、二丈，您造的纯金佛祖像便是一丈六尺之高。可贫僧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县）时，到敦煌石窟去瞻仰过，那里壁画上的佛像，每个就有好几丈高，极其壮观！”

文成帝早闻敦煌石窟的名声，只是未曾亲眼看过，十分羡慕昙耀，并让昙耀细细讲来，昙耀自然从命，神采飞扬地说道：“敦煌那地方南有鸣沙山、月牙泉，西有党河、盘城，是沙漠绿洲，人间福地。百年之前，曾有名僧乐尊，路经敦煌三危山下，见大漠之中竟有这样一块绿树成荫的宝地，十分稀罕，这时又见山上一片金光，令人眼花缭乱。这位乐尊感知佛祖在山上显灵，自己身沐佛光，这是出家人之大幸，不禁惊喜交加，忙向山上叩头祷告，口中‘阿弥陀佛’之声不绝。事后，乐尊四出比缘，积聚资财，招募匠人，来到三危山，凿了许多石窟，窟中广树佛像，窟壁则绘以佛经壁画，还取窟名为‘莫高’。自此以后，佛徒云集，皆携带布施，故陆续有人凿窟建佛，而敦煌则由此名满天下。”文成帝听得如痴如醉，他和昙耀怎么会知道这三危山岩石是因为含铁量大，呈暗红色。经阳光照射，便会反映出金色光芒，哪里是什么“佛光”呢！

乐尊身为僧人，竟能以窟名世，文成帝心想自己是一国之主，岂是几个和尚可及的，应该做出更大的事来才对。于是便问昙耀道：“你看平城可凿石窟吗？”昙耀闻言起立，双手合十道：“陛下若有此心愿，还怕无处凿窟吗？贫僧以为应当赶紧去办才是。”从此昙耀便开始为文成帝寻找凿窟宝山去了。

几天之后，昙耀满面春风地回到京城，进宫面圣道：“平城西北有座武

周山，山岩坚硬，依贫僧之见，石质比三危山更佳，尤其是山北面那名叫云岗的崖壁最为适合，若在凿窟之时，一并依壁刻成佛像，当比壁画更为气派，必能万世不朽！”文成帝连呼“甚妙！甚妙！”

云岗石质坚硬，且巧匠能夺天工，加之有国库为后盾，昙曜力办此事，经过万般艰难，终于凿成五座石窟，每窟一尊巨佛，兼有小佛像无数，巨佛高达七支有余，仅佛指便有三尺多长，极其巍峨壮观。特别有意思的是所有佛像都是隆鼻厚唇、双耳垂肩，神采奕奕，发人遐思。文成帝一看，佛像怎么如此眼熟，细细思忖，原来已非佛经中的天竺形象，而活脱鲜卑人种模样，且极似北魏几朝君王，心中喜欢不尽，乐得不住口地呼道：“妙极了！像极了！真好！真好！”

云岗从此成了凿窟树佛的圣地，不断有人来此凿刻，后来又有人建造了楼阁、宝塔，显得更加辉煌。窟中石佛或立或坐，神态各异，最后大大小小竟达5万多尊，真成了佛的天下。

宋迁喋血亡方休

说起宋文帝的死，与他头脑发昏很有关系。起初，由于宋魏大战之后，宋朝虽然疆土未失，但破坏惨重，国计民生，每况愈下。每当想起这事，刘义隆就气不打一处来，却又无可奈何。

就在这种情绪下，宋文帝的女儿东阳公主病亡，不意露出一桩宫中丑闻来。由于公主信巫，而太子刘劭、武陵王刘骏等皇子野心勃勃、觊觎皇位，他们合谋巫蛊，企图促使文帝早亡。不料事情败露，罪证起出，两名皇子抵赖不得，只好上书谢罪。对此，文帝心中十分矛盾，如果按罪论处，实在丢尽脸面；如果姑息，后果确难设想。左思右想，终于把定主意，决意废掉太子、赐死武陵王，并命亲信大臣查找前朝先例，即交司法执行。谁知风声走露，刘劭见势不妙，便凶相毕露抢先下手，趁着夜色笼罩，诈称奉诏，带着心腹近侍闯入宫中。此时宋文帝正与大臣在含章殿议事，父子见面，刘劭也不多言，手起刀落，把宋文帝砍死在殿上，当即宣布继位。

武陵王刘骏和他哥哥刘劭一样，也是个不忠不孝之辈，而且比刘劭更加阴险残暴，他见刘劭得手，先是骗过刘助，躲避风头，接着迅速调集兵马，举起讨伐元凶的旗号，从浔阳（今江西省九江市）起兵，直捣建康，处死刘劭，于孝建元年（公元454年）坐上皇帝宝座，他就是宋孝武帝。

刘劭弑父、刘骏杀兄，都足以看出他们的心黑手辣。宋孝武帝知道自己皇位来得不光彩，于是千方百计加强自己的权力，厉行典签制，派自己最亲信的人做典签官。典签官名义上是佐属，实际上是对镇将进行监视，并大多掌握实权或分掌实权，人称“签帅”。

尽管刘骏把镇将控制得很紧，但仍不放心，唯恐别人如法炮制把他干掉，疑忌之心越发加重，特别是对有功大臣和至亲骨肉，更是时刻放心不下，于是杀戒大开，一批刺史、太守，如臧质、刘季之、沈怀文、王僧达、袁景等都被他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弄得朝廷上下人心惶惶。

他更以谋反的罪名先后诛杀了始兴王刘濬，逼死了武昌王刘浑，赐死了皇叔南郡王刘煊，斩杀了皇弟海陵王休茂；甚至对曾经帮助他灭掉刘助夺得帝位的另一个亲弟弟竟陵王刘诞也不放过，采用贬爵手段，加以打击，刘诞见势不妙，当即在驻地广陵举起反旗。

宋孝武帝于是疯狂地调集各路军马，直奔广陵，严令攻城。双方攻守长达好几个月，死伤无数，等到广陵城破，刘诞被杀，宋孝武帝还不解恨，连全城无辜也不放过，城中男子全遭酷杀，妇女则被赏给攻城将士蹂躏，好端端一座广陵城，顿时化作废墟。

恶有恶报，暴君刘骏没活多久，也一命呜呼，死时年仅 35 岁，这一年是宋大明八年（公元 464 年）。继承刘骏帝位的是太子刘子业，刘子业虽说只有 16 岁，可他的残暴比他父皇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上台就不问青红皂白杀了起来，他从越骑校尉戴法兴杀起，凡是看不顺眼的人，一概诛杀，于是大将柳元景、尚书左仆射颜师伯、太守王藻、将军何迈等一个个惨遭毒手；对皇族诸王，也不稍存体恤，仅一次就赐死南平、庐陵、安南三王。更有甚者，对孝武帝临终托辅的叔祖刘义恭也不放过，他亲率宿卫兵，突袭江夏王府，把刘义恭和他的四个儿子一并除掉；又因亲弟刘子鸾长得逗人喜欢，妒恨在心，给这个年方 10 岁的小孩子下了赐死诏书，吓得刘子鸾呼天抢地，大叫：“下辈子我再也不投生到帝王家里来了！”吊死刘子鸾后，又赐死了年仅 6 岁的弟弟刘子师。

刘子业不但以杀人为乐，还以虐人为戏，对他几个幸存的叔叔，下令把他们抓起来。湘东王刘彧、义阳王刘昶、东海王刘祜，以及山阳王刘休祜、顺阳王刘休范、巴陵王刘休若、建安王刘休仁等，都被关押在一间房内，派人随时打骂折磨。特别是对刘彧、刘休祜、刘休仁三个，见他们身躯肥胖，便挑选出来装进竹笼，轮流过秤之后，便称最重的刘彧为猪王，把另外两个叫做杀王和贼王。他还专门让人挖个大坑，灌进泥水，把刘彧的衣服剥光，扔在泥坑里挣扎取乐，又取来木槽，把饭食倒在槽里，逼刘彧学猪供食。

皇叔们受尽糟蹋，心里恨得什么似的，可他们知道，如果稍微表示出一点不满，就可能当场丢命。于是，表面上装得十分服帖，任凭打骂蹂躏，一味哼哼哈哈装傻。一旦发现监视松懈，便紧急磋商对策，寻找机会，派出心腹，结交刘子业的左右寿寂之、姜产之等人，趁刘子业午夜“竹林堂射鬼”之际，怀刀直入，废了暴君。

废帝刘子业除了杀人，还做了一件荒唐事：刘骏之女山阴公主生性淫荡，刘子业继位后，她便提出：“我与陛下虽然男女有别，可也都是先帝所生，陛下后宫美女上万，而我却只有驸马一人，这太不公平了吧！”刘子业倒好，马上满足她的要求，给她找了三十个美男子作“面首”，再补上一个公主亲自选中的貌比潘安的吏部侍郎诸渊，一并供她玩弄，还给她进爵加封，如同郡王。刘子业就是这样一个既残暴又荒唐淫乱的无道君王。

废了暴君，由建安王刘休仁领头，立湘东王刘彧为帝，匆忙登基，连鞋子都走脱了，他就是宋明帝。宋明帝其实不明，本来他已经吃过废帝那么多苦头，恨透了暴君，也看到了暴君的下场。如今自己掌握朝政，该好好整顿朝纲，殄灭暴戾了吧？可他偏不这么想，他同样认定：如果不把一切可能成为对手的人杀光，就别想做安稳皇帝！看来，血腥的屠杀还要继续，而且有变本加厉之势。

拥立刘彧有大功的建安王刘休仁同样不仁，他和宋明帝在杀人的看法上完全合拍，并且积极进言道：“如今我们总算出了一口恶气，您也登了大位。可是，还有那么多子侄辈的人盯着皇位，谁能料到他们会用什么手段呀？”刘彧点头，心想自己的儿子才两岁，而哥哥孝武帝的一大群儿子都封了诸侯王，自己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皇位还不知落到谁手里去了呢。既然如

此，不如先下手为强！于是依照他亲兄、亲侄两代帝王的办法，从豫章王刘子尚、山阴公主开刀，下诏赐死；又将晋平王也叫刘休仁贬为庶人，同时以谋反之名加罪大臣，诛灭宗越、谭金、童太一等人。其余诸王，也无人幸免，全被赐死。最后噩运轮到建安王刘休仁头上，他拥立明帝，手握朝权，深受重用。不料泰始七年（公元471年），身患重病的宋明帝发现，太子时年9岁，还不谙世事，而刘休仁却十分健康，说不定自己一口气上不来，即使刘休仁不篡位，朝政还不是他说了算！事关重大，放心不下，常言道：“无毒不丈夫”，何况君主？当即狠狠心，令人取过一包毒药赐给刘休仁。刘休仁真没防到宋明帝会来这一手，气得七窍生烟，大骂明帝昏聩狠毒、忘恩负义不止。最终在来人胁迫下饮毒身亡。听到刘休仁死讯，宋明帝也就放心地永远闭上了双眼。

太子刘昱即位，这个10岁的小皇帝，性如魔王，更无天理可言，差不多见人就打，就杀，吓得谁也不敢挨近他。他在位四年，杀戮无度，皇宫简直如同鬼门关、森罗殿。这才叫做宋廷喋血亡方休。朝中群臣看宋家朝廷气数将尽，暗暗商量是不是该改朝换代了，他们选中了掌握禁卫军的南兖州刺史萧道成，让他领头对付刘昱。萧道成利用刘昱游饮无度，而且经常匹马独行的习惯，串通近侍宦臣杨玉夫、杨万年等25人，乘刘昱醉归仁寿殿时，抽出他的随身佩刀将他杀死，萧道成考虑到代宋自立的时机还不够成熟，就推出刘昱的三弟刘准来接替皇位，这就是宋顺帝。刘昱则由皇太后追封为苍梧郡王，以示被废之意。宋顺帝时，朝权完全掌握在萧道成手里，升明三年（公元479年），萧道成权势更大、威望更高，满朝文武也都是他的人。这才叫宋顺帝刘准让出皇位，由他登基，因为他封位于齐，就定国号为齐，他便是齐高帝。

魏孝文帝的“三板斧”

魏文成帝崇佛，可佛似乎并不买帐，只给了他26年阳寿。北魏和平六年（公元465年），他驾崩宫中，18岁的太子拓跋弘继位，这又是一个短命天子，年仅23岁便告夭亡。接替皇位的是拓跋弘的长子拓跋宏，即元宏，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魏孝文帝。

魏孝文帝是以改革闻名于世的。在他执政期间，魏国内部的多种矛盾日益白炽化，特别是汉民的反抗，越来越激烈，规模也越来越大。为了缓和矛盾，魏孝文帝凭着他的政治才能，最后果断地采取了改革措施。看来，他这着棋下对了。

从延兴元年（公元471年）魏孝文帝刚刚坐上皇位起，各地告急文书便雪片似的飞到他的面前：青州（今山东淄博市）告急！青州高阳人封辩，在当地振臂一呼，便聚集千人以上，他自号为齐王，要与朝廷作个对头。光州（今河南光山县）告急！光州人孙晏也聚集1000多人，宣告起义。平陵（今山东历城县）告急！平陵人司马小君又聚众起义，声势滔滔，直逼府衙。泰州告急！泰州略阳（今陕西略阳市）人王元寿揭竿而起，5000余户闻风而从，王元寿自号冲天王，要冲破北魏政权的罗网。除此而外，不甘奴役的贫民更是遍地蜂起，攻取富户，却获财物。一时北魏天下竟无宁土。

魏孝文帝在人民反抗的浪潮冲击下，于延兴三年（公元473年）订下法令，规定县令能平息本县动乱的，兼治邻县；能平息两县动乱的，兼治三县；

三年治下无事的，提升为郡守。郡守能平息本郡、邻郡、多郡的，依例提升，三年可任州刺史。

魏国这帮县令、郡守，谁个不想升官。可法令出来以后，却不见哪里的动乱平息下去。相反，民变倒是越来越凶，魏孝文帝只能望天叹息。他明白地感到再靠压、靠剿，已经无法阻止天下大乱的到来了，于是诏示群臣：“如今地方官员，放纵地方豪强，收受贿赂，违法营私，驱民为匪为盗，以致闹得国无宁日，你们说说该怎么办才好？”可朝臣们又有什么高招呢？只能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显出一筹莫展的样子。

其实，鲜卑拓跋部本身就是一个以杀掠为业的野蛮集团，军事上靠虏掠鼓舞士气，政治上用赏赐激励百官。这样的政权，广大民众怎么能接受呢？

这时，魏孝文帝又想出一个办法，他“慷慨”地拿出一百万匹布帛和伐齐时抓来的大批俘虏，赏赐给大小官员，叫他们暂不要苛刻小民，以免生变。群臣倒好，赏赐照领，贪污纳贿却依然如故，一点也不收敛。

魏孝文帝真拿他的群臣没办法了，走投无路，不得不甩出三板斧，下决心除弊布新。

太和八年（公元484年），魏孝文帝诏令全国：上交国家的赋税增加到每户谷物2石9斗、布帛3匹，此外再无其它额外负担。国家增收部分，作为官员俸禄，官员不得另立名目犯赃，凡得赃一匹以上者，立即处死。

诏令下后，多数百姓愿意承受，而官员们却颇为不满。特别是那些地方官，硬是不肯领取俸禄，他们公推反对新制的淮南王拓跋佗出面，请求孝文帝收回成命，恢复旧制。魏孝文帝有了前次的教训，知道鲜卑官员，特别是那些地方官员最为贪婪，永远不会有满足的时候，因此拒绝了淮南王的一再请求，坚决执行新制，并派亲信赴各处监督，于是很快查出一批贪官。他勃然大怒，下令全部处斩，仅这一次就杀了刺史以下的犯赃官员40多人。杀一儆百，经过这样的严厉惩办，北魏开国以来风行不止的贪污积弊，大为收敛，吏治出现了新的局面，朝政也显得有了一些转机。第一板斧砍到了要害。

实行俸禄制的成功，增强了魏孝文帝改革的决心。次年，即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内秘书令李冲请求设立“三长”，他妻请：“如今天下百姓，多有隐瞒户口、逃避赋役者，以致三、五十家才为一户，宗主一人，难以督护。若规定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以长治民，查督户口，以征税赋、徭役，可无遗漏。”奏本进上，文明太后、太尉元丕都说：“此法若行，于公私有利。”而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竭力反对，著作郎傅思益则担心不已，他说：“一旦改法，恐成祸乱。”魏孝文帝坚定地采纳李冲的建议，在全国设立三长，校正户籍，从而户口数大增，政府再按户分配田地。三长制后，税赋降到一对夫妇每年交谷物2石、布帛1匹，百姓自然高兴，国库收入也因此大大增加，这第二板斧又算砍对了。

太和十年（公元486年），主客令李安世上疏，建议实行均田制，提出按人口授田，田地只准耕种，不得买卖，不种则由政府收回。同时，鼓励开垦荒地，发展生产。魏孝文帝马上采纳推行，挥动了第三板斧。经三大板斧砍下来，魏国国内平安多了，魏孝文帝的威望也更高了。

可是，汉人和鲜卑人、汉族士族和鲜卑贵族的矛盾总是难以消除，要是在这上面出点什么差错，整个魏国就麻烦了。魏孝文帝心中有数，他还特别担心南朝出兵北伐，如果北朝的汉人再一响应，来个内外夹攻，人数很少又被打得胆寒的鲜卑军队不崩溃才怪哩！到那个时候，拓跋氏的天下岂不完了！

他越想越感到事情严重，越想越觉得应该更有效地安定民心。

这时，建威将军、秘书丞李彪建议魏孝文帝注意从魏国与南朝相邻的荆、兖、豫、洛、青、徐、齐这河表七州中，选择高门，召入京城，委任官职，给他们与鲜卑贵族平等的待遇，以利于稳定疆界、调和气氛，阻止士族向南朝投奔。李彪的建议，可谓正中魏孝文帝下怀，他仔细琢磨这当中的种种奥妙，深有所悟，于是酝酿着下一个更大的行动——迁都洛阳。

迁都洛阳城

为了魏国政权的长治久安，魏孝文帝决定实行汉化，并打算早日将国都从平城迁到洛阳。

可是他又不敢公开提出这个主张，因为他清楚地知道鲜卑贵族们的心思，就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他们凶悍而顽固的秉性，眼下他还必须留一手。

为了达到目的，魏孝文帝真是绞尽了脑汁。他每天在宫里走来走去，反复权衡利害得失。一天，他忽然想到：自己的军队不是怕和南朝打仗么？那好，就从这里下手！于是一个完整的迁都奇谋产生了。

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他召集文武百官上朝议政，处理了几桩事后，突然提出要倾北国之兵，大举攻伐南朝。魏孝文帝的这个主张，不啻晴天一个霹雳，满朝文武惊得呆若木鸡，一时无言以对，而心中则纷纷揣测道：“这是怎么回事？皇上难道疯了不成？现今是敌强我弱，如此孤注一掷，万一攻伐失利，后果不堪设想啊！”老谋深算的朝臣们这下可真急了，他们一个个或明或暗，都在想方设法加以阻止，不断表示此举万不可行。

任城王拓跋澄是孝文帝的叔父，在朝廷中属于德高望重的显贵人物。他凭着自己的丰富阅历，感到孝文帝会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为了魏国的利益，不顾一切地站了出来，激烈反对出兵南朝。他说：“陛下应当以前朝为鉴，想当初苻坚南下时，其威势与锋芒胜过本朝十倍，结果却兵败如山倒，竟然因此亡国。本朝世祖太武帝一次南征，全军折损过半。如今灾祸频发、国力尚虚，还是应以治理内部为重，待到时机成熟，再行南征不迟。”孝文帝听了后，嘿嘿一笑道：“陈腔滥调。如此说来，何日方能一统天下？”拓跋澄心想：“你年纪轻轻，不知利害，打仗的事岂是可以当得儿戏的！我是你长辈，决不能任你胡来。别人不敢说，我可不怕你！”于是接口道：“陛下倘若南征，非但不能如愿以偿统一天下，恐怕连皇位也坐不稳哩！”孝文帝听到这里，脸色陡变，一巴掌拍在御案上，猛吼道：“任城王，你敢动摇军心，休怪我不客气了！国家的事，我说了算，没有你饶舌的余地，我愿怎么着就怎么着，还不赶快闭嘴。”

群臣们都指望拓跋澄能劝得孝文帝回心转意，却不料惹得他如此生气。忙把附和主张暗暗藏回心中，谁也不敢再吭一声，朝廷上顿时鸦雀无声。拓跋澄可不买帐，只见他走前几步，大着嗓门争道：“陛下既是一国之主，就要为国家着想，哪怕你杀了我，我也要尽到为臣的职责，决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自赴危境！”孝文帝见拓跋澄认了死理，一时也压他不住，看他忠心为国的样子，也不忍再说什么。过了好大一会，才慢慢开口道：“念你忠心，我不与你计较，这事就先搁下，明日再议。散朝！”

群臣散去，孝文帝让人悄悄留住拓跋澄。两人来到后殿，退去侍从，孝文帝这才对拓跋澄交底，他亲切地说：“阿叔！你以为我真要南征吗？我才

没那么犯傻咧！南征不过是个幌子罢了。不瞒您说，我是另有打算呀！你看我们京师平城，是不是太靠北了点儿，这里风沙太厉害，一年又有几个月大雪封门，要图发展，真不是个好地方。再说，这儿远离中原，发号施令、管理国家，很不方便，如今是文治的世道，平城是用武的地点，难作文治的中心，从长远计较，最好的办法是迁都。可是朝中官员，有几个能想到这一层？特别是我们鲜卑人，祖祖辈辈在这边过惯了，热土难舍呀！如果我把这迁都的事直说出来，恐怕没几个人乐意，大家一反对，再拖儿带女的全城一嚷嚷，事情就不好办了。我琢磨了好久，才想出这个法子，只说出兵南征，军令如山倒，就不好讨价还价了。我的意思是把军队带到洛阳，去到那里再讲迁都的事，谁再不愿意，也没有办法了。您说这法子能行吗？”

拓跋澄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孝文帝葫芦里卖的是这味药呀！他是明白人，图的就是魏国的发展，还有什么不乐意呢？于是满心惊喜地说道：“陛下果然英明睿智，目光远大，迁都洛阳，确实是兴国之道。就像周朝、汉朝那样，都洛阳而天下昌，哪有不可之理？”孝文帝接着说：“阿叔且慢夸奖，我还是担心大家舍不得离开平城。”拓跋澄拍着胸脯道：“那些人哪有如此深谋远虑，只要陛下决断了，便无妨碍。有老臣在，请尽管放心。”

次日，魏孝文帝上朝对群臣宣布：“自今日起，整顿兵马。克日南下伐齐。”魏臣见皇上执意南征，知道自己势难劝阻，便一齐把目光投向拓跋澄，希望他回天有力。免得万一辱师亡国。可拓跋澄站在那里，似乎没有听见似的，与昨天判若两人，群臣心里一片茫然，竟说不出一句话来。

拓跋澄调兵遣将，谁为先锋，谁备粮草，谁搭黄河浮桥，均一一安排妥当，井井有条。于是，魏国集合20万大军，随着满朝文武各路兵将，浩浩荡荡离开平城，向南进发。一路上餐风宿露，顺利渡过黄河，抵达洛阳。在洛阳歇了几天之后，孝文帝便命令继续南下。群臣们本不愿意南征，勉强来到这里，见又要往前赶，硬是不肯行动，一些人开始磨磨蹭蹭地耍赖皮了，他们知道再往前去，距离魏齐边境就不远了，他们害怕与南朝军队交锋，简直认定是去送死，因此怎么也提不起脚来。

孝文帝见众人这副模样，觉得火候差不多到了，就跨上战马，身着戎装，也不管大家走不走，竟独自出了城门，往南而去。这下可把群臣搞紧张了，尽管大家不愿南征，可也不能眼看着御驾孤征呀！于是也顾不得许多了，大臣们纷纷上马追去，拦住孝文帝的马头，一齐跳下马来，“卜通”一声，齐齐地跪到孝文帝马前，拉住御马不放。孝文帝故作惊讶地问道：“众卿这是何故？”尚书令李冲答道：“陛下这次执意发兵南征，举国上下皆觉欠当，心中疑虑，故而行动迟缓。如今陛下抛下我们，单人独骑，不知欲往何方？我等实在放心不下，深恐有些闪失，则魏国前程不堪设想。”孝文帝装出很气愤的样子道：“我决意南征，不料你们一个也不跟我同心，岂不令我失望。既如此，休要管我，我自去灭那南朝！”群臣这时也不知怎的变得胆大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哭着、闹着说：“陛下不要我们了，这可如何是好！”孝文帝做足了戏，然后好像十分体谅群臣似的说：“既然大家都不愿南征，我也不想再难为你们，但是大军已经出发，好比箭已经离弦，再也回不到弓上。我们现在该用什么理由向世人交待呢？”

群臣一听，觉得事情有了转机，于是七嘴八舌议论开了。不知是谁冒了一句话：“就在洛阳呆个一年半载，再班师不迟。”孝文帝听了，接过话来说道：“那好，就在洛阳住下，把都城也搬到这里来，行不行？”群臣又是

一番议论，有的说行，有的说不行，还有的说：“只要不南征，怎么都好，搬就搬吧！可我们平城过得好好的，为什么一定要迁都呢？”孝文帝听完，斩钉截铁地说：“就这样了，不南征，我们迁都洛阳。”他见群臣还在犹豫，就下令道：“这么着吧，愿意跟我迁都洛阳的，往这边站；不愿意的就往那边站。”说完，看了看拓跋澄。

拓跋澄当然心领神会，第一个站起来，走到孝文帝这边。群臣见任城王如此果断，也都一个个跟着站到孝文帝身边。只剩下几个不愿迁都的，见自己势孤力薄，知道再反对也没用，只好随了大流。孝文帝见计谋成功，不觉满意一笑，群臣也就高呼“万岁”，一起回到洛阳。

孝文帝不辞辛苦，一一作了周密布置，委派几个得力大臣去照章执行，并作好迎接平城留守官民的准备。拓跋澄则奉命返回平城，主持都城南迁的一切事情。他回到平城，传达了圣旨，最后说好说歹，众人总算答应下来。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一切准备停当，北魏都城正式迁到洛阳，孝文帝的改革又迈进了一步。

魏孝文帝改制

魏国都城顺利地由平城迁到洛阳，魏孝文帝抑制不住成功的喜悦，更加坚定了改革的雄心，一个更彻底的改革主张已经在他心中酝酿成熟，他要从根本上改变鲜卑人的面貌。

为了让人数极少的鲜卑人永远统治华夏大地，孝文帝决定哪怕暂时背上背祖弃宗的骂名，也必须改革政治制度，彻底移风易俗，全面实行汉化。他对汉文化了解很深，十分羡慕汉文化的好处，更知道农业经济比游牧经济富足、稳定得多，而一旦实现鲜卑人和汉人的同化，鲜、汉两族的矛盾便会自然消失，拓跋氏的政权也就更加牢固了。

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上的改革难度相当大，弄不好就会出乱子，甚至闹得不可收拾。魏孝文帝很懂得这层利害关系，他必须作充分准备，而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又最为关键，因为掌握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就能既不怕内乱，也不怕外患，还可以在时机有利时，一举伐齐，统一中国。所以在迁都洛阳的当年，他就仿照魏太武帝建立河西牧场的办法，在河南汲县建立了一个河阳牧场，养军马10万匹，还计划逐年从河西牧场选一批良马到并州牧场，再转到河阳牧场，让马匹渐渐习惯内地的水土。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他又选了15万鲜卑勇士，组成宿卫军，直接控制在自己手里，拱卫洛京。

接着，魏孝文帝便在统治集团内部公开了他的改革计划，即全面实行汉化，他对大臣们说：“如今已迁都洛阳，位居中原，自与平城不同，过去僻居塞上，胡风国俗杂糅，以不知华典为当然，而今须一改旧习，做到鲜、汉一体，方能久据中原，保我大魏江山永固。不知众卿以为如何？”大臣中鲜卑族元老穆泰当即表示反对，他说：“恕老臣直言，我鲜卑族向来以勇悍善战，名震天下。祖宗逞铁骑之威，扫灭各部，建都平城，实望传之万世。如今迁都洛阳，本已失策，况我鲜卑民众，祖居塞上，天高气朗，不耐这洛阳暑热，久之必生疾病。若再改习汉俗，岂不断我族类了吗？故万不可行，乞圣上明鉴。”拓跋丕、陆叡等元老人物随即响应。

孝文帝听了，心里颇不高兴，口里却还在问：“诸卿还有何高见，但言不妨。”一些持折衷观点的大臣便乘机进言道：“我主圣明，洛阳确实胜过

平城，迁都来此，日后定然兴旺。只是鲜汉一体，恐难骤行，不如顺其自然，随民所愿为妥。”孝文帝虽稍觉顺耳，但心里仍不以为然。那些平日里就不断撺掇孝文帝改行汉俗的世族达官，如王肃、李冲、崔光等人，一一出列，坚决拥护魏孝文帝的主张，凿凿有据地陈说利害、力排非议，终于占了上风。

孝文帝见穆泰等人辞穷理尽，便大声说：“我意已决，众卿若是愿我有所作为，就得速改旧制，不许违拗！若是指望沿袭旧制，不思变革，欲陷我于平庸无能之地，我得先免其官，再罪其身。”众大臣经过迁都一事，早已领教过孝文帝的厉害，于是纷纷表示顺从道：“我等愿皇上圣威永驻，愿我朝江山永固，日新又新！”孝文帝这才高兴起来，称赞道：“这才是我的满朝忠良呀！”并积极准备落实各项具体改革措施。

其实，穆泰等一班鲜卑元老并未心服，他们不甘就此认输，便想方设法要阻碍改革的进行。他们知道太子拓跋恂特别留恋平城，就打上了他的主意，指望借太子的所作所为让孝文帝无可奈何，最后只好收回成命。他们暗地里或是夸太子有祖上遗风，善于胡服骑射；或是诱太子可任意而行，不如复返平城。而太子本人因为心宽体胖，原本就忌洛阳暑热，喜平城高爽，常有追念北方之意，经元老们一鼓动，就更来劲了。这时，恰逢孝文帝出巡嵩山，命拓跋恂镇守洛阳，拓跋恂见父亲不在京城，觉得机会来了，就偷偷叫马夫给他备一匹好马，准备跑回平城去。不料他还没出城，孝文帝已经回来，并发觉了他的意图，非常生气，当即取下家法，一顿狠揍，骂拓跋恂胆大包天，竟反对迁都，要误拓跋氏万世家业，是不孝孽子。并为此召集群臣，商议要废掉拓跋恂的太子身份。群臣不忍，拼命为太子求情。孝文帝见穆泰等元老最为着急，就猜到他们一定与太子暗中联络过，想借太子来阻碍改革。于是把心一横说道：“自古以来都以‘大义灭亲’为最不容易，这个逆子既然反对迁都，就是目无君父，如果今日饶了他，还不知道他明日会做出什么事来，那叫我如何治理国家、管教臣民们呢？因此须为国除祸，此事断不可饶！”当即下诏，废太子为庶人，逐出东宫。不久，拓跋恂又联络一些反对派，意图报复，孝文帝早有察觉，派兵将拓跋恂抓来，用一杯椒酒将他毒死了。

孝文帝杀子，意在震慑朝廷中反对派大臣，扫除改革障碍。可穆泰、陆叡等人并不以此为戒，在这一年冬天，又暗中联络了镇北大将军乐陵王拓跋思誉、代郡太守拓跋珍、阳平侯贺赖头等人，策划拥立朔州刺史阳平王拓跋颐为帝，从平城起兵，将孝文帝废灭。孝文帝很快得到消息，抢先下手，派他所信任的任城王拓跋澄率军前往镇压叛乱，接着他自己也统领宿卫军精兵出巡平城，大批捕杀反对派，终于把这次政变镇压下去了。

经过这次严厉镇压的打击，顽固分子所剩无几，再不敢以身试法了。魏孝文帝从此得以放手进行改革，不受丝毫牵制。

他除了巩固继位以来颁行的官员俸禄制，三长制、均田制和禁止鲜卑人同姓相婚、禁革鲜卑人袒裸陋俗等禁令外，在成功镇压穆泰等人政变阴谋后，孝文帝又颁行了改鲜卑复姓的诏令。当时，他带头将拓跋氏改为元氏，因为北人称土为拓、称后为跋，魏国认为他们祖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就姓了拓跋。而土是黄色的，它是万物之元，所以改姓为元。同时，北魏皇族和所统部落的姓氏也改为汉姓，改了姓，名字当然也改用汉名。并诏示天下，有恢复旧姓的，一律严惩不贷。

此外，又在洛阳办起了学校，命鲜卑人学习汉语，将汉语作为北魏国语。而且从朝中官员改起，凡30岁以下，上朝用鲜卑语奏事者，立即降爵黜官；

30 岁以上者，限期改正，否则不予任用。同时，严令鲜卑贵族，凡死于洛阳者，不得还葬平城，并改籍为河南洛阳。

接着，又准备了大批汉式衣帽，赐给群臣，命令他们穿汉服上朝。同时，又仿照南朝装束，设计出女式汉服，加以推广。通过上行下效，紧身窄袖的胡服很快改为宽身大袖的汉装了。

孝文帝甚至连人种也没放过，他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自己还带头娶了一个汉族女子为妃，又给他六个兄弟各娶了一个汉族姑娘。就这样，从皇家、贵族，直到细民百姓，天长日久，鲜卑人和汉人就融合成一个民族了。

在一些大事上，孝文帝做得更坚决，比如改定郊祀宗庙礼、改官职名称、改王法律令等，都改得和汉族制度一样，这么一来，魏国政权变成了华夏正朔相承的王朝，魏孝文帝也就变成君临华夏的正统皇帝了。

经过这么一改，再把都城街市修建一新，整个洛阳跟着就热闹起来，人物鼎盛、市场兴旺，一派繁华景象，消息传到平城，那里的人再也不愿自甘苦寒了，纷纷迁入洛阳。几年以后，北魏国力便大大昌盛起来，真有那么点统一中原的实力了。

魏孝文帝在一切措施都顺利进行并获成功后，南征大计终于提上了日程。太和二十一年（公元 497 年），正是齐王朝内部已经杀得差不多的时候，他亲率大军南下，意图扩大疆域，却不料落得无功而返。第二年，他又起大军再次南下，竟然又未能达到目的。齐朝见北魏不过如此，第三年，齐国大将陈显达便找上门来，兴兵攻魏，魏孝文帝当时正在患病，一见战报，猛地跳下病榻，披甲上阵，率精兵迎战，将陈显达打得大败而逃，他正要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以了宿愿。然而天不助人，孝文帝只觉身体支持不住，不得已下令班师，还没等回到洛阳，就在归途上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贾思勰和《齐民要术》

贾思勰是北魏时期杰出的农业科学家，山东益都人，做过高阳郡（今山东淄博市）太守，他倾注毕生心血写成了一部农业科学著作《齐民要术》。该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从理论上系统研究农业的百科全书，在我国和世界农业科学发展史上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堪称为不朽的农业科学巨著，贾思勰也因此而名垂史册。

贾思勰在农业科学研究上取得的显赫成就首先是在于他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北魏帝国的君主，是北方游牧部落鲜卑族拓跋氏，国人多以畜牧业为生，对农业生产不大重视，游牧生活使得民众常年过着无法安居乐业的生活。北魏政权建立后，拓跋珪执政伊始，便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天兴二年（公元 399 年），拓跋珪称帝后，治国方略中便有解散游牧部落的内容。他亲耕籍田，广兴产业，因此北魏经济日益繁荣。由于鲜卑人毕竟具有好战的特征，魏道武帝治国也就忘不了军事掠夺，在连年大战中，最困难的便是缺少军粮，军粮的富足与否显然成为了战争胜负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由此推而论之，如果粮食牲畜富足，人民就能过上安定生活，鲜卑人或许会改变靠掠夺别人的财富过富裕生活的习性。因此，国泰民安的关键还在于发展农业生产。

生活在北魏时期的贾思勰对此体会得太深了。他决心投身到农业生产的实际中去，亲自养羊，种庄稼，从实际操作中总结经验，推广农业生产，使

北魏政权强盛，人民生活富足安定。

贾思勰深知，北魏国人对畜牧业生产有着较多的经验，而且也习惯于饲养牛、羊等牲畜。如果自己在这方面能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使畜牧业生产有较大发展，北魏国人自然会接受并信服他，在此基础上再推广农业生产，便会顺利得多了。于是，他开始养羊。一次，他养了200头羊，由于缺乏饲养经验，事先不知道一头羊该准备多少饲料，最终因饲料供应不上，不到一年，200头羊饿死了一大半。贾思勰并不气馁，继续干下去，接着他又养了一群羊，并且种了20亩大豆，他想，这次羊总不会死去了吧！哪知饲料倒是不缺，可羊还是死了许多。贾思勰百思而不得其解，实在无计可施。成天茶饭不思，苦恼至极，邻里看到他这种状况，恐怕他急出病来。一位好心人打听到离他们这里100多里外有一位养羊高手，立即把这消息告诉了他。贾思勰听后二话没说，连夜赶到那里向老羊倌求教。

贾思勰一到老羊倌家，便拜老人家为师，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养羊的情况，诚恳地请老人家指教。老羊倌被他的诚意所感动，留他在家住了好几天，让他仔细观看自己的羊圈，并且从羊的选种、饲料的选择和配备、羊圈的清洁卫生及管理方法一一细细讲述给他听。贾思勰从老羊倌的叙述中，似乎明白了自己第二次养羊失败，大概是由于羊圈管理不得法的缘故。老羊倌说：“你的悟性真高，羊是不吃自己撒过尿拉过屎的饲料的。你把饲料乱扔在羊圈里，让羊在上面踩来踩去、拉屎撒尿，尽管你吸取了第一次饲料不足的教训，准备了足够的饲料，但不懂得羊是不吃弄脏了的饲料的道理，你不打扫好羊圈的卫生，就是准备再多的饲料也是白搭啊！不过，像你这样的有志之士，一定会把羊养好的。”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贾思勰回去后，按照老羊倌的指点又养了一群羊，这群羊可养得膘肥肉壮，产奶也多，成活率相当高。从此，贾思勰的名声传了出去，越来越大，向他求教的人络绎不绝，人们信服地称他为养羊能手。

贾思勰发展农业生产的第一步计划付诸实现后，他便着手试验耕地种庄稼。从养羊的成功中，得出了一条十分宝贵的经验，那就是向老农虚心求教。于是，他不辞劳苦，跋涉千里，足迹遍布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省田间地头，在茅草屋里、在地头窝棚里，他与老农促膝谈心，仔细地询问他们如何施肥？如何犁地？如何选种？不同上质的地又该如何下种等等。老农们也为他谦虚、求实、好学的精神所震惊，称他是农业生产的有心人。因此，毫不保留地向他传授自己的实践经验，告诉他：“这种是种庄稼不可草率的大事。一般人仅仅知道选种要选长得饱满的穗子，但未必知道还要察看种子的颜色纯洁不纯洁。同时还要注意把割下的穗子高高挂起，待到来年春天再打下来做种。人们更不知道土质不同、气候有别的地，对品种要求是不同的，它们的区别，主要在茎杆上。一般说，潮湿温暖的低地种谷子，要选用茎杆柔弱、生长茂盛的；风大霜重的山地种谷子，要选茎杆坚实的。犁地在七月间，犁地之前，要看地里长没有长茅草，长着茅草的地，需先赶着牛羊在上面踩一遍，等七月犁地时，茅草才会死去。”贾思勰学到这些宝贵经验后，便回去照此办理。在实际耕作中，他自己又摸索出不少规律，同时还悉心研究了前人关于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方面的大量资料，结合自己的实践体会，吸取前人著述的精华，舍弃了一些实践证明不妥的说法，写出了《齐民要术》一书。

《齐民要术》对农业生产的理论作了系统地阐述，而且具体操作的各个

环节都写得相当具体、详细、全面、清楚，不仅超过了前人的同类的著作，而且在世界上也达到了领先水平。难怪有人说：“真可谓‘前无古人’！”比如：“平整土地”一项，贾思勰既指出了耕地的重要意义和要求，又特别详尽地讲述了耕地分为春、夏、秋、冬，讲究深、浅，注意初、转、纵、横、顺、逆等，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进行耕作和管理的方法，甚至连耕坏了怎么补救的办法他都写进了书中。这些内容在我国战国时代秦国吕不韦所编的《吕氏春秋》和汉代的《汜胜之书》里，虽然都有所涉及，但远远没有贾思勰谈得那么透彻、那么便于操作。

对如何提高土地的地力，使农作物能不断从土地上得到充足的养料，贾思勰更是有独到精辟的见解。他在《齐民要术》中提出了多种办法，其中尤其以轮种、套种最佳，通过不同作物的轮换栽种，或几种作物同时栽种使地里的养分尽其所用，并且还能促使地力尽快恢复。他明确地把先种哪些作物，后种哪些作物，以及采用不同的轮种方法得到不同的效果都一一记载下来，而这一切西欧人在当时仅识皮毛，只知道采用轮换休耕的办法提高地力而已。可见，贾思勰的研究比起当时的西欧来要先进得多。

《齐民要术》的学术价值无疑是世界一流的，对促进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这部农学巨著还为今天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了解和研究我国农业科学的发展史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齐民要术》分 92 篇，共 11 万多字，内容丰富，从大田作物中的谷类作物、油料作物、纤维作物到绿肥作物、饲料作物、香料作物、水生植物，以及瓜、果、蔬菜甚至树木无所不包，并且对农林副业，诸如制酱、酿酒、饲养鸡鸭、猪牛也一应俱全。贾思勰之所以能写出这么庞大的农业专著，一方面是他辛勤实践、向老农学习总结出来的，另一方面也是他参阅了古代有关农业方面的书籍，吸取了前人的成果，博采众长得来的。贾思勰对前人的成果既不一概否定，也不盲目照搬。譬如：汉代的《汜胜之书》中有关于黍子的种植要稀一点的观点，贾思勰却提出黍子密植比稀植好的说法。他的理由是，稀植的黍子优点在于棵发得大，但带来的弊端是谷粒不饱满，因而瘪谷多，米色较黄。密植虽然棵发得小，但谷粒均匀，米色白，从而纠正了自汉代以来的误导。《齐民要术》一书中引用古书达多 150 余种，对战国时期诸子中的农家许相，到北魏时期有价值的史书，他都作了许多摘录，其中不少书今已失传。正因为《齐民要术》的摘引，才使得后代的研究者有可能从他的转述中窥见这些失传而又极有价值的史书的大致面貌。从这一点上看，贾思勰不仅为我国农业科学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对我国古代文化的保存也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科技奇才祖冲之

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六年（公元 429 年），在范阳郡道县（今河北涿水县），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诞生了，他就是今天被誉为世界文化名人的祖冲之。

祖冲之，字文远，为人聪敏机智，从小就喜欢琢磨问题，尤其是对古代的发明创造，总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并认真进行考察分析。早在宋文帝时期，他就发现当时的通行的《元嘉历》不够精密，于是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夜观天象、细加记录，白日则整理、验算，力求精确，终于在宋孝武帝大明六年（公元 462 年）制成了新历，祖氏新历最早把岁差引进历法计算。它采用 391 年加 144 闰月的新闻周，提出了新的木星周期，使用的回归年长度为

365·2428日，与今推值仅差46秒。朔望月长度则为29·53059日，与今推值相差不到一秒。交点月长度为27·21223日，与今推值仅差11秒。他还发明用圭表测量冬至前后正午日影以定冬至时刻的方法等等。他把新历送给皇上，请求颁行全国，取代旧历。宋孝武帝刘骏让朝中懂得历法的大臣面试祖冲之，提出各种难题，祖冲之都一一对答如流。尽管这样，守旧势力仍然进行抵制，以大臣戴法兴为首，妄言新历歪曲天象，违背经典，万不可用。祖冲之为维护科学的尊严，据理力辩，他驳斥守旧派道：“你们口口声声说古历万不能换，可是《元嘉历》不也是本朝才开始用的吗？为什么这十几年你们一声不吭，听任《元嘉历》取代古历，而现在却又死不肯换新历呢？”他请求宋孝武帝不要听信守旧派的滥言，指出对前人制的历法，不可完全不信，更不能全信，凡事要据实而论。他特别强调新历是他长期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在掌握了它们运行规律的前提下，经过多年计算提出来的。宋孝武帝听他说得确实有理，而且此事可成也是他的德政，便有意试行，他还根据当时年号，给新历取名为《大明历》。然而好事多磨，没等宋孝武帝下令颁行，这个君王就一命呜呼，而以后的废帝、明帝、苍梧王等，只顾一心杀戮，哪有功夫去管历法颁行的事？因此改历之说，自然也就如石沉大海，无人问津。直到齐武帝萧赜永明年间，文惠太子在东宫见到《大明历》，很感佩服，便请求皇上施行，由于太子不久便死了，新历又失去一次推行的机会，后来直到祖冲之逝世十年后的天监九年（公元510年），《大明历》才得以采用，这时已是梁朝武帝萧衍时期了。

到宋朝末年时，萧道成辅政，他知道祖冲之才干非凡，就命人将宋武帝刘裕平关中击败姚兴时缴获的指南车找出来，叫祖冲之加以改造。姚兴的指南车仿古车之形，其实并不能指南，祖冲之拿来后，很快发现问题，他设计了一种铜机，装在车内，使之圆转自如，而方向所指始终不变，恢复了古车的指南功能。这时，北方有个机械制造能手叫做索驭麟的，也宣称会造指南车。萧道成闻讯，马上请他带上车，到乐游苑比试，结果索驭麟的车毛病很多，被当场烧掉。于是，祖冲之声名鹊起，当时人们视他为自三国时期机械制造专家马钧以后的又一位科技奇才。

祖冲之还根据诸葛亮造木牛流马的历史资料，制出了一种代替人力的运输工具。接着，他又研制出日行100多里的“千里船”，并在新亭江试航成功。此外，祖冲之还发明创造了利用水力的水碓磨等许多实用机械，提出了开屯田发展农业的《安边论》，为发展生产呕心沥血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齐武帝萧赜的宽厚态度，造就了皇族成员中一些人比较活跃的思想，他的次子竟陵王萧子良就是其中的一个。萧子良在研究学问时发现古书上记载的欹（音q）器很有意思，欹器是一种特殊的水罐，当它空着的时候，往一边倾斜，往里注到半罐水时，便稳稳地直立起来；而当水盛满后，则“叭”地一下都翻了个身，把罐里的水倒个精光。据说孔子因此得到启示，感慨万千地说：“世上哪有自满而不翻掉的事啊！”萧子良既喜欢欹器的精巧设计，又信服它的哲学内涵，希望借此提醒自己切勿自满。消息传播出来，祖冲之听了，很乐意支持他，不久便造成此物，献进宫中，得到赞赏，祖冲之的影响也就更大了。

祖冲之的最大成就还不是天文学和机械学，而是数学。由于推行新历的不顺利，他只好暂时放下这桩心事，潜心研究学问。

一次偶然的触动，祖冲之忽然想到小时候，见有本算书里说过“径一周

三”的话，意思是圆的直径和周长的比是一比三。结果真是这样吗？他很有些信不过，决定实际测算一下。于是，找来一根长绳，绕着车轮量出圆的周长，然后又量出这只车轮的直径，再用周长除以直径，结果并不是整整三倍，而是比三倍略多一些。

在思索实测结果的当儿，他又读了许多古代数学家的著作，三国时数学家刘徽关于“割圆术”的研究成果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刘徽的办法是在圆内作一个正六边形，正六边形的一个边长刚巧相当于这个圆的半径，也就是说正六边形的周长等于这个圆的直径的三倍。如果把正六边形每条边所对的弧取中点与边线端点连接，圆内就出现一个正 12 边形，根据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的法则，这正 12 边形的周长肯定大于原来那个正六边形，但仍然略小于圆的周长。照此办理，不断分割为正 24 边形、正 48 边形、正 96 边形等，总之，边数越大，它的周长就越接近圆的周长。刘徽用“割圆术”割到正 96 边形，这时周长是直径的 3.14 倍，也就是说圆周率应该是 3.14，而不是 3，准确地说，它比 3.14 还略大一点。

这个“略大一点”大多少？能不能再准确地算出来？祖冲之和儿子祖暅（音 xu n）决心刨根问底，父子俩想到做到，他们先把一大块地碾得平平的，画了一个很大的圆，然后按刘徽的办法割圆，当割到正 96 边形时，果然跟刘徽一样。再往下割，就将产生前所未有的结果了，这自然更激起祖氏父子的强烈兴趣，于是地上出现了正 192 边形、正 384 边形、正 768 边形、正 1536 边形、正 3072 边形、正 6144 边形、正 12288 边形，最后直到正 24576 边形。由于边数越多，边长就越短，这时每边的长度只有 1 厘 2 毫 7 丝 8 忽 3 微，再往下还应当割正 49152 边形、正 98304 边形，以致更多倍的正多边形，可是由于绘画和测量条件的限制，已不可能再继续画下去。祖冲之想了想，只好说：“就这样吧！看来这么割，圆是永远割不完的。”

经过计算，正 24576 边形的周长是直径的 3.1415926 倍，还略略多一丁点儿，但不会超过 3.1415927 倍。这样，祖冲之便肯定地指出：圆周率在这两个数字之间。在表述形式上，祖冲之很快考虑到分数， $\frac{22}{7}$ 等于

3.1428571 ， $\frac{355}{113}$ 等于 3.1415929，前者不太准，但容易记忆；后者比较准，但难记些。于是，他称前者为圆周约率，称后者为圆周密率。

祖氏父子的精确计算，显示了中国人的聪明智慧。这个结果不仅大大超过前人，而且在全球也是首屈一指的，这一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比起欧洲人来要整整早了 1000 年哩！

祖冲之确实不愧为科技奇才、人类智星。

范缜放《神灭论》

范缜出身贫苦，为人却很有志气，他不贪荣华、不惧权贵，经常说出令当时人们闻之一惊的“危言高论”，而细想起来，又让人觉得确实很有道理。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他的“神灭”之谈。

范缜主要生活时代在齐朝统治期内，萧齐政权的统治者除了和前代封建统治者一样专制外，还极其崇神敬佛，以致举国上下寺庙林立，僧侣不劳而食，这给经济上本已十分困窘的民众又增添了一笔沉重的负担。

竟陵王萧子良，对古代的东西很感兴趣，他除了请祖冲之造欹器外，还收藏了不少古人的器皿、衣服，并把这些东西集中起来，藏于京城西郊鸡笼山专门建造的一座古斋西邸里面。他还请些当时的才学之士，如沈约、谢朓、王融、萧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八友”以及祖冲之等人到那里聚会，以致斋中经常出现宾客云集的场面，萧子良面对满斋高朋，与他们畅谈天下学问，请人抄写“五经”和“诸子百家”著作，并编成多达一千卷的《四部备要》，为典籍的保护和传播做了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萧子良非常佩服大禹的治水之功和生活俭朴、热心救助黎民的圣贤之举，很愿意仿效他而做些善事。正因为此，他曾经开仓赈济水灾灾民，还对贫病交加的百姓赠衣送药，由于他认为弘扬佛法是更大的善事，于是就在西邸招聚名僧，讲经作法，致使斋中常常经音绕梁，成为南朝一大盛会。

佛教教义称人生是苦，认为导致“苦”的原因则在于每个人自身的“惑”和“业”。“惑”指的是贪、瞋、痴等各种烦恼；“业”指的是身、口、意等诸般活动。“惑”与“业”势必构成形形色色的善恶行为，从而造就不能休止的轮回报应。而现世中的人们，如果想超脱轮回的无边苦海，唯一的解救方法就是虔心向佛。

那么，像萧子良这样大富大贵的有福之人，又有什么苦呢？在西邸讲经的佛门子弟告诉来这里的人们说：人的灵魂是永恒的，而肉体只是一具“臭皮囊”，肉体可以死亡、腐烂，灵魂则需要经过地狱的考验，然后投胎，重新回到这个世界上，或者做人，或者做畜牲。因此，每个人都有不能了断的前生、今生和来生。就像聚在西邸的宾客一样。由于前生做了功德不等的善事，积了阴德，因此今生就享福，就尊贵。但如果今生不珍惜福泽，不继续行善布德，来生或许就会投生贫苦人家，受一辈子委曲，吃一辈子苦和累；如果做了坏事，积下罪愆，可能今生便会受难，而来生或许就会变成牛马猪狗之类，任人喝打宰割，痛苦不堪。反过来，不论是谁，只要他一心行善积德，来生就必然会有好日子过；如果他今生始终不渝地信佛崇佛，身体力行地弘扬佛法，广结善缘，他甚至还可能通过“涅槃”而达到超脱轮回的美妙仙境。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因果果，皆有报应的道理。

就在名僧高论大行其道之时，西邸的一角竟有人忍俊不住、嘻声忽起，使得沉醉于佛境中的讲道和听道的人大吃一惊，急忙抬头观看发生了什么事情。萧子良的目光也移到发声之处，那里正坐着他的客人范缜，于是沉下脸来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范缜趁机站起身来指着法坛大声答道：“那个和尚一派胡言！请问，一个人连身体都死了、肌肉都腐烂了，哪里还会有精神、有灵魂呢？更不要说有什么来生了！”座上说法的高僧一听，这还了得！正要狠狠吓唬吓唬这个不忌生冷的年轻人，却发现此时萧子良已在训斥谤佛的客人了：“赶快收敛邪念，跪到佛像前请罪，否则必下割舌地狱无疑！”面对萧子良的急呼，范缜却像没听见似的，安安稳稳地坐了下来。这下子可把萧子良气得不轻：“就算你不把我竟陵王放在眼里，也不敢得罪佛爷呀！”于是忍不住责问道：“你真是胆大包天！那么你说说看，如果没有前生那本帐，为什么有的人生来富贵，有的人生来贫贱呢？”这一问，引得僧众和宾客纷纷起来指责范缜，你一言，我一语，闹闹嚷嚷，彼伏此起，斋中如同开了锅一般，谁也听不清楚别人说了什么，而范缜则若无其事坐在那里好笑。萧子良急得拍案大叫：“大家安静！让范缜回答。范缜，你说呀！”

范缜这才从容起立，开口道：“各位稍安勿躁，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吧。

有一棵树开满了花，忽然吹来一阵风，花儿随风坠落，有的落入屋里、落到褥子上，有的飞过矮墙，掉到粪坑里。同是一树之花，遭遇如此不同，难道说这也有什么因果报应的关系吗？显然没有吧！人也是如此，王爷就好比是落在褥子上的花，而我则好比掉到粪坑里的花，哪里扯得上什么前生善恶？各位不妨扪心自问，你们谁真的知道自己前生做了什么？有哪些善行和恶德？为什么今生要做和尚或者当宾客呢？”一席话，说得满座哑口无言，萧子良只好讪讪地宣布散席了事。

接着席间的思路，回宅路卜范缜越想越觉得此事非问一般，到了家中，他迅即奋笔疾书，写了一篇题为《神灭论》的奇文，文章把人的形体和精神比作刀刀和刀刃的锋利，并发问道：“如果没有刀刃，哪来刀刃的锋利？”文章接着指出：“同样，人如果没了形体，又哪有什么精魂可言呢？要知道，世间从来就没有什么鬼神，那些人死为鬼，鬼投生再变人的‘三生’之说，纯粹是无稽之谈。如今举国上下，修建那么多寺庙，养活那么多僧尼，一点用处都没有，只能枉费资财，空耗人力，弄得国穷民困，每况愈下。”《神灭论》以唯物主义思想，论证了精神依存于形体，“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道理，终使人们逐步懂得了人的精神只是形体所发生的作用，而形体则是精神所从属的实体；精神是不能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的这个客观规律。

一石激起千重浪，《神灭论》一经传出，立刻引得“朝野喧哗”，佛门弟子更是反应强烈，非要找范缜辩论清楚不可，萧子良也认为范缜太不像话，专门召集了一批佛门精英，让范缜出来答话。可是，范缜无论众僧骂了他多少“罪过”，列举出多少桩“理由”，一概不予纠缠，只是紧紧抓住对方要害反诘一句道：“你们都说世上有鬼神存在，请问谁亲眼见过？”结果不言而喻，众口哑然。范缜告诉众人：“既然谁也拿不出鬼神存在的证据来，就说明鬼神之事的虚幻。我就从不相信什么鬼神，也不相信有什么因果报应。你们看怎么办吧！”众僧绞尽脑汁，依旧无计可施，对“辩摧众口，日服千人”的范缜实在无可奈何，只好恨恨地咒道：“你妄灭神佛，天地难容！死了之后，必下地狱、必变畜生不可！叫你永世不得投生！”范缜知道他们已无理可言，那些忿忿之辞，只是不愿服输的挣扎罢了，于是哈哈大笑而去。

萧子良见一法不成，又设一谋，特使王融出面秘访范缜，谈到《神灭论》的辩论之事后，悄悄提出：“像你这样坚持没有鬼神的说法，违反了我们一向遵循的教训，实在不可取。你才德双全，假若能为前程着想，改弦易辙，又何愁当不上中书郎那样的高官显职呢？”范缜仍然不为所动，笑而答道：“假如我卖论取官，则早已官过中书郎了，何必你劝！”就这样，断然拒绝了萧子良的劝诱。

检籍与反检籍

萧道成对于刘宋政权时的户籍混乱状况一直积郁在心，当他建立齐朝，坐上皇位以后，为保证朝廷的赋税收入，立即着手清理户口、检定簿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检籍”事件。

建元二年（公元480年），萧道成诏示群臣，明确指出：“由于民间欺巧，户籍混乱，且为时已久，积弊甚重。而此事关系民之大纪，国之治端，故须力加整肃，刻不容缓。”他敕令骁骑将军、黄门郎虞玩之和另一位骁骑将军傅坚意立即着手检籍。

户籍问题确实是南方政权复杂而敏感的大问题。早在东晋南迁之时，一些北方世族和民众便随之南下，于是南方大地便出现了许多侨乡、侨县乃至侨郡，这些侨居者开初原有因逃避战乱而暂时居住的意思，一待王朝收复失地，便要北归，故而当地官府并没有将他们注入户籍之中，可是令官府始料未及的是这次迁徙后，许多人便再未返回原籍。久而久之，这批人便成为特殊的一族，他们因为没有户口，因此也就没有服兵役、徭役和交纳税赋的义务。这对东晋王朝显然十分不利，对当地土人也显得极不公平。为此，东晋政府便采取了一项应对措施，称为“土断法”，即对这些侨居者补充登记，不问原籍何在，一律按照他们现居乡土，由地方政府官吏根据新登记的情况收缴赋税、摊派兵役、徭役。

由于当地土人的户籍是按世族和平民分别登记的，世族人口登记在黄皮簿册上，称为“黄籍”，可以享受“百役不及”的特权；而侨居人口则不分贵贱，一律另登在白皮簿册上，没有任何利益可言。因此，户籍问题未能真正解决，不少人为了获得特权，便纷纷采用各种欺骗手段，务求把自家姓名登上“黄籍”方才甘心，以致情况越来越混乱。

到宋文帝即位后又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可是，由于战乱频繁、政权更替，有的人家或死或残或迁，也有的人家为新王朝立下功劳、成为新贵，情形发生了很大变化。刘宋王朝便于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订出八条措施，重新调查落实。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公元454年），按新调查的情况进行登记，登记的办法仍然和前朝相同。许多人为了避免赋役，都说自己是世族，想方设法要入“黄籍”，为了达到目的，有的人便买通官吏，假冒世族；有的人则伪造勋绩，设法蒙骗，一时行贿受贿、欺瞒诈骗之事不绝。当然，也有些确有爵位的人家，或因家族变迁、或因另有隐情，没有进入“黄籍”，以致怨愤不已。朝廷为此忙得不亦乐乎，甚至连年逾七旬的光禄大夫傅隆这样的人，也“犹手自书籍，躬加隐校”。而结果却是越弄越复杂，越登越登不清楚，简直到了真伪莫辨的程度。

刘宋王朝不得已，只好进行复查，从宋明帝泰始三年（公元467年）到宋后废帝元徽四年（公元476年），经两代帝王，历时九年，清理的结果，仅扬州等九郡四号黄籍，就查出来71000多户进行注销，称为“却户”。可是，这当中又有不少误却者。至于其它边远一些的地方，就更难以清理了。

鉴于上述历史原因，虞玩之受命之后，便上书齐高帝，列举种种作弊情形，建议以刘宋元嘉二十七年版籍为基准，重新登记。若再有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出，无论何人，一律严加惩处。”萧道成采纳了这个建议，还专门设置了校籍官，为防止懈怠，规定每人每日必须查出若干作弊人户。这一个官员们急了，为完成定额，便不顾真伪虚实，又把一些本来合法的人户硬从黄籍中却了出来，而一些善于夤缘者，却因贿得免。这些无辜被却者和查出来的其它作假者，加上十家连坐的人户，全都遭到发配戍边的惩罚。从而产生了更大范围“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的现象，其结果无权无钱的广大善良民众成了检籍的最大受害者，他们满怀嗟怨，在难以存身的情况下，或者被迫流徙，或者“奔窜湖山”举行起义，萧齐王朝则不思自省，竟将注入“白籍”的起义者称为“白贼”，进行残酷镇压。

然而，压迫愈甚，反抗愈强，到齐武帝萧颐永明三年（公元485年）冬，富阳“却籍”百姓唐寓之，利用会稽太守王敬则去朝拜皇帝的机会，聚集400余人，举行起义。他们首先攻下富阳城，接着在第二年春相继袭破桐庐（今

浙江桐庐县西），占领钱塘（今浙江杭州）、盐官（今浙江海宁县西南）、诸暨、余杭，同时还分兵进击，一支部队攻袭了东阳郡（今浙江金华），杀了齐武帝的族叔东阳太守萧崇之；另一支部队则攻取山阴，势如破竹，直打到曹娥江。影响所及，民众风从，“三吴却籍者”前来投奔的达3万人之多。声势十分浩大。可惜的是，唐富之没有把这股起义烈火燃得更烈更远，而是满足于已有的胜利，白以为大事已成，便匆忙在钱塘称帝，设置文武百官，建立吴政权。

齐武帝当然不肯干休，急派台军数千赶往镇压，台军就是皇帝的禁卫军，是齐武帝的精锐之师。经过激烈的战斗，唐寓之被俘牺牲，起义归于失败。台军攻入钱塘，乘机大肆烧掠，跟随唐寓之起义的“却籍”民众大都被押往白下城去改建都墙，强制劳役，部分人甚至还发配到淮河一带作十年戍卒。尽管起义失败，结局悲惨，但“却籍”民众反检籍的斗争并未因此而动摇，他们以不屈不挠的顽强战斗精神，迫使齐武帝不得不作出让步，朝廷也终于在永明八年（公元490年）宣布“却籍无效”，恢复刘宋末年户籍原状，允许被发配戍边的却户返归。

唐寓之起义本身虽然失败了，但他所点燃的起义烈火却照亮了被压迫人民的眼睛，齐国大地上从此义旗高扬、彼伏此起，极大地动摇了齐国统治政权。

重蹈覆辙，齐宋同病

历史往往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萧齐政权取代刘宋政权以后，虽然高帝、武帝吸取宋朝的亡国教训，力主宽厚，提倡节俭，严防骨肉相残，保持了15年相对平安的恢复发展时期，但是好景毕竟不长，王室内部不可避免的争权夺位斗争，终于在齐武帝死后爆发出来，演出了又一场重蹈前朝覆辙的宫廷丑剧。

齐武帝太子萧长懋早亡，立容貌华美、胸无实学的长孙萧昭业继位，点着了骨肉相残的导火线。与萧昭业比较起来，萧子良富有执政经历，他不仅善于延揽人才，而且心地宽厚，对待范缜的态度就是很好的例子；萧昭业则不同，他从小长在深宫，年纪尚轻，没有任何统治经验，而且又善于“矫情饰作”，实无帝王之相。

齐武帝临死前还干了一桩糊涂事，立下遗诏让自己的叔伯兄弟萧鸾辅佐新主，彻底排除了亲子萧子良。眼看萧昭业继位，萧子良的日子就十分难过了，他深知这位侄儿皇帝的秉性，加上自己的特殊身份，必然成为新皇的眼中钉，因此终日怀忧，很快在恐惧不安中病故。萧鸾则承诏辅政，一手独掌了国家大权。

萧鸾生性狠毒，心想：“与其别人在位自己受累，还不如除而代之。既然新主无能，何不赶快下手。这真是天赐良机，千载难逢！”他于是抓住萧昭业居丧不哀、乱伦宣淫、挥霍无度、恣意玩乐的劣迹，在族弟萧懿等人协助下，发动宫廷政变。萧昭业见势不妙，躲入爱姬徐氏房中，拔剑自刺不中，随从急救后将他接出延德殿，结果逃到西弄被杀。萧鸾为逃脱弑君之罪，假惺惺立萧昭业之弟萧昭文为帝，自己则广设羽翼，权势日重，皇帝在他眼里只是一个傀儡而已，就连想吃一口蒸鱼菜没有他批准也是办不到的，并很快让太后下令废这个15岁的皇帝为海陵王，接着以有病为托词，将他置于死

地。按说，萧鸾可以大大方方做皇帝了，可他心怀鬼胎，故意做作，让群臣一而再，再而三地恭迎，这才登位改元。他就是和宋明帝一样残暴不仁的齐明帝。

俗话说：“作贼心虚。”齐明帝靠阴谋杀人当上了皇帝，当然日夜担心别人如法炮制来对付他，于是大开杀戒，在位五年，到弥留之际，还不忘下诏诛杀最后十个未成年的小王，结果硬是把除了齐高帝次子萧嶷一支外的所有皇族子孙杀个精光，相煎之急，达到疯狂程度，实在令人发指。

当时，北魏统治地区内的北人支酉在长安北部起义，得到秦、雍之间七州民众的响应，很快发展到10万之众。支酉特地派遣使臣到齐朝请求大军支援，这本来是一个巩固政权、扩大势力的极好机会，可是齐明帝正忙于残杀骨肉，哪有心思顾得上派兵出征，以致坐失良机，让魏孝文帝拓跋宏镇压下去。魏孝文帝倒不因为齐明帝没有派兵而稍微客气一些，相反乘齐国内乱，迅速迁都洛阳，催军南征，威胁萧齐王朝。

建武五年（公元498年），齐明帝在内外交困下病死，他的儿子萧宝卷继位，这就是东昏侯。东昏侯确实昏得可以，而且也没像宋明帝的继承人苍梧王一样，醉生梦死，加上性情十分凶狂。他刚当上皇帝，就变着法子折腾起来，令人制作淫奢异服，放京邑女人入乐游苑观会，更在后宫花天酒地，竟命人把金片铺在地上，让爱妃潘氏在上面行走，称之为“步步生莲花”。再就是后堂戏马，倡伎鼓叫，殿阁失火，加倍翻修，至于朝政奏章，见了就烦，丢在一边不管不顾。除恣意享乐、挥霍外，就是从乃父那里继承的嗜血恶习，他倒是牢牢记住了萧鸾生前对他的教诲：“作事不可在人后。”意思是做了皇帝首先要善于先发制人，把一切可能危及自己的人毫不迟疑地统统杀干净。东昏侯秉承父志，见皇族成员已无人可杀，于是盯住满朝文武，千方百计寻找借口开刀，一个个杀下去，这下子可真把朝臣杀急了，闹得人人自危，谁还有心思去考虑治国安邦之策，于是内乱势所难免地到来了，萧齐王朝的结果也就不会比刘宋王朝好，覆灭的命运正向它的京城逼来。

萧鸾瞑目之际，回光返照，细想自己后事安排已十分妥帖，特别是精心挑选的辅佐大臣，个个忠心耿耿，这才放心地永远闭上了罪恶的双眼。

这辅政大臣一共六名，以萧鸾的亲侄萧遥光、表弟江祐为首，当时人称“六贵”。

齐永元元年（公元499年），东昏侯萧宝卷登基后，并没有体察到其父的良苦用心，只是任性而为，他一上台就委任群小、诛杀宰臣，根本不把“六贵”放在眼里。萧遥光见势不妙，深恐有朝一日，皇帝就把屠刀架到自己头上，于是聚集其余五贵，密谋对策，最后决定废杀昏君，以报社稷。然而他们动作慢了一步，被群小探得消息，报给萧宝卷，萧宝卷这个杀人小魔王一听，这还了得！迅即发旨，抢在前面将“六贵”除了。

萧宝卷的诛杀无度和骄奢淫逸，弄得天下民穷财尽，人心惶惶，迫切希望有人来改变现状。此时，外官们顺应民心，江州刺史陈显达、豫州刺史裴建业先后在寻阳、寿阳两地举义，朝廷派平西将军崔慧景率兵征讨，崔将军也心厌萧宝卷，兵至广陵后便反戈一击，拥立江夏王萧宝玄为主，率兵围攻建康，并直捣宫城门下。齐王朝危如累卵，萧宝卷急命帮助过明帝政变的族叔萧懿率精兵抵御，萧懿果然不负重任，斩叛解围，因功当上了尚书令。其实，萧宝卷对萧懿更不放心，而萧懿也确实有意夺权，结果萧宝卷凭借皇权，乘其不备，急急降旨，将萧懿及其满门统统收杀。

小小皇帝竟如此老谋深算，下手如此迅猛狠毒、寸草不留，这可把镇守襄阳的梁王萧衍震醒了，他见兄长于朝廷有大功劳却竟致非命，推知自己，只要稍有迟疑，必遭不测，因此起了反意。与此同时，萧宝卷果然盯上厂萧衍，派人将刘山阳率 3 000 兵马，会合荆州守军，来袭襄阳。萧衍见状，毅然起兵，他策动掌握荆州军事大权的长史萧颖胄，起兵荆州，这又带动了萧颖胄之弟萧颖乎起兵庐陵，并且共同扶立 14 岁的荆州刺史萧宝融在江陵遥即帝位，同时攻杀刘山阳，声讨萧宝卷。萧衍大军自襄阳南征，直取汉口，进逼江洲，路上望风而从者不可计数，其势如破竹。大军东下，直逼京师。雍州刺史王珍国、侍中张稷在京师响应，直入皇宫。宫中早有内应，内外结合，要杀萧宝卷。这时萧宝卷尚在含德殿上吹笙听歌，闻讯后匆忙往后宫奔逃，被贴身宦官黄泰平挥刀砍伤膝盖，扑倒地上，恰好张齐赶来，将暴君斩首。众人迎萧衍入了台城，萧衍随即派人去江陵，明里是接萧宝融登位，暗中却密令半路上结果了他。等到萧宝融被杀的消息传回京城，众军自然公推萧衍称帝，而萧衍则装模作样地推辞再三，到齐和帝中兴二年（公元 502 年）四月，才好像迫不得已似的勉强答应做了皇帝，改元天监。因为他爵封梁王，所以就定国号为梁，他就是梁武帝。

胡太后宣淫误国

魏孝文帝死了，魏国的改革也就半途而废。继位的魏宣武帝元恪；是个昏君，只顾自己奢侈放荡，国政任由奸佞操纵，根本不管不顾。

宣武帝迷信神佛，在洛阳和全国造了很多寺庙，寺庙里又供养了无数僧尼，这批人不劳而食，民众负担越来越沉重，国库也很快空虚。宣武帝可不管国库是实是虚，他只一味耗费，没有钱就让下面想办法。他的那班宠臣们也真有能耐，当时的吏部尚书元晖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找到一个毫不费力就能不断补充财政亏空的“长远”办法，那就是公开卖官。魏孝文帝煞费苦心确立的按门第标准选拔官吏的制度，被一张官职价格表轻轻取代，表中规定“大郡 2 000 匹，次郡 1000 匹，下郡 500 匹”，其余各种官职，也都比照这一规定收取。这样一来，谁有钱谁就能做官，而谁会搜刮谁就发财，朝廷卫官卖得越多，对民众的搜刮也就越厉害，以至国中苛剥之徒，横行仕途，无所顾忌，胡作非为。魏孝文帝好不容易推行起来的均田制就这样不堪冲击而迅速遭到破坏，老百姓的日子也就越发难过了，卖官鬻爵的腐败政治弄得民怨沸腾，人们干脆称吏部为“市曹”，视卖官为光天化日之下的公然抢劫。人们为了生存，只好借贷度日，这又刺激了高利贷剥削的发达，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在举国民众陷入生存危机之际，起义也就自然而然爆发了，起义领袖王惠定，自称明法皇帝，刘憎绍自称净居国明法王等都是“明法”为号召，迅速聚集起大批民众的，这就说明人民对黑暗政治的极度愤慨。

北魏熙平元年（公元 516 年），宣武帝死了，他 7 岁的儿子元诩当了皇帝，这就是魏孝明帝。元诩是个傀儡，大权掌握在他的母亲胡太后手里。胡太后是司徒胡国珍的女儿，胡国珍的姐姐是个尼姑，常到宫中讲道，并编出一套胡氏出生时产房内赤光四射的神话，说胡氏将来一定会给夫家带去大福大寿。宣武帝崇佛，信以为真，立即把胡氏召进宫中宠幸。这胡氏也不是等闲女子，当时后宫嫔妃，都怕生儿子，因为北魏祖制，谁生的儿子定为太子，谁就会被处死，免得她日后教唆太子、干扰国政。胡氏却与众不同，经常表

示希望生儿子，她的理由是“天子岂可独无儿子”？为了皇帝能传种接代，她甘愿舍生赴死，在所不辞。她的这番表示传到宣武帝耳中，宣武帝自然对她另眼相待，颇为宠幸。后来，胡氏果然怀孕了，她知道这事非比等闲，把各种情况想得很透彻，最后决定利用机会，以性命为赌注，反复表白宁死也要生个儿子当太子的心愿。此举果然使宣武帝十分感动，恩宠倍加，胡氏在宫中的地位也就非比寻常。十月临盆，胡氏果然生育一子，取名元诩。奇巧的是从这时起，宣武帝原来已有的皇子偏就一个个接踵夭亡，元诩变得尤其珍贵，被别设一宫精心养护起来。令胡氏庆幸的是还没等元诩获选太子，宣武帝就一命归西。根据继承制，也凭着她在宫中争得的地位，元诩顺利地继承了皇位，她则理所当然地成了皇太后。孝明帝元诩只有7岁，难行政令，皇权一下子落到胡太后手里。

胡太后生性聪悟，从小跟姑母学到了不少本事，识文断字，又略得佛教大义。摄政之初，便造了一辆申诉车，在京城内流动接纳万民冤讼，产生很大影响，收到了广泛收买人心的效果。她随后又宴集群臣，通过现场作诗和颁赏财帛的方法，显示才艺、拢络官员。不久，胡太后的父亲死了，群臣上表讨好，建议用国家礼仪举丧，胡太后执意不肯，做出公正廉明的样子；而宣武帝的高皇后死时，她却以当今太后的身份，亲自主丧，当着文武百官，在太极殿哭得死去活来，给世人以极其贤德、美好的印象。当时，皇家有祭嵩山的规矩，胡太后很善于抓住这种机会“以彰其德”。她利用在祭山时赏赐随从的旧例，故意重赏陈留公李崇、章武王元融，让他们各捧200匹绢出来，结果因赏物太重，这两个人一个伤腰，一个损脚，被世人嘲讽为贪婪的报应；而她的女儿长乐公主却获赏不多，只有20匹绢，受赏时既伤不着身子，又可以借此得个廉洁的美名。胡太后就这样费尽心机钓名沽誉，巩固着自己的权势地位。

胡太后是个淫邪的女人，看中了清河五元怿的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找个借口把他召入后宫，引诱他跟自己效于飞之乐。元怿不知胡太后内心究竟，一时惊得六神无主，胡太后见元怿不从，就给他加上一个妄入内宫的罪名，见元怿被吓唬住了，她又说好说歹，哄得元怿兴起，自然死心塌地听她摆布，两人从此肆意调情淫乱，时间一长，宫中便纷纷讹传，以至天下皆知，广遭世人唾骂。

魏孝明帝神龟三年（公元520年），胡太后的妹夫元叉和宦官刘腾合谋，把小皇帝引到显阳殿，然后假传旨意，杀了奸夫元怿，将淫妇幽禁在北宫，夺得了朝政大权。这两个人同样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养婢蓄妓、逼民为奴，垄断盐铁、控制交通，卖官鬻爵，大张贿赂之风，把魏国政治搞得愈加黑暗，广大人民怨声载道。

胡太后的侄儿元僧敬任都统之职，他很为胡太后担心，就带着手下的张车渠等几十个武士，准备谋杀元叉并奉胡太后临朝，结果机密泄露，反被元叉抓住把柄，乘机免黜胡太后的太后头衔，将元僧敬发配到边远地方，并处死了张车渠等人，后来，小皇帝依例朝见母后，在西林园宴集群臣，元叉深恐矫旨阴谋暴露，先发制人，反咬一口，来到太后面前，故意说外面传言太后要谋杀自己和刘腾二人，问太后是否如此。胡太后机心很深，她知道今天是难得的机会，见元叉发问，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的样子回答道：“没有这个事呀！”宴会继续进行，到太阳偏西时，胡太后不失时机地走到小皇帝身边，拉着儿子的手对众人说：“我们母子好久没有相聚了，今天我们就

住在一起好好谈一谈心，各位大臣请送我们进去。”元叉知道不妙，却又无可奈何，只好提心吊胆地望着太后与皇帝进了东北面的小阁，这时左卫将军奚康生想乘机杀掉元叉，但被元叉察觉，无法下手。

后来刘腾死了，元叉的提防之心才又渐渐松懈，胡太后、孝明帝元诩和高阳王元雍商量计策，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段，解除了元叉的军权，胡太后重新临朝摄政，魏国朝政变得更为糟糕，没有什么恩威可言，官员贪污之风也愈刮愈凶，政治已经腐败不堪。

胡国珍的参军郑俨，容貌壮丽，深得胡太后欢心，与胡氏早有勾搭，只是行事隐密，没有像元怱那样暴露出来而已。胡太后被废期间，郑俨到萧宝夤的西征军中当开府，等到太后复政，郑俨回京，凭着与太后在后宫淫乱的本事，极受恩宠，竟还当上了谏议大夫，中书舍人等官职，一时势倾朝野。此外还有一个人叫徐纥，心机极深，是元怱的亲信，又与郑俨关系极好，胡太后想念已死的元怱，便把徐纥召进宫中宠幸，不到两年，徐纥也当上了中书舍人、光禄大夫，把握着朝中大权。这帮人成天在胡太后身边宣淫逐乱，搞得乌烟瘴气，国内人人厌秽不已。

这时，胡太后之侄元僧敬早已从发配之地归京，见太后仍如此放纵淫欲、任用小人，心急如焚，于是聚集亲族，泪流满面地劝胡太后要有太后风范，千万不要再如此轻狂。胡太后勃然大怒，从此再不准元僧敬进宫。

胡太后干了那么多丑事，害怕宗室嫌弃，于是采取极毒辣的手段，残酷地加害小皇帝的左右亲信，如鸿胪少卿谷会、绍达等人，而密多道人仅仅因为懂得胡人语言，胡太后怕他把事传到外邦，也将他暗杀在城南巷中。

小皇帝长大，渐渐懂些事了，母子间矛盾也随之加剧，郑俨担心有朝一日大祸临头，就与太后密商，将潘妃生的女儿冒充男孩，诏告天下。接着就发生孝明帝突然死亡的怪事。人们私下猜测，这恐怕是郑俨、徐纥下手干的，因而愤慨不已，胡太后却无所谓，对郑、徐恩幸不衰，将那个假小子安排接位。几天之后，见事态平息，才又说潘妃生的本是女儿，要另择新主，于是立了临洮王3岁的儿子元钊为帝，搞得天下愕然。

胡太后干了那么多丑事、坏事，害怕死后到地狱受苦，就想用崇佛来抵销罪孽，于是广造寺庙佛塔。孝明帝武泰元年（公元528年），尔朱荣举兵渡黄河，胡太后见形势严峻，带着亡子元诩的六宫嫔妃到永宁寺出家。这座寺院墙高10丈、房达千间，九层宝塔，耸入云表，里面珠玉锦绣、装饰奢华，不知花了多少金银建造而成。然而，胡太后还是没躲过必然的厄运，连同3岁幼主一起，被尔朱荣拘送河阴，沉于黄河身亡，结束了极不光彩的一生。

六镇风云

魏明元帝时，北魏筑起防御柔然入侵的长城，还在长城设立了武川、抚冥、怀朔、怀荒、柔玄、御夷等六个重镇，连同西边的沃野（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右翼旗）镇，形成保卫京都平城的屏障。这些重镇的镇将全部由朝廷亲贵担任，部下军官也大多是鲜卑贵族，他们待遇优厚，升官也容易，因此不少人愿意到那里建功立业。

可是，在魏太武帝大破柔然以后，边镇上战云消散、战事稀少，镇边将官也因此放松防务，忙着发财致富去了：他们选拔精壮兵勇到边境外掳掠，让有一技之长的士卒搞制作经营，又将老弱残兵驱赶到山林或田野去砍伐、

耕作，而所有利益则统统归将帅所得。在这些守边军伍中，有鲜卑平民，也有鲜卑化了的各族民众，他们的收入经层层克扣，极其微薄，不少人已经穷得揭不开锅，这种贫富悬殊的现实，导致本来就十分恶劣的官兵关系进一步恶化，冲突时刻都可能爆发。

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守边贵族的地位一落千丈，他们深受内廷官员的排斥，一生不得上进，甚至连规定的衣食供给也常失去保障，因此只能靠更加残酷地剥削守边军士来对付。这样，边境上官兵的矛盾就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朝廷方面，对这一切根本没有放在心上，魏国上层统治集团内部正忙着争权夺利，而国家防备也只注意了南朝方面，这就给柔然国提供了卷土重来的难得机会。魏孝明帝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夏，柔然可汗郁久闾阿那瓌亲率铁骑南征，打到平城附近，由于魏国六镇边防空虚，难以抗击，结果被虏去人口2000，抢走驿马牛羊几十万头，连坐镇边关的行台尚书元孚也被俘虏。这一事件报到洛阳，当朝的魏孝明帝急调关内大军15万人前往征讨，而柔然军队却早已撤回本国，结果大军无功返回。

不久，柔然军队又来进犯，怀荒镇上饥肠辘辘的军民一再要求开仓取粮，以便御敌。镇将于景以没有朝廷命令不敢擅动为借口，拒绝开仓，这种不恤下情的态度大大激怒了全镇军民，他们早已不堪忍受，便一拥而上，将于景抓来杀了。怀荒镇的反抗行动有力地鼓舞着沃野镇辖下高阙戍镇民的反抗情绪，当时那里有一个戍兵名叫破六韩拔陵，他是从破六韩孔雀部落中征调来的，这个部落本是匈奴后裔，属于当时的山胡族。他们虽然已经鲜卑化了，但胡人的气质并没有丧失，平时，他那悍勇豪爽敢于打抱不平的脾气，很得人心。当时，大家也想照着怀荒镇的样子，把人人憎恨的戍主杀了出气。可他却觉得要干就干个惊天动地，不光要杀戍主，还要攻城占地，建立自己的政权，再不受朝廷恶气。大家听他这一说，哪有不愿之理，就公推他为首领，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公元524年），他们扯起了义帜。这支以戍边士卒为主的起义军，很快东进攻下了沃野镇，杀了镇将，并将年号改为“真王”，公开发出了反抗朝廷的号召。

与此同时，高平（今甘肃固原县）人赫连恩也举行起义，他推出敕勒族酋长胡琛为首领，一举攻下高平镇，响应破六韩拔陵。

破六韩拔陵的起义部队迅速壮大，并接连攻下武川镇、怀朔镇，接着又在五原北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与前来镇压的政府军交锋，起义军以不可阻遏的英勇气势，先后杀得前来镇压的临淮王元彧溃不成军，打得安北将军李叔伦丢盔弃甲，击得抚军将军崔暹“只轮不返”，至此，六镇全部为起义军所占领，与南部的胡琛义军遥相呼应。真可谓六镇风云卷地起，南北义旗如林立。反抗北魏腐败政权的斗争正方兴未艾，各地响应起义的浪潮也一浪高过一浪。

破六韩拔陵的起义在怀朔镇附近的高车人中影响很大，高车人就是敕勒人，那里敕勒族人民也与六镇军民一样，深受苦难，与起义军感情相通。为壮大起义力量，破六韩拔陵特意到敕勒族中鼓动，使得那里的斛律部和叱列部人心思动，破六韩拔陵又通过封王的办法说动了他们的酋长斛律金、斛律野谷禄、叱列步、叱列河等人，敕勒两部旋即宣布起义。

这事对北魏政权震动极大，奉命带兵镇压农民起义的广阳王元渊给孝明帝上书道：“今六镇俱叛，二部高车亦同恶党，以疲兵讨之，必不制敌。”

因此他请求兵退恒州险要之处，“更为后图”。

山胡族因为破六韩拔陵的巨大影响，虽然其中还有“统万胡”、“朔方胡”、“三城胡”的区分，但对起义的态度则同样坚决，于是夏州、豳州、北华州以及汾水两岸，迅速成为反魏斗争最活跃的地区。

在魏国北境、西境、东北境也都发生了破城杀官自立为王的人民起义，其中有氐人、羌人、胡人和汉族蜀人，为首的有下层军官，也有类似奴隶的牧人，只剩下黄河南北几个州郡还在政府的控制内。

正光五年（公元524年），北魏王朝在军事镇压失败后，一面急忙下诏提高镇民身份，表示让步，一面派黄门侍郎郦道元“抚慰六镇”，可是破六韩拔陵和各族起义大军并没有上当，斗争在继续进行，起义力量也与日俱增。朝廷这时已经束手无策，他们病急乱投医，竟然发展到引狼入室的地步，去请求柔然军队帮助镇压起义。设立六镇原本为的是抵御柔然，如今却开门揖盗、自毁长城。

柔然可汗阿那瓌闻讯大喜，当下就整顿兵马，于正光六年（公元525年）春，率10万大军扑向武川镇，接着西进沃野镇，起义军未曾防备北面这个劲敌，战事不利，被迫向黄河南移。早就等着镇压起义的北魏军队和地方豪强武装，在广阳王元渊统领下进行夹击，截获起义军20万，破六韩拔陵处境已十分艰难。

元渊的参军于瑾乘机献计，意图分裂起义部队，于瑾为人阴险狡诈，又懂得各族语言，他奉命混进起义军中，分别对各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进行“示以恩信”的劝降活动，这些上层分子本来就和起义军不是一条心，只为投机才参加起义，如今见起义遇到危险，心中已经动摇，经于瑾这一勾引，马上表示接受诏安，敕勒酋长乜列河首先率3万户投诚元渊。于瑾知道破六韩拔陵不会放过叛徒，就故意调乜列河去折敷岭（今内蒙和林格尔北），然后把消息露出去，并先期伏强兵在险要之处，等待破六韩拔陵追来时好将义军一举消灭。破六韩拔陵不知是计，得到乜列河调往折敷岭的消息后，立即率主力追击，打得叛徒全军覆没，却不知此举如鱼吞饵，中了于瑾埋伏，精锐尽失，起义终于失败。

元渊得胜，坐帐等部下献俘，却没见破六韩拔陵，急忙下令追查，甚至连死尸都翻了个遍，可仍然踪影全无。他放心不下，下令绘影图形，在全国悬赏缉拿。结果仍然没有找到，以后，才有人从北边传来消息，说破六韩拔陵战败后乘机北逃，因为无处藏身，直跑到大漠之中，被柔然贵族发现，不幸惨遭毒手。

“菩萨皇帝”萧衍

梁武帝萧衍上台之后，心里老念叨着佛祖恩典，因为皇帝决非随便什么人想当就可以当得上的，他如果不是笃诚向佛，哪有天子之份？所以决心更加虔诚崇佛敬佛，不惜一切弘扬佛法。

他是一个学养很深的人，曾经在齐朝竟陵王的西邸听名僧讲经，平日也没忘钻研佛经奥义，现在当然要大兴佛教了。但他崇佛而不毁儒谤道，主张用佛家的因果报应告诫世人应该安于已有的富贵贫贱，同时用儒家的礼乐和道家的虚无，提倡“不竞”，也就是人与人之间不要比较得失，更不要争夺。他认为这就是“三教同源”，但“同源无二圣”，只有佛才是至高无尚的，

谁若不信，敢生妄想，则佛祖不容！

别的皇帝，不管如何勤政，锦衣玉食，后宫佳丽的奢糜总归难免。他却不然，酒色财气与他无缘，宫中一切都按佛家规矩办事，御厨饭菜，一律长斋素食，即使祭天地祖宗和朝廷庆宴，也不准杀生开荤。他甚至一天只吃一顿菜羹粗米饭，还特别强调不吃宫宴，宫里的人也不能白吃公家的饭菜，都得自己掏银子，不得从国库开销。他从不喝酒，不好女色，也不闻丝竹之声，身上穿的，除上朝罩件龙袍外，退朝后立刻脱掉，换上粗布衣裤，还特别禁用丝绸，因为缣丝会把蚕蛹煮死，那可是天大的罪过！床上则长年挂一顶木棉织的黑帐子，一顶帽子要戴三年，一条棉裤要穿两年，极其节俭，却不忘衣冠整齐。他对人谦恭，不仅对士大夫们礼貌有加、如待贵宾，就是对宦官辈也从不马虎、平和端肃。如果碰上判谁重罪，总要掩面涕泣，整天郁郁不乐，以示慈善。办理政务，更是勤谨之至，每天五更起床，披阅奏章，即使寒冬腊月，手冻得炸裂出血，也手不停笔。

梁武帝最乐意做的事就是朝佛，凡是佛门所需，他是决不吝惜钱财的。在位期间，仅仅京城一处，就兴修了 500 多座寺庙，养了成千上万的和尚，整天忙于烧香拜佛，不停地重塑金身，而佛事则更是频繁，一会是救苦斋，一会又是无碍会，没完没了。假如有谁表示对佛不敬，他就饶不了谁，他最忌恨的是当年写《神灭论》的范缜，如今皇权在自己手里，自然很快找了个借口，把范缜流放到僻远的广州去了。这还不解气，他又亲自写文章声讨《神灭论》，并让满朝僧俗都来对范缜口诛笔伐，因为范缜远在广州，无法出来辩论，于是骂了一阵以后，就自鸣得意地宣布已经把范缜的理论驳倒了，回过头去继续做他的佛事。

普通八年（公元 527 年），梁武帝见梁朝这 20 多年来一直没出什么大乱子，心里十分得意，心想：“齐朝到这个年数，已经江山易主了，而我梁朝却太平平，这可是仗神佛保佑呀！”于是，下令在皇宫旁边再修建一座更辉煌的寺庙，取名“同泰寺”，还特意把皇宫正对同泰寺的地方开一个门，这样他早晚拜起佛来就更方便了。他还亲自在同泰寺讲演佛经，劝诫众生，行功德之事，为万民祈福，忙得不亦乐乎。最后，竟宣布看破红尘，跑到同泰寺去舍身，坚持要当和尚，不肯做皇帝了，也不管辟臣如何苦苦阻拦、求告，仍执意剃光须发，换上袈裟，住进寺里，整天跪在佛前，焚香礼拜，敲击木鱼，念诵经文，那样子简直就是一位得道的高僧。

人说“国不可以一日无君”，如今皇帝跑到寺庙里当和尚去了，而且态度坚决，这可是亘古未有的异事！为此，满朝文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当然，唯一的办法是接驾回宫，于是群臣公推最有身份的王公大臣们赶到同泰寺，跪求梁武帝为天下黎庶着想，就这样一连苦苦求告了四天，梁武帝才勉强点头答应回朝理政，一场风波算是过去了。

事隔两年，梁武帝与和尚的瘾又犯了。这年九月，同泰寺举行了一次佛教大典，名为“四部无遮大会”，到会的僧俗人众，包括和尚、尼姑、善男、信女四部，不管他们是贫是富是贵是贱，都无恚（音 huì）无碍，都是佛的信徒，在佛面前众生平等。会上，寺里钟鸣鼓响，声闻数里，极其热闹，佛座前，更是香烟缭绕、仿佛仙境。有这样的盛会，梁武帝哪有不踊跃的，他身着袈裟、口念佛号，后面跟着王公大臣，赶来与天下信徒一起共襄佛事。他还在会上设坛讲经，普喻众生，做着无量功德。会后，他还沉浸在佛的圣光里，不肯回宫，就在寺里一间僧房里歇下了，和众僧一样吃住，做着一样的

日常功课。

群臣们一见梁武帝又要舍身，一个个焦急万分，便想方设法轮番劝说，可是梁武帝就是不理不睬。正当群臣束手无策的时候，同泰寺方丈略露了一点口音，说是圣上的意思，群臣如果不做下大功大德的善事，他是决不会回宫的。群臣一听有门，赶紧商量办法，说来说去，他们能做的天大功德就是把梁武帝会给庙里的身子再续出来，让皇帝把天下黎庶治理得妥妥帖帖。续身是要花银子的，何况是续皇帝，这个价钱自然不是小数目。可哪来的钱呢？动用国库恐怕梁武帝不答应，只好大家动脑筋了，于是有人就去募捐，有人则先拿出私蓄，然后再想办法搞回来，反正凑来凑去，总算凑出一万万钱，送到同泰寺里，这才好不容易把梁武帝续回宫来，群臣这才松了一口气。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又是 17 个年头，梁武帝崇佛之志老而弥坚，不知是哪件佛事触动了他出家的神经。大同十二年（公元 546 年）的一天，梁武帝突然宣布，他还是决定到同泰寺舍身，这次他不仅自己执意为僧，还代替全部宫人和举国百姓，说把他们也一起舍给佛祖。这可不得了！那梁朝不成佛国了吗？全国都是和尚、尼姑，将成什么体统？群臣又一次聚集起来商议，结果还是沿用老办法，大家凑钱为皇帝和臣民们续身，因为要续的人太多，价钱自然也更高，于是千方百计拼凑，终于凑到两万万钱，送到同泰寺里，然后递上奏章，恳请皇帝收回成命。梁武帝依然不理不睬，直到第三份奏章送上去，加上寺里众僧也帮忙苦劝，才算“打动”了皇帝的善心，答应委屈求全，打道返宫。

作为一国之君，三度舍身，虔诚事佛之心，真是天日可知、人神共感的了。照说事不过三，梁武帝该可以安心治国了吧？万没料到，未出一年，他又跑到同泰寺重操故伎去了，群臣们万般无奈，只好依照旧例，如法炮制，又给同泰寺捐钱一万万，请皇帝回宫。可是这次还有点特别，群臣奏章上了一道又一道，到寺里去叩请了一回又一回，梁武帝就是不答应，就这样折腾了 37 天，才算硬把这位“菩萨皇帝”感化回来。

梁武帝再三再四舍身寺庙，逼得群臣拱手付出银钱多达四万万之巨，这笔钱群臣当然不会白白送掉，他们早已巧立名目，把负担转移到广大百姓身上去了，而且还恐怕远不止收回这个数目呢！

事有凑巧，不早不晚，就在梁武帝这次被赎回宫中的当夜，同泰寺发生火灾，佛塔被烧毁。梁武帝闻讯，惊愤异常，认定是恶魔作祟，只有广做法事，镇压恶魔，黎庶才得安宁。他专门为此下诏道：“道愈高魔也愈盛，行善事必有障碍，故应大兴土木，重建更高的佛塔，方能镇住恶魔。”新塔计划比原塔高一倍，共 12 层，而且说动就动，役使大量民众修造，简直到了不计成本、不思国力、不顾民瘼，不惜一切的疯狂程度。

为了对付恶魔，梁武帝除了重修佛塔外，还专门为此将年号大同改元太清，这一年便是太清元年（公元 547 年），也是梁王朝接近利用佛教麻醉民众的尾声，酝酿已久的天下大乱已指日可待了。

梁武帝治国

梁武帝除了信佛崇佛倡佛以外，也和其它君王一样，日夜考虑如何巩固自己的政权。由于他博学广闻，又富心机，懂得以古鉴今的道理，他一方面，以别的皇帝都无法做到并坚持的自苦其身的精神麻醉手法，迷惑世人、杜绝

众口；另一方面，又细观了前朝利弊得失后，发现前朝东晋王朝依靠士族门阀的力量，维持了 104 年的统治，但皇帝大权旁落，受大族挟制如同傀儡；刘宋和萧齐两朝，力改前弊，用诸王作镇将，再派典签官监视诸王行动，把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上，可又时刻担心遭人算计，以致疑心顿生，造成残害骨肉的毁灭性结局，终于不可收拾，气数更为短促，前一个只维持了 60 年，后一个连一半也不到，仅仅存在了 24 年。经过反复权衡思索，梁武帝决定扬长避短、取重弃轻，订下了用优容恩养的办法来维持政权长治久安的治国方略。

梁武帝优容恩养谁呢？当然不是老百姓，他对老百姓严刑峻法、毫不慈悲，而且动不动就搞连坐，只要有一个人犯了他的法或者逃亡外地，那么这个人一家算是完了，不分老幼，一概囚禁起来，罚做苦工。他优容恩养的人一是他分封的诸王，也就是他的骨肉至亲；二是百家士族，就是东晋以后，在宋齐两朝受到素族压制的旧贵族。

诸王都能掌握实权，只要不造反，就可以为所欲为，不必顾虑，即使白日杀人、夜行抢劫、窝藏盗匪、甚至变节投敌，也顶多是叫来哭着训诫一番，就算了事。典签监督的办法当然彻底废除了，讲的唯有骨肉恩爱一条。百家士族的待遇当然比不上诸王，但从前朝受压到本朝受尊重，感觉就有天渊之别，无不从内心感激梁武帝。更何况皇帝还特令吏部尚书徐勉改定百官，将九品定为 18 班；又增设镇远、抚北将军十品，分 24 班。从而大大增加了职官的位置，与此相应，在国内将行政区划变小，广设郡县，甚至一个乡就可以设州建县，以扩大容量。同时委派官员专门负责搜罗、推荐士族人士，请他们出来做官，享受俸禄。虽然这样的官权力十分有限，但可以逐级升迁，许多人也就十分满意了。而大量官员的存在，国家势必把负担转嫁给老百姓。因此，优容恩养是以牺牲广大人民利益为代价的。

梁武帝的六弟临川王萧宏，为人奢侈放纵、贪婪无度。他利用皇权靠重利盘剥的手段夺取田宅邸店，仅在建康城一地，开的客店就多达几十家，而他的家里光库房就有足足 100 间，锁得非常严密，不知道里面藏了多少东西。有人想了个办法，把情形直接向梁武帝报告，并说萧宏库房里私藏了许多兵器，可能准备谋反。梁武帝接到奏章，也起了疑心，心想：“如果不是见不得人的东西，何必藏得这么严实，纹丝不露？”再说，他实行优容恩养的治国方略，不也就是为了让诸王不思谋反吗？事不宜迟，他当机立断，决定要亲自到临川王府去看个究竟，随即叫来亲信丘佗卿同往。

萧宏见皇兄突然到来，十分意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赶忙接驾。梁武帝坐在厅上，对萧宏说：“我听人说你有 100 间库房，都装的什么宝贝呀？”萧宏一听来势不对，吓得战战兢兢，不敢答话。梁武帝见萧宏那个样子，疑心更重，便接着说：“朕要亲眼看看，可不可以呀？”萧宏不敢违旨，从身上解下钥匙，磨磨蹭蹭地领着梁武帝往库房去。打开第一间，里面满满匝匝，装的全是金钱，每隔一段，就有一张黄纸写着“百万钱”，数一数，共有黄纸 10 张，最旁边还有一张紫色标示，写着“共千万钱”。再打开第二间、第三间，一直看了 30 多间，间间如此。梁武帝似乎兴趣很大，继续要往下看，就这样，100 间库房仔细看了个遍，库里除了藏钱多达三万万两以外，还有整库整库的布、绢、丝、棉、漆、蜜、纩、蜡、朱砂、黄屑以及各种杂货，真是不计其数。

看完库房，回到厅上，萧宏见搜刮来的财物全让梁武帝查看了，不知会

怎么发落自己，说不定还要掉脑袋哩！正低着头琢磨对策，却未发现此时他的皇兄知道他这个当弟弟的没有夺取皇位的野心，已面露悦色，轻呼一声：“阿六！”萧宏却心头一惊，忙抬起头来，只听梁武帝接着对他说：“你家当不小，可真会过日子啊！”萧宏这才惊魂甫定，忙陪笑“嗯、嗯”两声。萧武帝说完，又喝了一会儿茶，坐了一阵，才放心打道回宫去了。

从此，梁武帝对萧宏更加信任，还把萧宏的儿子萧正德过继到自己膝下作嗣子，准备日后继承大统。直到后来亲子萧统出世，萧正德受封西丰侯，还本为皇侄。萧正德不满，竟跑到北魏“避难”，要借敌人伐梁，幸而北魏内乱难解，无暇南顾，对他的“避难”个怎么重视。萧正德感到失望，又逃回梁朝，梁武帝也不加惩罚，只流着泪把他教训一番，便恢复了他的爵位。萧正德还曾纠集恶少，公开杀人劫货，梁武帝也听之任之，只装作不知道。

萧宏也因这次突然查库而有了经验，皇兄对贪赃虐民是允许的，何必掖之藏之，只管放心聚敛就是。其余诸王见萧宏如此，一个个也胆子越来越大，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梁朝社会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梁武帝不仅允许诸王百官贪赃虐民，而且对战争失败，造成军资民命巨大损失的将领也十分宽容，简直像没事一样。

还是这个萧宏，早在梁武帝坐位之初的天监四年（公元505年），当时魏国开始内乱，梁朝决定乘机出兵扩大疆域。这次大举伐魏，梁军士气不错，加上军械精新，机会又好，本该打个大胜仗，甚至连魏国方面也认为这是近百年来未曾遇到过的劲敌，不敢交锋。可是梁武帝偏袒诸王，竟不用名将韦叡，而派萧宏作三军主帅，萧宏是个只会搜括民脂民膏的人，对带兵打仗一窍不通，十分怯懦昏庸，无能之极。当伐魏大军兵至洛口（今安徽怀远县洛河镇）时，夜逢暴风骤雨，洛口为洛河、涧河的入淮口，那响声是萧宏未曾听过的，因此吓得要死，误以为敌军趁夜袭营，于是丢下大军不管，只带了几名亲信，悄悄逃回建康。等到众将士发现主将失踪，无人指挥，也就把戈甲军资随便往水里泥里一扔，大军不战自溃，从而折损兵民5万、军资无数。魏国发现天赐良机，便集中兵力进攻淮南，幸亏守将昌义之率领钟离（今安徽凤阳县东北）人民死守拒敌，大将韦叡及时率大军驰援，这才扭转被动局面。萧宏未临阵已先脱逃，造成全军毁灭的严重损失，梁武帝也不加惩处，不了了之。

天监十三年（公元514年），梁武帝想阻止敌军南下，竟逼迫兵士和徐州、扬州民夫共20万人筑浮山堰，企图雍遏淮水灌魏国寿阳城。奉命指挥筑堰的水利专家奏请皇上，说该地沙土轻浮，不能筑堰。梁武帝不予采纳，只叫人用铁器先沉底再筑，结果铁器用了几千万斤，堰还是筑不起来。梁武帝又叫人用木料叠成方框，中间填上大石头，上面加土，继续筑堰。如此重大的工程，需要多少木石，实在难以计算，只见民夫们累得肩肉腐烂，疾病流行，不少人扛着扛着就倒下去再也爬不起来，也没有人管一下，以致尸骸满路、臭气刺鼻，上面布满苍蝇，叫人惨不忍睹；冬天则天寒地冻，民夫无衣少食，冻死饿死不计其数。对于这些，“菩萨皇帝”充耳不闻，没有半点慈悲。就这样折腾了两年，一座长9里，下阔140丈，上宽45丈，高20丈，深19丈5尺的浮山堰终于筑起来了，梁武帝闻报，十分得意，命人在堰上栽上柳树，余外就只等着淮河涨水，好淹敌城寿阳了。

这年，淮水如期暴涨，浮山堰却不争气，未能挡住洪水，只听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浮山堰被洪水冲塌，造成淮河两岸城镇村落一片汪洋泽国，仅

被洪水冲入大海的就达 10 万人之多。看来，梁武帝的治国方略比前朝更蠢！

“天柱”折，魏宫裂

六镇起义虽然惨遭镇压，但是魏国大地的斗争风云却并未消散。魏孝明帝正光六年（公元 525 年），柔玄镇又爆发了杜洛周领导的上谷（今河北怀来县）起义，后来被奉为齐高祖神武皇帝的高欢最先就归附在杜洛周旗下。第二年，怀朔镇兵鲜于修礼带领“六镇降户”在定州左人城（今河北唐县西）再举义旗，风从者达 10 万人，鲜于修礼死后，部将葛荣继续率众斗争，在博野县（今河北蠡县）的白牛逻，起义军击溃了北魏主力，杀了魏左军都督章武王元融，又在定州附近俘斩了魏军大都督广阳王元渊，一时间义军锋芒所向，无可抵挡，葛荣于是自称天子，国号为齐。孝昌三年（公元 527 年），葛荣攻破信都城；第二年，杜洛周攻破定州城和瀛州城。接着，葛荣火并杜洛周，接管了他的部队，攻占了冀、定、沧、瀛、殷五州之地，兵力发展到几十万人，号称百万之师，遗憾的是：这支风行河北、将伐洛京的大军，“天子”葛荣出身镇将，部众也是六镇兵民的基础发展起来的流民，这支鲜卑族或鲜卑化很深的各族人为主的军队，歧视和排斥汉人，又从来不会生产，毫无纪律，只知破坏戮掠。河北民众视之为祸殃，反过来倒希望朝廷赶快把他们镇压下去。

魏孝明帝可没有力量“遂民所愿”，随着年龄的渐渐增长，他盘算得更多的是如何对付胡太后，然后把皇权夺回到自己手里来。可是，他除了皇帝名号外，毫无实力，几个心腹之人早被胡太后开除了，于是他打主意打到尔朱荣的头上。

尔朱荣是塞上秀容族的酋长，镇压过秀容人乞伏莫于和万于乞真的起义，他拥有部落 8 000 家、马匹几万，乘各地起义、天下大乱的机会，招合骁勇，接纳豪强，使侯景、高欢、贺拔岳等人先后前来投靠，他又分化义军，收买了“别帅称王”者七人，纠集起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驻兵晋阳，成为新起的地方豪强势。

魏武泰元年（公元 528 年），孝明帝密令尔朱荣率兵入京，帮他胁迫胡太后还政。尔朱荣求之不得，急令高欢为前锋，直奔洛阳。兵至上党（今山西壶关县），传来消息说孝明帝驾崩，胡太后另立孝明帝堂侄、3 岁的元钊为帝。尔朱荣哪能甘心就此退兵呢？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打出扫除奸佞的旗号，大兴问罪之师，继续向洛阳进发，并派去联络孝明帝的堂叔、氏乐王元子攸，要拥立他为魏帝，元子攸喜不自胜，立即潜往尔朱荣大营，受了帝号，他就是魏孝庄帝。

尔朱荣兵渡黄河、逼近洛京，传孝庄帝诏，令胡太后和文武百官前来迎接新君。已出家的胡太后自知无法抗拒，只好带着幼帝元钊和文武大臣来到黄河边，准备再作计较。不料尔朱荣刚一见面，就不容分说，将胡太后和幼帝沉入黄河，又在淘渚（今河南孟县）用骑兵将文武百官 2 000 多人围了起来，狠狠训斥道：“方今天下大乱，圣上遇害，都是你们为臣不忠，一味苛剥小民、沉溺享乐，骄奢贪掠，丧尽天良所致，我要为民伸冤、为国除害！”说完，下令执行。百官哪曾想到会有这样结果，吓得不知所措，还没等他们清醒过来，脑袋早被马刀砍飞了。尔朱荣就这样一下子把洛阳的鲜卑贵族和出任北魏的汉族世族消灭殆尽，孝庄帝在一旁看得心惊胆颤。

孝庄帝入主洛阳，当了傀儡皇帝，尔朱荣功高盖主，封了太原王，独掌朝廷大权，文武百官除了几千残余旧人，全由尔朱荣的部下充任。尔朱荣由于杀的朝臣太多，怕有不测，因此不敢久住洛阳，仍回晋阳坐镇指挥，他计划先平了各路起义军再说。葛荣也乘乱南下，兵抵汲郡（今河南汲县）、威震洛阳，尔朱荣乘葛荣准备不足，调集7万精锐骑兵，以侯景为先锋，从背后突袭，凭着塞上契胡骑兵的强悍善战，疯狂猛扑，在邺城以北大破葛荣军，擒杀葛荣，收用其部将武川镇人宇文泰。然后挟余威西征，又一举灭了万俟丑奴、宿勤明达的起义大军，魏国在军事上归于统一。

梁朝大通三年（公元528年），南朝梁武帝差遣大将陈庆之率兵护送降梁的魏北海王元顥（音hào）到洛阳争夺帝位，梁兵势如破竹，连取北魏32城，直打进洛阳，元顥改元称帝，孝庄帝则逃亡到黄河北岸。

元顥坐了帝位，正值欣喜之际，不料尔朱荣大军反扑过来，将他捉去杀了。陈庆之抵挡不住，退兵回到南朝，孝庄帝重回洛阳，继续为帝。尔朱荣再立天功，受封为天柱将军，他虽身居晋阳，可耳目众多，洛阳的一举一动，全得由他作主。

孝庄帝知道尔朱荣的脾气，不敢造次，他得靠尔朱荣维持帝位。可是，当傀儡又实在不舒服，时间一长，越发觉得难受，他凭着一股年轻人方刚的血气，千方百计要摆脱尔朱荣的牢牢控制。

尔朱荣要任命一批地方官，名单已经拟好，派人送给孝庄帝，叫他照办。孝庄帝心里老大不自在，故意拖延不准，这可让尔朱荣大感意外，立即进宫质问傀儡皇帝道：“你怎么搞的？竟敢违抗我的命令！你别忘了是谁把你扶上皇位的；这样下去，那还了得！”孝庄帝的皇后是尔朱荣的女儿，也帮着父亲责怪元子攸，骂他“忘恩负义”，还说：“皇帝是我家立的，你敢不听话，难道我父亲不会自己当皇帝吗？”孝庄帝听了，觉得实在不是滋味，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是，他总算忍住了，依着尔朱荣的意思，准了各地方官的任命，心里却强烈地产生出一股非干掉尔朱荣不可的报复情绪。

魏永安三年（公元530年），尔朱荣从晋阳入京，孝庄帝不知来意，但明白尔朱荣已经越来越不信任他了，随时都有被废、被杀的可能。这次尔朱荣来京，他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心里越想越不踏实，于是先下手为强，准备寻机下手干掉这个恶魔。孝庄帝的反常情绪被耳目报到尔朱荣那里，尔朱荣只哼了一声：“他敢！”照样大踏步进到宫中，孝庄帝出迎，尔朱荣劈头就问：“有人报告说陛下想要杀我，可是真的？”孝庄帝心里一惊，故作镇静地说：“哪有这事！外面还有人说您要杀我哩，我能相信这些滥言吗？”听孝庄帝这么一说，尔朱荣倒放了心，他想自己功高势大，兵权在握，孝庄帝不靠他靠谁？再说自己女儿身为皇后，已有孕在身，或许生个太子，也是他尔朱氏的一脉，只要孝庄帝听话，可以暂不追究。何况，他就是真有二心，也奈何不了我这个天柱将军呀！于是问了一些别的事情，也就再没多说什么。孝庄帝捏着一把汗送走了尔朱荣，装作什么也没发生过的样子，回到宫中，心中却策划着一个更周密的行动。

一天，尔朱荣接到喜讯，说皇后已经生下一个太子。他高兴极了，马上带了几个随从和儿子一起赶到洛阳，进入宫中探视。孝庄帝出迎，翁婿正坐下谈话，忽见一群武士从两壁冲了出来，尔朱荣见状不妙，急问孝庄帝：“这是怎么回事？”孝庄帝一言不答，弯腰从靴筒里抽出一把利刃，朝尔朱荣脸上就砍，武士们蜂拥而上，杀了这个恶魔，尔朱荣的儿子和随从转眼间也陪

了性命。

孝庄帝杀了尔朱荣，怕尔朱氏报复，忙派人给尔朱荣的弟弟尔朱世隆送去铁卷丹书，表示要保证他的人身财产安全。尔朱世隆心想：“我哥哥是朝廷的顶天柱，功绩卓著，无人可比，可你还不是把他杀了。想用这个玩意儿哄我，我才不上当咧！”他等朝廷的人一走，把铁卷丹书扔到一边，快马加鞭北上汾州（今山西汾阳），去找在那做刺史的侄儿尔朱兆商量对策去了。

尔朱兆发誓要报仇雪恨，立即整顿兵马，日夜兼程奔向洛阳。孝庄帝虽然听到尔朱兆的反情，但还以为他过不了黄河天险，谁知道转眼之间人家已经攻破洛阳，只好仓皇出逃，可这回来不及了，刚出城门就当作了俘虏。尔朱兆将孝庄帝押到晋阳杀了，另立献文帝的侄子元恭为帝，他就是节闵帝，国政大权重又落到尔朱集团手里。其实，尔朱集团也是兔子的尾巴，很快又被高欢所灭。北魏皇帝从此像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不到三年，国家的一统局面便宣告结束了。

两家分魏

高欢的祖辈原属鲜卑族慕容部落，在鲜卑各部落中，慕容氏较早接受汉文化，进入封建社会。他的六世祖高隐曾做过晋朝的玄菟（音 tū）太守，曾祖父高湖是北魏朝的右将军，祖父高谧又位至御史。不知什么原因，高谧成了朝廷的罪人，被发配到拱卫平城的怀朔镇充当兵户。高欢出生于负罪在身的六镇兵户之家，而六镇自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地位大大下降，高门弟子在这里都难以飞黄腾达，他一个犯法配户之孙，日子自然过得十分困苦。

高欢长得一表人才，在城上服役，恰被司徒娄内干的女儿娄昭君看见。娄昭君家很富有，许多人家都想和她家攀亲，可娄昭君偏要自择丈夫，娄内干也勉强不了她。娄昭君对高欢一见钟情，矢志要嫁给他，她知道高欢家穷，拿不出聘礼来，就让婢女把自己的私房钱一次次往高家送去，表达爱慕之意，要高欢上娄家求婚。高欢也喜欢她的宽厚贤惠，将她娶为妻子。娄内干在高欢成婚之日，送一匹马给他，作为贺礼。高欢结了富亲，又有了马，镇将自然对他另眼看待，提拔他当了队主，改做“函使”，专门担任往洛阳传送公文的差使。高欢就这样干了六年，看到了洛阳的奢侈豪华，也明白了朝廷的腐化。

六镇起义，他先后在破六韩拔陵、杜洛周、葛荣等队伍中干过，后来又叛离葛荣，投到尔朱荣麾下。

尔朱荣将高欢提升为卫队长，视为亲信。到尔朱荣把持魏国朝权后，利用高欢和河北起义军的关系，派他去分化瓦解对方，高欢不负尔朱荣厚望，从义军中拉出七个称王的将领和 1 万多士兵，然后又奉命镇压了山东的邢杲起义军。由于功绩卓著，被提升为第三镇民酋长，当上了晋州刺史，成为尔朱荣的得力干将。

孝庄帝杀尔朱荣，尔朱兆起兵赴洛报复，高欢借故留在晋州，他想观望一下形势。尔朱兆杀了孝庄帝，高欢这才决定追随尔朱兆。这时，河西步藩南下袭晋阳，晋阳是尔朱氏的根基，高欢配合尔朱兆击退步藩，尔朱兆很高兴，才没有计较高欢没有随他去洛阳杀孝庄帝的事。

尔朱兆要用高欢给他打仗，又防备高欢势力大了会威胁自己，对高欢免不了防范。高欢是机灵人，深知自己的境况并不太好，同时他也不满尔朱氏

杀人如麻的野蛮劲，总想找机会离开尔朱兆，建立自己的功业。

河北大起义失败后，约有 20 万参加过六镇起义、葛荣起义的流民流亡到并州一带，偏偏这一带又连年霜旱、灾情严重，这些流民生活无着，面有菜色，到处饱受白眼，因此对官府十分不满，经常闹乱子，而且随时可能重新聚众起事。这事成为尔朱兆的一块心病。

尔朱兆找高欢商量，想把这些人全杀掉了事，又怕万一失着，会导致民变。因此一时拿不定主意。高欢就给他出主意，建议不要惹这个麻烦，最好是派个得力的心腹去疏导、管理，这样既免了闹事，还可以落个好名声。尔朱兆觉得这真是个万全之策，只是派谁去好呢，心里还没有数。

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和高欢一起投靠尔朱荣的贺拔允，贺拔允心直口快，连忙插嘴道：“我看高欢就很合适。”高欢早就想借机离开尔朱兆，去并州正是他的心愿，可又担心尔朱兆看破了他的意图，因此故作气愤地说：“老贺呀，这事丞相自有安排，你胡说什么？”贺拔允被呛住了，心里又不服，瞪着眼在那儿发傻，高欢接着起身向尔朱兆作了个揖说：“丞相，贺拔允目无尊长，请依律治罪，以戒往后。”尔朱兆对这并不在意，他还在琢磨人选，经贺拔允一提，倒觉得派高欢去蛮适合的，就对高欢说：“我也和贺将军一样，有这个意思。我不怪罪你们，高将军准备准备，替我把这桩麻烦事办了吧！”高欢见尔朱兆果然派他去并州，掩盖住内心喜悦，装出一副老实听命的样子，很快率军离开了洛京。

高欢到了并州，马上集合流民，说他们日子太苦了，有机会就带他们去太行山以东的地面去“就食”。流民们正为生计烦恼，听高欢这么一说，哪有不拥护的道理？高欢在起义军中呆过好长时候，深知六镇兵民的心思，因此特别尊重这些人，还接起义军中的习惯，把他们编成队伍，让他们觉得自己再不是受人歧视的流民了。这就样，高欢得到流民的真心拥戴，力量迅速壮大，成为后来与尔朱兆决裂的雄厚资本。

魏建明二年（公元 531 年），高欢乘朝廷尔朱氏叔侄发生内讧，率众从并州到了太行之东。当时那里的实力人物是契胡族的冀州刺史刘诞，尔朱家族的殷州刺史尔朱羽生、幽州刺史刘灵助、定州刺史侯渊，以及赵、魏的大族首领封隆之、高乾、高昂等人。其中，刘灵助反对尔朱氏，拥兵自立，自封燕王；另外几个刺史都是尔朱兆的亲信；倾向高欢的是大族首领。高欢对尔朱兆早有异心，只是还没有公开决裂，所以他既不想靠拢尔朱氏一伙，也不便对侯渊表态，感到形势复杂而微妙。幸好高欢一到滏口（今河北滋县石鼓山），就受到大族首领的迎接，欢迎他进驻信都，于是有了落脚之地，流民们也因为多少“就”到一些“食”，高欢又那么看得起他们，还常常给他们“透漏”一些尔朱兆如何准备杀灭他们的事。这样，大家都恨死了尔朱兆，愿意跟高欢卖命，高欢成了鲜卑流民和士族大姓联合势力的领袖。

高欢见时机成熟，决定起兵，他接受葛荣失败的教训，对流民们说：“葛荣拥兵百万，为什么一战失利就全军溃散，让大家吃了那么多苦？还不是因为没有约束吗？这次起兵，我有两个条件：一是不得侵犯汉人；二是要服从我的命令。大家做不做得得到？”众人连呼：“做得得到！”高欢大喜，当即命人宰牛造饭，让大家饱吃一顿，然后正式宣布讨伐尔朱兆，为天下除害。接着，又接受部将孙腾的建议，另立魏宗室的疏属、渤海太守元朗为帝，自任丞相、大将军。

同年，高欢所部与前来剿叛的尔朱兆大军遭遇，高欢见兵力不如尔朱兆，

向部下询问如何破敌，部将段韶以“得民心者得天下”为计，主张声讨尔朱兆上杀皇帝、中杀大臣，下杀百姓的滔天罪行，以反暴讨凶相号召。高欢大喜，依计而行，果然顺应人心，一时军威大振，将士奋勇，两军交锋勇者胜，很快将尔朱兆全军击溃。

魏普泰二年（公元532年），高欢一举攻下邺城。尔朱兆又率军反扑，高欢带着3万步骑在邺城外的韩陵山摆下阵势迎敌，而且自堵退路，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术，决心和部下一同以死相拼。尔朱兆在阵前质问高欢道：“我有何对你不起，你却要反我？真是忘恩负义！”高欢历数尔朱氏罪行，尔朱兆听了气得乱跳，马上指挥军队冲阵，高欢沉着应战，两军相持不下，这时高欢几员部将突然从两翼冲杀出来，尔朱兆的军队猝不及防，被冲得七零八落，很快溃不成军，高欢乘势打了过去，尔朱兆抵挡不住，大败而逃，缩回晋阳城中。

尔朱兆兵败，洛阳城内一些大臣响应高欢，动手杀了尔朱世隆及其党羽，尔朱氏宣告覆灭。高欢率兵进了洛阳，把以前两边立的皇帝全废杀了，另立平阳王元修为帝，这就是孝武帝。孝武帝封高欢为大丞相，请他独掌朝廷大权。高欢接着又带兵攻下晋阳，尔朱兆兵败自杀。高欢从此控制了整个魏国。孝武帝也不甘当傀儡，密谋除掉高欢，被高欢察觉，从晋阳带兵来洛阳问罪。孝武帝见情形不妙，想到关中是鲜卑人的地盘，驻兵长安的宇文泰父曾对他表过忠心，便连夜逃往那里躲避。宇文泰也是野心勃勃的实力人物，见皇帝逃来，正好利用一番，就请孝武帝在长安当皇帝，自己做大将军，总管朝政。

高欢见孝武帝跑了，就另立孝文帝的重孙元善见为帝，这就是孝静帝，并把都城从洛阳迁到邺城。

从此，东都邺城，西都长安，魏国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两家分魏后，自洛阳到潼关的路上，便摆开了高氏与宇文氏角逐争雄的决斗场，洛阳城在战争中又一次化为灰烬。

侯景之乱

梁武帝末年，梁朝政权已如同垒在沙滩上的浮山堰，看似巍峨壮观，实则不堪冲击，而偏在这时，一股祸水自北而来，把个梁王朝冲得个稀里哗啦，这就是有名的“侯景之乱”。

侯景本是魏怀朔镇（今内蒙古包头市）中已经被鲜卑族同化了的羯人，为人机诈多变、反复无常。早年参加过六镇起义，起义失败后叛降北魏，在尔朱荣手下充当先锋官，随尔朱荣入晋阳、进洛阳，因镇压葛荣起义有功，升为定州刺史。葛荣起义军中有个和侯景情形相似的同乡高欢，自幼与侯景相识，起义失败后，投降尔朱荣，与侯景关系更非同一般。后来，高欢灭了尔朱荣，依靠鲜卑武力，联络山东士族，独掌兵权，当上了东魏大丞相。侯景凭着与高欢的密切私交和两人臭味相投的禀性，依附高欢，从相府长史兼定州刺史，步步升迁，直做到河南道，成为当地大行台最高军政长官。拥兵10万，镇守河南达14年之久。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公元547年）高欢死，高欢之子高澄继任丞相，见侯景权力太大，下令调回另用，侯景马上翻脸，拒不受命，并以河南所辖13州为进见礼，投降了西魏。西魏文帝深知侯景狡诈多变，采取了“受降如临敌”的态度，分派大军，逐州逐镇陆续接管了侯景献地7州13镇，同时召侯景入长安，采取明助暗压的办法，企图解除他的

兵权，免生后患。与此同时，高澄见侯景叛变，命大将慕容绍宗领兵进逼河南。侯景在东西魏的夹攻下，十分不利，于是派使臣到江南梁朝洽降，请求援助。

这时的梁武帝已经老朽昏聩之极，而贪婪之心却十分强烈，愚蠢地认为这是佛祖赐给他统一中国的良机，于是贸然答应侯景附降，封侯景为大将军、河南王，并派侄子萧渊明率领南朝主力军队 5 万人进攻彭城（今江苏徐州市），由于梁朝军队早已腐败透了，只知道劫掠民财，却不敢对敌打仗，加上主帅怯懦无能，当大军开到距彭城 18 里的寒山堰时，遭遇东魏军队阻击，一仗下来，主帅萧渊明被俘，梁朝主力全军覆没，元气大丧。东魏慕容绍宗随即回师进击侯景，侯景率 4 万人退守涡阳（今安徽蒙城县），仍抵挡不住东魏锋芒，最后只剩得 800 步骑，逃奔梁朝，赚取寿阳城（今安徽寿县）栖身。

梁军大败，消息报到建康，梁武帝恰在床上，当即闻讯失色，惊叫一声，往一侧倒去，幸亏左右扶住，才未跌落床下。侯景进寿阳，梁武帝竟还封侯景为南豫州刺史，并赏赐钱帛，托他镇守寿阳。这时，东魏乘胜追击，并开展外交攻势，向梁朝提出用俘获的萧渊明换取侯景，意在离间侯景与梁朝关系，促使侯景叛梁，以收渔利。梁武帝偏袒诸王，不加深思便答应东魏道：“萧渊明早上送回，到晚上我就遣返侯景。”

经过这番折腾，侯景已看到梁朝的衰朽，于是蓄谋染指皇权，他曾公然对人说过：“我取河北不成，取江南却有把握。”等他得知梁武帝竟要牺牲他与东魏议和，并已派出议和使臣徐陵去了东魏，他哪肯束手待毙，在抗议无效后，于太清二年（公元 548 年）八月毅然叛梁，强迫民众充当士兵，袭取谯州（今安徽含山县）、攻陷历阳（今安徽和县），引兵直临长江。梁武帝对侯景毫无防范措施，竟派萧正德为平北将军率兵布防，依仗长江天险以保建康，并派第六子萧纶为四道都督北讨侯景。

萧正德因梁武帝没让他当继承人早已耿耿于怀、阴有异志，这次奉命布防，被侯景利诱，甘作内应，侯景许他事成之后拥为国君。这一着正中萧正德下怀，决定卖国叛亲，密派大船将侯景叛军从北岸的横江浦（今安徽和县东南）接到南岸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来，侯景军队轻而易举渡过天堑，直逼秦淮河南岸。梁武帝这时十分慌乱，急令太子萧纲死守京都。萧纲和他父亲一样昏庸，竟又派假装败阵而回的萧正德守宣阳门，萧正德率兵来到秦淮河北岸，再次将侯景接过来，两岸会合，直抵京都内皇宫所在地台城，并攻陷周围的石头城、东府城，又引玄武湖湖水灌台城，当时台城内有名将羊侃死守，叛军屡攻不下，侯景生怕各地援军赶来“勤王”，急令放火烧城，不料火又被守城军队浇熄，再改用“木驴”爬城，又被城中砸毁烧坏。得位心切的萧正德见台城屡攻不下，干脆另找一处作为皇宫，宣布登基，侯景受封丞相。对此，侯景一时也顾不了那么多，只想如何攻下台城。他终于想出个主意，派人四出宣传，说：“梁武帝偏袒诸王，掠刮民脂。”并说自己出兵“全是为了给百姓作主，无意灭梁”。还指着刚称帝的萧正德作证。问时，他还把奴隶改成平民，给他们自由。这几招还真厉害，把梁武帝几十年的伪装给捅破了，叛军一时士气大振，加上台城守了 130 多天，粮食断绝，军士连死带病，疲惫已极，战斗力大减，正平二年（公元 549 年），台城终于被侯景攻破。

可是，梁武帝的“勤王”之师在哪里呢？难道 100 多天还赶不到吗？原

来他们早已驱兵到达，就驻扎在建康周围，人马大约有 30 万之多。不论兵员数量、武器配备、训练程度以及粮草辎重都大大优于侯景、萧正德的叛军，只可惜这些援军主帅虽是梁武帝的至亲骨肉，但却各怀险恶阴私，存着一个做皇帝的野心，只是不肯像萧正德那样公开叛梁，背上个孽子孽孙的罪名而已，因此，巴不得借侯景之手杀了梁武帝和太子萧纲，这叫做借刀杀人，哪里还肯真正救援！因此一个个不约而同，勒住军马，“淹留不进”，作壁上观，“勤王”之师也顿时作鸟兽散，各顾各去对付有力量争夺帝位的自家骨肉去了。这时萧正德按照早先与侯景的约定，亲自操刀赶来要杀梁武帝和太子萧纲，可侯景翻脸不认帐了，他不仅不许萧正德动手，还指责他僭号，宣布废除。萧正德空喜一场，转而生恨，却又奈何不了侯景，于是悄悄派人到外地召兵买马，以图卷土重来。不料侯景早有防备，不等萧正德行事，就把他抓来吊死了。侯景还煞有介事地进宫朝见梁武帝，自封为都督中外军事、录尚书事等头衔，宣布执掌梁朝军政大权。梁武帝这时已经 86 岁，老得不能动弹，望着侯景胡作非为，只有念“阿弥陀佛”的份，又遭侯景软禁，加上茶饭不齐，很快病得不省人事，却连一口口水也讨不来，“菩萨皇帝”就这样在挣扎着大叫了几声后，仍不见神佛相助，便一命归西了。侯景闻丧，当即在台城中立了梁太子萧纲为帝，改元大宝，他就是梁简文帝。简文帝纯粹是个傀儡，侯景又自封为相国、宇宙大将军。两年后，看着简文帝不顺眼，便将他废掉，并叫人用泥土装入麻袋，把萧纲压死，还灭了他满门。另选了已故昭明太子萧统的长子萧欢的儿子萧栋做小皇帝，随后再通萧栋“禅位”。梁天正元年（公元 551 年）11 月，乱世魔王侯景宣布称帝，国号为汉。

傀儡天子元善见

魏孝武帝西投宇文泰这件事，总让高欢感到不是滋味，自己一手立起来的皇帝，却从自己手里跑了！这一跑，高欢失去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而宇文泰却捡了大便宜，一跃而成为他的政治劲敌。高欢觉得这件事太窝囊了，他深悔自己失算。虽说另立一个皇帝并不难，但新君要是又不听话，甚至再开溜，那自己的脸面往那搁呀？至少也是一桩麻烦事吧！因此他特别警告自己，应该从削弱元氏势力中暗暗加强高氏的势力，而对傀儡皇帝还得装出恭敬的样子，这样才能干成大事。

高欢是个精通权诈的人，比如他需要挑动六镇兵民反对尔朱兆时，就曾言之凿凿地对这些人说尔朱氏是如何如何想杀灭他们的，自己又是如何如何在设法保护他们，以此刁买人心；又比如他需要调和手下鲜卑人和汉人的关系时，凡遇到汉人就说：“鲜卑人其实是你们的雇工，他们得了你们一点粮草、布匹，就为你们打仗卖命，你们哪里去找这么合算的事呀！又何必怨恨他们呢？”而遇到鲜卑人时，他却说：“汉人是你们的奴婢，男人们勤恳种粮，女人们精心织衣，供给你们吃穿，你们还想欺侮人家，就不怕人家叫你缺衣少食吗？”这么说说去，汉人和鲜卑人都觉得自己占着便宜，高欢又对自己这边那么贴心，偏护着自己，因此很愿意听他指挥。

这一次高欢不得已要另立新君，他前思后想，思量了好久，决定立一个小皇帝，好哄着点儿，只要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就行。他选中了孝文帝的重孙元善见，一是这孩子只有 11 岁，容易摆布；二是孝文帝声望不错，立他的重孙也容易为世人接受。孝静帝元善见登基后，国都迁往邺城，与长安那边

东西对峙。由于高欢不忘孝武帝出逃给自己带来麻烦的教训，因此在表面上对孝静帝始终表现得恭恭敬敬。已经毫无实力可言的元氏帝裔，能有这样一个稍微宽松一点的地位，实在已经很幸运了。

然而，寄人篱下终难长久。东魏武定四年（公元546年），高欢又一次西征，在攻打玉壁城时，西魏晋州刺史韦孝宽据险坚守，东魏损折人马7万，玉壁城还是没有攻克，高欢却因劳顿而患上重病，实在难以坚持，只得退兵回朝。当时，西魏方面见高欢无功而返，马上发动舆论攻势，一时谣传风起，说高欢攻城时中箭在身，恐怕活不长了。高欢为稳定军心，勉强支持病体，接见宾客亮相，还让斛律金当堂歌唱，著名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歌就是这时广为传颂开来而至今未衰的。当时，高欢边听边和，感情激荡，想着自己和敕勒人一样，也是匈奴后裔，从茫茫苍苍的大漠走到问鼎天下这一步，确实太不容易了。因而更是感慨万千，以致于不知不觉中泪流满面。

高欢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考虑后来的安排，他对长子高澄面授机宜，告诉他朝中大臣哪些人品性如何，哪些人忠心可靠，哪些人要严加提防，还特别点明自己为什么不抬举慕容绍宗的意图，就是为了把施恩的机会留给儿子接任时用，以便靠此人对付如狼似虎的“祸患”侯景。高欢的病体好容易熬过了年，于武定五年（公元547年）正月，在晋阳病亡。高澄接替父亲，独掌东魏大权，可他却没有高欢那样耐心，不肯哄着孝静帝，因为他实在不喜欢这个傀儡，当然也不把孝静帝放在眼里。这样一来，孝静帝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高澄派他的亲信、大将军崔季舒监察孝静帝的动静并加以管束。这个“好文学，美仪容”，感情丰富、性情娇贵的小皇帝哪里受得了呢？发生矛盾势所难免。

有一次，孝静帝到邺都东郊狩猎，正飞马逐鹿，忽然听到监卫都督受工伐在后面大叫：“天子，别跑那么快！否则，大将军会生气的。”孝静帝听了，顿时火冒三丈，真想痛快发顿天子的脾气。可“大将军”三个字音犹在耳，使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寄人篱下的地位，于是下意识地勒紧马缰，压住火气，不敢造次。他明白，自己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杀身之祸。

又一次，君臣宴饮，高澄手举大酒杯，走到孝静帝御座前，像对伙计似地说：“陛下，咱俩于这一杯！”孝静帝哪里受得了这个，心想你高澄的父亲一生都对我恭恭敬敬，你却不知天高地厚，这成何体统？于是坐在龙椅上面带怒色反唇相讥道：“自古以来，没有不亡之国，朕也不想像这样活下去了！”高澄见孝静帝竟敢如此扫兴，也不客气，当场破口骂道：“你还‘朕’哩？是狗脚朕！”骂完还不解气，又叫崔季舒道：“给我打！”崔季舒冲上去就是三拳，打得孝静帝歪在御座上不能动弹，众官吓得鸦雀无声，高澄则余怒未息，把衣服一甩，昂着头走了。

孝静帝被扶回后宫，他越想越难受，心中忧辱交煎，不觉顺口吟道：“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身江海人，忠义动君子。”立在一旁的常侍侍讲荀济一听就知道孝静帝是借用谢灵运的诗发泄心头的忧虑之情，他也是不满高澄横暴的人，就去和华山王元大器、元瑾等密谋对策，并决定帮助孝静帝逃出虎穴，然后号召天下拥君勤王。可是，宫门内外到处是高澄布置来监视皇帝的亲信，怎么逃呢？他们等事情稍稍平静后，就以筑假山为幌子，开始从宫中向北城方向挖掘地道，刚挖到千秋门，响动之声就被发现。高澄闻报，带兵入宫责问孝静帝道：“陛下干的好事！难道要造反不成？我高氏父子，

功存社稷，哪里对你不起了？”接着叫来人将嫔妃统统抓起来，要以通同谋反的罪名处死。孝静帝也横下一条心来，严厉地说：“自古以来，从来只听说臣下造反，还没听说过皇帝造反的。是你自己在造反吧，怎么反而赖到我头上来了呢？再说，我自己都不想活了，你杀几个嫔妃就能吓唬住我吗！”高澄被质问得理屈词穷、无言对答，只好举酒谢罪，给自己下台阶。出宫以后，就下令把孝静帝幽禁在含章殿，将主持挖地道的元大器、元瑾押赴市曹，用酷刑烹死。

高澄处置完宫中之事，又忙于整顿朝政和指挥与西魏宇文泰的战事。武定七年（公元549年）七月，高澄回到他的将军府中，府中有个厨子，名叫兰京，原是南朝梁国战将兰钦的儿子，被东魏俘虏，当作奴隶使用。兰钦多次要求高澄，要赎回这个儿子，兰京也当面恳求放他回去，高澄就是不准，还十分生气地命监厨苍头薛丰洛将兰京打了一顿大棍，并且警告兰京，再敢提回梁国的事，就把他杀了。兰京满怀怨恨，和六名一起被俘为奴的梁兵商量干掉高澄。

高澄当时正宠着琅琊公主，为了往来方便，把所有侍卫都放在外厅，兰京见机会来了，将匕首放在托盘里，假装送菜，闯进去。高澄和琅琊公主正玩得高兴，见兰京闯进来，很生气地质问道：“我没叫送饭，你进来干什么？”兰京挥动匕首答道：“来杀你的！”高澄慌忙抽刀防卫，不料伤了自己的脚，站立不稳，兰京和六名被俘梁兵蜂拥而上，将高澄杀死。高澄的弟弟、太原公高洋闻讯，带兵赶来，将兰京抓获碎剐，然后稳住政局，再回过头来对付孝静帝。

武定八年（公元550年），高洋一切准备就绪，在昭阳殿接见襄城王高旭及司徒潘相乐、侍中张亮、黄门郎赵彦琛等大臣，由高旭提议请魏孝静帝禅位给高洋。高洋在一旁假惺惺推辞一番，而高旭则催孝静帝表态，孝静帝被逼无奈，只得表示自己“谨当逊避”，愿作禅让诏书，而高洋已不耐烦，示意手下人，告诉元善见：“诏已作讫。”元善见又问诏书中如何安置他这个逊帝，高洋让他放心，说逊位之后封为中山王，在封地内一切维持魏国旧例，还可以使用天子的旌旗，有万户食邑，连他的几个儿子也都封为县公，在小小的国中之国享受特殊待遇。

元善见怀着深深遗憾和无奈，以汉献帝自比，然后下了御座，走向东廓，与六宫告别，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上了为他准备好的牛车，出云龙门而去。孝静帝走了，东魏从此宣告完结。高洋坐上帝位，改国号为齐，定年号为天保。历史上称为“北齐”，把南朝萧道成建立的齐朝称为“南齐”。

宇文泰关中建功业

宇文泰也是鲜卑人，不过他所出身的宇文部落在鲜卑族中早已散亡，和魏国执政的拓跋氏在情感上是格格不入的。

宇文泰从小就跟着父亲宇文肱在军中生活，宇文肱曾经攻打过破六韩拔陵的重将卫可孤，立下军功；后来在鲜于修礼部下效力，不幸战死沙场。宇文泰从小就得到战争的磨练，形成了刚毅的性格，到18岁时，葛荣大军杀了鲜于修礼，他们兄弟几个被收编到义军之中，可他对起义部队抱敌视态度，计划逃出去。正在这时，尔朱荣击败葛荣、平定河北，宇文泰也就到了尔朱荣的控制之下，随着来到尔朱氏的军事中心晋阳。

本来，宇文兄弟倒是愿意追随尔朱荣的，可尔朱荣见他们兄弟几个十分雄杰，害怕将来成为自己的对手，于是寻找借口杀了宇文泰的二哥宇文洛生，接着又想杀掉宇文泰。宇文泰却不畏惧，他主动找到尔朱荣，慷慨陈辞，辩白冤屈，这使尔朱荣顿生敬佩之心，认为此人可用，改变了敌视态度，让他当了一名统军，归属部将贺拔岳管辖。

从此，宇文泰开始了他的征战生涯，随贺拔岳开进关内，打击万俟丑奴的起义军，灭了尉迟菩萨等的队伍。贺拔岳也是不愿久居人下之辈，他乘尔朱氏的尔朱天光与高欢交战的机会，派宇文泰去说动了泰州刺史侯莫陈悦，双方合力袭取了尔朱氏控制的长安，有了立足之地。并追到华山下，活捉了北魏长安守将尔朱显寿。北魏普泰二年（公元532年），贺拔岳受任关西大行台之职，宇文泰被命为左丞相，大小事务，都由他决断，从此成了关西的实力人物。

高欢击败尔朱氏后，宇文泰到并州活动，刺探虚实，差点被高欢扣住。他设计脱险归来后，对贺拔岳分析形势道：“高欢这人大有野心，将肯定是我们的主要对手。侯莫陈悦是个庸才，不难对付。至于费也头的1万骑兵，夏州刺史斛拔弥俄突的3000勇士，以及灵州刺史曹泥等人，虽然都想乘机找点便宜，但他们地处僻远，一时还不会对我们构成威胁。而河西流民纥豆陵依利，掌握着大量的户口和财富，又暂时没有归属哪一边，正好争取利用。我们如果在甘肃一带扼住他的要害，向他显示军威，同时以德服人，就完全能够降伏他，用他们的兵马、资财来壮大我们的军力，这样就不难实现西辑氏、羌，北抚沙塞，还军长安，匡辅魏室的目标了。”

贺拔岳战死后，宇文泰统领大军，当上了大都督，他按照原来对形势的分析，通过几番征讨，终于控制了关西地区的形势。但是关西毕竟是个民贫兵弱的地方，势力还远远不及高欢。北魏永熙三年（公元534年），正当宇文泰千方百计寻求机会时，魏孝武帝逃出洛阳来投奔他。宇文泰接纳了孝武帝，从此便名正言顺地在政治上与高欢分庭抗礼起来，可是，宇文泰也和高欢一样，只想把孝武帝当傀儡供奉，并非真的需要什么真龙天子，而孝武帝偏偏是个不甘受人胁迫和摆布的角色，这样，宇文泰与魏帝的矛盾很快就变得十分尖锐起来，宇文泰觉得孝武帝已经没有存在价值了，就采取果断措施，在这年冬天，派人在酒中下毒，药死了孝武帝元修，第二年初，又另立了南阳王元愉的儿子元宝炬为帝，建立了西魏政权，元宝炬就是西魏文帝。西魏政权则完全由宇文泰所控制。

宇文泰决心对西魏治理一番，让它尽快兴旺起来，他选择了争取关西汉士族为主的目标，力求扩大势力，以便于同东魏抗衡。可他又不想像魏孝文帝那样全力追求汉化，反而希望他的统治集团里的汉人鲜卑化，这就为他后来的失败伏下了病根。当时，他也进行了一些成功的改革，比如他重用右光禄大夫苏绰，实行屯田制和计帐法，颁布了《六条诏令》，要求官员做到清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民、恤狱讼、均赋税。他还专门开设学校，让下级官员白天治理公事，夜间入校讲习。并规定凡州刺史、郡守、县官不通《六条诏令》和计帐法的，一律免职。同时，又裁减官员数额，慎重选择闾正、族正，严禁贪污，奖励清廉。这一系列改革措施，确实起到了强国富民的作用，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大有万象更新的态势。比如，河北太守裴侠，是个当时乱世中少有的清正俭朴的官员，他吃的是菽麦、盐菜，用的是陈旧器皿，屡立战功而居功不傲，体恤百姓更是爱民如子。根据当时旧制，政府

拨给太守 30 名渔猎伏役供给饮食、又拨出 30 名丁壮供给役使。对此，裴侠却说：“靠别人供养，是我最不愿意的事。”他让这些入尽其所长，去从事生产，所有收入都用来为公家购买马匹，供打仗和运输之需，以减轻百姓负担。最后马匹成群，而他离任之时，却两袖清风，一无所取。为此，深为吏民怀念。宇文泰得知裴侠勤俭奉公的事迹后，立即抓住这个难得的典型，重重嘉赏，给百姓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而宇文泰的内兄王超世则相反，凭借裙带关系，仗势欺人，肆意贪污，宇文泰发觉后，大义灭亲，毫不客气地将王超世查明问斩。这种秉公执法的严厉行动，狠狠刹住了官员们贪污受贿的恶劣风气，得到人民的拥戴。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西魏的政治显然比东魏要好，宇文氏的政权也从原来的困境中走向缓和，趋于巩固，逐步地积聚了与东魏争天下的实力。

东魏方面，高欢也虎视眈眈地盯着宇文泰，等待时机，准备随时伐灭西魏。

宇文泰的改革还在一步步进行，初步的成功令他欣喜，可这一切与他保持鲜卑人的政权，彻底改造汉制，使汉人鲜卑化的目标，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然而时间却不容许他从容改革了，西魏文帝大统二年（公元 536 年），也就是他厉行改革的第二年，由于天公不作美，关中地区发生了大灾荒，百姓“死者什七八”，大量的饥民构成了宇文氏政权极不安定的因素，高欢见机会到了，当即调集大军向关西扑来，试图一举歼灭西魏，宇文泰只好暂时放下国内的改革，全力以赴迎战高欢，从此，拉开了东西魏长达 15 年的一系列吞并战争。

两虎相争五接战

高欢与宇文泰的东、西魏吞并战争开始了。小关之战揭开序幕。

西魏大统二年（公元 536 年）正月，东魏高欢西征，占据了汾水入黄河的龙门（今山西河津县），继续沿黄河河套南下，抵达蒲坂（今山西蒲州）。蒲坂是自古以来兵家西进、争夺潼关（今陕西老潼关）的运兵渡口，高欢令前军在黄河上架设浮桥三座，直逼长安。

高欢这次伐宇文泰，兵分三路，除自率中军之外，用先锋窦泰攻占潼关，派大将高昂从风陵（今山西风陵渡）渡黄河，驱兵南下，直取洛州（今陕西商县），然后西进，形成南北夹攻长安之势。

宇文泰当时带兵从广阳南归长安，得到高欢东侵的紧急军事情报，忙召集军中将帅，商量对策。宇文泰分析战情道：“如今高欢分三路互为犄角之势向我们逼来，又大造浮桥，显示出不惜一切从蒲坂渡河的姿态，目的就在于引诱和牵制我军主力与他在黄河两岸相持。而他的先锋窦泰则可以趁我风陵兵力不足的机会，强渡黄河，攻占潼关要塞，将我军控制在关内，围而歼之。”众将帅骂道：“好毒！我们该怎么办呢？”宇文泰接着说：“高欢自从起兵以来，总是派窦泰担任先锋，窦泰手下兵精卒锐，屡屡获胜。正因为此，便生骄傲之心，以为无人敢敌。自古道‘骄兵必败’，我这次就要从窦泰开刀，打他的七寸，等窦泰一败，高欢不战自败，何须费力！”众将帅又问：“高欢离我们近，窦泰距我们远，舍近而击远，若有差错，让高欢主力过了黄河，我们悔都来不及了啊！”宇文泰满有把握地说：“错不了！我准备用精兵突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掉窦泰，此举万无一失。退一步说，

即便高欢真的过了黄河，我军也不过暂退霸上（今陕西临潼）而已，仍可拱卫长安不失。”宇文泰怕众将帅心中不踏实，又说：“高欢这次大军压境，以为我们兵力弱小，只能防守，根本没想到我反要袭击他的精锐前锋，再加上他一时得逞，有轻慢之心，乘此机会攻打，何往而不胜呢？他虽搭造浮桥，那么多军队也不可能一下子全渡过来，至少需要五天时间，这时我早已把窦泰消灭了。”

宇文泰定下方案，军队也回到长安，然后故意放出风来，谎称“东魏攻伐，军威正旺，一时难以抵挡，不如退守陇右（今甘肃东部）暂避锋芒，再作计较。”还故意做出引军西退的样子，麻痹高欢。第二天，宇文泰拜别文帝元宝炬，率领精兵悄悄折向东方，衔枚疾走，沿渭水直奔潼关左边的禁谷，地名小关。窦泰此时已经占了潼关，正自得意，根本没有安排防御，却万万没想到宇文泰会来偷袭，当时窦泰已经来不及摆开阵势应战，就被宇文泰的军队击溃，成了俘虏，窦泰也随之自杀。

高欢得到消息，如雷震耳，惊愕不已，只好赶快拆掉浮桥，撤回军队，并急令高昂从上洛一线退兵。

宇文泰以弱胜强，出奇兵一击定大局，首战告捷，取得了东、西魏交锋的第一次胜利。

第二年，东、西魏又爆发了沙苑之战。这年八月吉日，宇文泰率李弼、独孤信、梁御、赵贵、于谨、若干惠、怡峰、刘亮、王德、侯莫陈崇、李远和达奚武等 12 员战将伐东魏，兵至潼关，宇文泰誓师道：“这次出兵，奉天威，诛暴乱，全靠众位将士，你们要整顿好武器、战马，作好血战的准备，不准贪财轻敌、凶暴逞威，遵守的有奖，违令的杀头！”旋即派于谨为东征先锋，当天就攻下盘豆（今河南阳平西北），活捉东魏守将高叔礼。第二天，又攻破恒农（今河南三门峡市）城，俘获东魏陕州刺史李徽伯、恒农守将高千及守军 8 000 多人，一时威震敌胆，周围的宜阳（今河南韩城）、邵郡（今山西古城），望风而靡，纷纷归降。

高欢见来势凶猛，心中大惊，于是调集鲜卑主力 10 万朝蒲坂进发，另派大将高昂率 3 万人在黄河以南阻截宇文泰，其实，宇文泰东征只是虚晃一枪，他是因为关中粮荒严重，而东魏在恒农城储有大量积粟，这才前去武装“就食”，等高欢兵马赶到，他已住了 50 多天，满载而归。

高欢吃了个亏，气恨交加，干脆挥军从蒲坂津渡过黄河，再过洛水，将 10 万大军屯扎在许原，要找宇文泰报复。宇文泰由于当时手中只有 1 万兵马，敌我兵力悬殊，于是向众将问计，部将宇文深说：“高欢在黄河以北甚得众心，他虽乏智谋，而人皆听命，若是安分守土，要打他还很不容易。如今驱兵西征，让鲜卑人相互攻杀，实非众愿，难以齐心。只因窦泰被斩，又失积粟，丢了面子，含愤而来。这是‘忿兵’，一战可擒。”宇文泰深以为然，当即率精锐轻骑从渭水南岸渡到北岸的沙苑（今陕西大荔县南），距高欢大军 60 里安营。大将李弼又向宇文泰建议：“敌众我寡，不可平地置阵。此处东面 10 里有渭曲，可据以待敌。”宇文泰觉得有理，将军队推进 10 里，背水分东、西列阵，李弼指挥西边方阵，赵贵指挥东边方阵，都埋伏在芦苇丛中，以鼓声为令，操戈待敌。十月二日申时，东魏大军兵进渭曲，明知西魏兵少，毫不在意，乱嚷嚷往西边方阵闯去，宇文泰见敌军已至，击鼓催战，于谨率兵迎敌，李弼、赵贵伏兵顿起，李弼的铁骑横击东魏主力，将高欢大军截为两段，不能照应，东魏大败，高欢连夜跨骆驼逃往黄河西岸，抢得船

只渡河，其余几乎全军覆没。

沙苑一战，宇文泰虏敌7万，获粮草辎重无数，全胜而归，从俘虏中选留2万人补充军队，其余则全部放回，用以分化高欢。李穆见高欢已吓得魂飞魄散，建议乘胜追击，宇文泰怕高欢反扑，主张“穷寇勿迫”，带兵返回渭南。

接着便是河桥之战。西魏沙苑之捷后，士气高昂，一举攻下了河东的蒲坂和洛阳的金墉城。东魏孝静帝元象元年（公元538年），东魏大将侯景夺回金墉，烧毁了洛阳内外大量官寺民居，西魏文帝元宝炬和丞相宇文泰本来要到占领的洛阳去祭扫先帝陵园，见侯景攻打金墉，宇文泰亲率大军前往救援，前军到谷城（今河南新安县东），击杀了东魏前锋莫多娄贷文，侯景北据河桥（今河南孟县西南），南依邙山（今河南洛阳市北），布好阵势，宇文泰提兵赶到，搏战时马中流箭，宇文泰被摔落下来，幸亏大军掩杀过来，救起宇文泰，奋勇进击，东魏军被杀得大败，落水而死者多达万人，15000兵士被俘，连大将高昂也被追兵斩杀。

高欢闻知侯景战败，亲率精锐骑兵7万赶到洛阳，这时西魏大军已撤，金墉守将见势弃城逃遁，东魏收复洛阳。可等高欢刚一撤兵，西魏便卷土重来，再占洛阳，几经战火熏炙，名城洛阳已破败不堪。不过，宇文泰的确又赢得了一次胜利。

双方经过五年的相持，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公元543年），再燃战火，这就是邙山之战。这年二月，东魏的北豫州刺史高慎降西魏，虎牢关（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落入宇文泰手中，宇文泰率领大军至洛阳前线接应高慎，并遣大将于谨围攻河桥南城，东魏高欢则于三月提10万大军赶到黄河北岸。宇文泰从上游放火船下来烧河桥，以阻止高欢进兵。东魏及时派出100多只小艇拉起铁链挡住火船，拖到岸边，保护了河桥，高欢大军顺利从桥上通过，占据军事要地邙山。宇文泰向邙山推进，两军交锋，东魏大胜，斩杀西魏将士3万多人。第二天，两军再战，西魏中军、石军联合击败东魏，而左军失利，宇文泰战败，只得引兵退回关内。

邙山之战虽败，西魏耿令贵、王胡仁、王文达等三名关西将领仍因功受赏。宇文泰从此看中关中人的勇猛，广泛招募关中豪强充实军队，并创立府兵制，藏兵于民，一旦需要随时可以调集。同时改革官制，改鲜卑化为汉化，实行依靠汉士族的政策，使实力大大加强。

事隔三年，东魏武定四年（公元546年）又爆发了玉壁之战。这年十月，高欢再次率十万大军围攻西魏的玉壁（今山西稷县西），要拔除西魏在汾水下游的重要据点，西魏拼死坚守，东魏大军猛攻50多天，死伤7万人，仍未攻下，最后高欢病倒，方才解围而去。宇文泰获得了保卫战的胜利。

不久，高欢病亡，侯景叛降，东魏由高欢之子高澄接掌大权，双方仍时有攻战，东魏武定八年（公元550年），东魏高澄以10万兵攻打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东北）一年，双方死伤无数，才得以攻下此城。这时，侯景乱梁，南朝衰颓，东西魏两虎这才罢战，转向梁朝扑食去了。

南朝大劫难

晋末以后，南朝日见富庶、也日增奢靡，其中尤其以都城建康和“三吴”（即吴郡、吴兴、会稽三郡。今苏州市、湖州市、绍兴市。）与荆州（今湖

北荆沙市)为最。经过侯景之乱，建康城内，人财被抢，宫殿、文物化作劫灰，一派荒凉景象。而侯景的汉王朝，又偏偏是一个专事烧杀抢掠、暴虐生灵的罪恶政权，侯景这个乱世魔王狂喊着“攻入城市，杀个干净，使天下人知我威名！”驱动数百名饥兵直指东南，丧心病狂地扑向“三吴”。

“三吴”守将多是皇族，他们残民如狼，却又畏敌如虎。首先是吴郡太守，明摆着手中有5000精兵，听得侯景兵到，不敢抵抗，干脆大开城门，唯求自保。叛军入城，见钱粮就夺，见妇女就抢。这批衣冠豺狼，毁了吴郡，又扑向吴兴，继续滥施淫威，进行疯狂地洗劫。其后，叛军又从吴兴聚于会稽城外，会稽城中有精兵数万把守，粮食充足，武器精良，由于侯景恶名，江南人民对其恨之入骨，都决心舍命杀敌。守将东扬州刺史是梁简文帝的儿子萧大连，这个十足的酒囊饭袋，先前“勤王”之时，只去虚晃了一下，便逃回老窝享乐，这次一听侯景杀到，便吓得魂飞魄散，慌忙弃城逃遁。结果，侯景叛军不费吹灰之力，便占了会稽，叛军入城后，立即重施惯伎，夺完了金帛，又劫掠人口，其中有的遭杀戮取乐，有的被卖往北方。

三吴一带是豪门士族、公子王孙的聚集地区，他们世代享受朝廷俸禄，养成了锦衣玉食、骄奢淫逸、事事要人服侍的毛病，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梁朝时士大夫风气更丑，通行着剃面、搽粉、抹胭脂的劣习，而服装靴帽则讲究宽衣大带、高冠高底，衣服还必须用香料熏过才穿，连走几步路都得有人扶着才算体面，出门则必须乘车、坐轿，如果官员骑马，定会遭人弹劾。有一个叫王复的县官从没有骑过马，一次看见马在叫跳，吓得面如死灰，事后还对人说自己见到老虎，幸亏没有被吃掉。侍从告诉他那是马，他死也不信。这帮人一个个养得肉柔骨脆，体弱气虚，什么事也不会做，什么主意也拿不出来。侯景杀来，奴仆失散，没有人服侍了，他们逃又逃不动、守更不会守，甚至连饿了也不会生火做饭，天气冷了也不会加件衣服，即使叛军屠刀没有砍到脖子上，他们也难以幸存，一个个饿得鸠形鹄面，怀抱着罗绮、金玉，伏在床上等死。

第二年春，侯景叛军扑向广陵（今江苏省境内）。破城后，立即施行恐怖统治，他们将城中抓到的百姓8000名，不分老幼，一律埋半身入地，作为活靶，叛军骑马比射，以多杀为胜，制造了一起空前惨案。转眼间，广陵变成一座鬼城。侯景残虐人民，涂炭生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他的汉王朝颁布法律，禁止百姓两人以上交谈，“犯者刑及外族”，还在京城内放上几个大春碓和大剉碓，发现谁稍有反抗之意，立即把他扔进碓中，像舂米那样，把人舂成肉酱；或者塞入剉眼，像推磨一样，将人从脚磨起，磨成肉泥。他在施行这些酷刑的时候，还强迫民众前往观看，进行恐吓威慑。从此，“三吴”一带遭到彻底破坏。

乱世魔王便又率叛军沿江西进，梁天正元年（公元551年），叛军先后破江州（今九江市）、郢州（今武汉市），直逼荆州，梁武帝七子湘东王荆州刺史萧绎见机会到来，一面调集精兵，派大将王僧辩严阵以待；一面割让汉中之地给西魏，请求西魏不要从背后杀来。梁朝荆州军与叛军在江陵一战，叛军溃败，荆州军乘势迫击，收复了郢州、江州。侯景逃回建康，荆州军一路东下，又联络了高州太守陈霸先，大得其力，经姑熟（今安徽省涂县）大捷后，声势更加浩大，一直打到侯景巢穴。天正二年（公元552年），侯景见大势不妙，带了数十名心腹，匆忙乘船由扈读（今上海市）出海，试图北上。梁将羊侃之子羊鹞混入船中，指挥舵手悄悄将船驰回京口（今江苏省镇

江市），船至胡豆州（今江苏省镇江市北面），侯景发现航线不对，正准备跳水逃亡，羊鹜早有准备，举剑将侯景刺死，从而结束了乱世魔王罪恶的一生。侯景头颅被砍下送往荆州献功；尸身则运到建康，江南幸存的民众对侯景恨入骨髓，一见侯景尸体，争相割肉而食，等到焚骨扬灰后，还有人赶来把他的骨灰拿去泡酒喝，以解心头之恨。

可是，当他们食肉饮骨后猛然发现，王僧辩、陈霸先率领的“王师”同样不是东西，他们见建康城中已无珍宝可掠，就逢人便抓，抓住了就叫人拿钱赎身，不给钱就剥去衣裤，连衬衫也不留一件，然后再往死里打，打得百姓呼叫之声不绝，悲惨异常。就连王僧辩在石头城中也听得一清二楚，还误以为是侯景部下反攻，特地登城瞭望，发现是部下虐民，这才放心，也不加管束，任他们胡作非为，而自己则带亲信到台城宫中逐一搜寻，把一切值钱的东西全都抢走，最后放了一把火将宫殿烧毁。从此秦淮两岸极目之处再无烟火，建康成了彻里彻外的一座荒城。

荆州这边，萧绎虽已气势不凡，可皇位竞争并未了结。早在萧绎派王僧辩追击侯景、收复郢州时，就已将其皇兄萧纶队郢州驱赶到紧靠西魏的汉东一带，萧纶自称是讨伐侯景的中流盟主，其实也是个大草包，他暗中投靠北齐，被北齐封为梁王，便自以为北窜可以平安无事。谁知萧绎早已投靠西魏，成为西魏附庸，见萧纶北窜，便密派使臣与占据汉中的西魏大将杨忠接洽，以向西魏割让安陆以北的土地为条件，求西魏下手；杨忠旋即发兵擒杀萧纶，做成了这笔肮脏交易。

灭了萧纶以后，能有力量与萧绎争夺皇位的还有萧绎的八弟、兵据益梁13州的萧纪和已故昭明太子的第三子、据守襄阳的萧誉（音 chá）二人。

萧纪镇守益梁十六年，有精兵4万人，战马8000匹，根基厚实。他得知台城陷落、父兄被杀，心中不胜欣喜，当即就地称帝。接着准备发兵东下，东下前他取出历年搜刮来的金银，做成一斤重一个的金饼万枚、银饼5000只，让将士们观看，却不分赏部下，部下对此十分不满。

萧绎见萧纪离了老巢，马上派使臣向西魏请兵攻杀萧纪，西魏哪有不喜之理？见梁朝皇族兄弟相残，西魏自然有求必应，立即派大军袭取萧纪的大后方梁州，将梁州军击溃，当追兵在巫峡口发现了正仓惶逃命的萧纪时，当即蜂拥而上，萧纪见跑不脱了，便取出一袋金饼对追兵说：“我用这袋金饼雇你们，送我去见萧绎。”追兵答道：“我杀掉你，金饼难道会飞走不成！”话落刀下，将萧纪送上了西天。

萧誉和萧绎一样，也投靠西魏，他溺死了从侯景囚禁中逃出来投奔他的萧栋兄弟等三人。这时，他已知道萧绎得了建康，也知道萧纲被侯景所杀，仍于天正二年（公元552年）在江陵宣布自己继承梁朝帝位，改年承圣元年，他就是梁元帝。由于西魏统治者却更加喜欢萧誉这个傀儡，便派出重兵驻扎在襄阳，实行所谓的监护。由于襄阳、荆州相距只有500里，势同唇齿，萧绎对西魏的这一做法十分不安，梁元帝承圣三年（公元554年），西魏宇文泰派万纽于谨率5万人马配合萧誉攻打荆州。九月发兵，十月十一日到襄阳，十四日抵达荆州城外，万纽于谨先用精锐骑兵切断长江通道，阻止王僧辩回师救援，然后在荆州城外修筑长围，作长期战斗准备，再用精锐之师不断发起攻势。梁朝将士守到二十九日，因西门守军反水，开城迎敌，荆州城破。梁元帝对此感慨万端，他是个读书过万卷的人，不想仍然落个亡国下场，于是愤而纵火，将平日聚积的古今图书14万卷烧成灰烬，随后到西魏军前投

降，被押到萧警营前，萧警见自己最后一个竞争皇位的对手已捆绑在面前，哈哈大笑，得意之极，当下命人对这个叔父辈的骨肉之亲万般侮辱，然后押往西魏处理。西魏统治者由于萧绎即位后没有热情接待他的使臣宇文弼，却反而借机要求收回梁、益二州和襄阳等地，因此对萧绎怀恨在心，认为他不堪信用，下令将他处死了。

西魏杀了萧绎，封萧警为梁主，把空城荆州留给梁朝做都城，以荆州城周围 200 里作为梁的封地，命萧警居住东城，由西魏兵驻扎西城，行监坐守。同时，掠走城中府库中收藏的全部珍宝，又将王公百官以及数万居民分赏给手下将士作奴婢使用。而将未遭破坏的雍州收作西魏版图。这一下，萧警才发现自己引狼入室，上了大当。他身为皇帝，却没有人身自由，因此悔恨不已，却又无可奈何，不久就郁愤而死。

建康这边，王僧辩、陈霸先见萧绎遇害，便拥立萧绎的儿子萧方智登位，他就是梁敬帝。王僧辩一面操纵敬帝，一面联络北齐，屈从了北齐要求，换取在寒山堰一战中被北齐俘获的萧渊明为帝。此举引起了民心的普遍不满，陈霸先力加劝阻，终于在苦争无效后，暗地从京口调集 10 万兵马，分水陆两路袭取建康。京口来的水军先到，从北城越墙而入；王僧辩见形势有变，带着 10 余名亲信准备逃离，被水军堵在南门墙内。这时，陈霸先已经赶到，下令放火烧南门楼，王僧辩无路可逃，在城楼上质问陈霸先道：“我有什么过失，你竟如此下手？”陈霸先呵呵一笑，答道：“没想到你果然全无防备，这不是过失吗？”说完，命人杀上城楼，抓住王僧辩，并于当夜处斩。然后废了傀儡皇帝萧渊明，重新拥立敬帝萧方智。两年后的太平二年（公元 557 年），陈霸先又废去敬帝，自己坐了帝位，以自己的姓为国号，改元永定，梁朝从此宣告灭亡。

独辟蹊径的陶弘景

宋孝建三年（公元 456 年），在丹阳秣陵（今南京附近），我国古代科学家陶弘景出世了。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北魏屡犯宋朝疆土，战事不休；宋廷刘氏皇儿野心勃勃，觊觎皇位，喋血不止。

陶弘景一表人材，身高 7 尺 4 寸，神采奕奕，眉清目秀，细形长耳，生成一副仙人福相。他幼年就十分聪慧，10 岁那年得到一本葛洪著《神仙传》，手不释卷，日夜研读，小小年纪因此而立志要养身修道，做一个神游隐逸人。陶弘景不仅读书万余卷，而且精通琴棋书法，写得一手漂亮的草书和隶书。齐高帝任丞相时，便看中了他的才华，那时他还不到 20 岁，就在宫中为诸侯侍读，其荣华富贵可想而知。然而，陶弘景并不以此为荣，水明十年（公元 492 年），他毅然提出辞去侍读之职。陶弘景此举震惊了朝野，人们一直认为这是宋、齐以来从未有过的事。

陶弘景隐居于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县）的句曲山，“此山下是第八洞宫，名金坛华阳之天”，又名茅山。陶弘景在山中立馆，取馆名“华阳隐居”，教授弟子。除此，他便遍游名山，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与山水融为一体，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以至不能自己。他的这种志趣曾感动了东阳郡守沈约，沈约多次写信，邀请他去东阳，他索性修筑起三层楼房来，高出云端，与世人隔绝。此楼房第一层为宾客住处，第二层为弟子住宿用，他居顶层，仅与家僮为伴。他每日独游泉石，以听松风之声为乐趣，童年时

读《神仙传》飘然升天的感觉尽在其中，养生之志得以实现，不认识他的人硬把他当作神仙了。

以信佛崇佛倡佛为本的梁武帝，自然对他极有好感，即位前，早就与他有同游之谊。说起梁武帝的即位，陶弘景还真有神机妙算呢！陶弘景尤其通晓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当萧衍灭齐收复建康后，谁来即位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陶弘景便以命相扶乩测算，结果多处出现“梁”字，陶弘景速令弟子将此消息传送给萧衍，果然如他所算，萧衍即位，建立梁朝。从此，梁武帝对他倍加关爱，书信往还不断。大通初年（公元528年），陶弘景感念武帝厚爱，献给梁武帝宝刀两把，一把名为善胜，一把名为威胜。

陶弘景生性喜好著书立说，而且特别对奇异之事感兴趣，每每遇到疑惑难解的问题，他定要弄个水落石出才肯罢休。《诗经》中有“螟蛉有子，蜾蠃（音 gu lu）负之”的诗句，螟蛉指桑上的小青虫，蜾蠃是人们通常说的铁黑色的细腰蜂。古代传说，蜾蠃，纯雌无雄，必须捉螟蛉去做继子。它把小青虫捉去封在窠里，自己就在窠外日日夜夜敲打着，口中念念有词地祝祷：“像我！像我！”大约经过七七四十九天，螟蛉就变成了蜾蠃。陶弘景读《诗经》，对此深有疑惑，后来又有人请他解释这一传说。于是，他埋头查检各种书籍，那知说法全是一个样，疑团无法解开，陶弘景下决心要弄个明白，便走出书斋，来到田野，找到一窝蜾蠃。他轻轻挑开蜾蠃的窝，发现窝里确实有被蜾蠃衔来的螟蛉，奇怪地是还有一条条小肉虫，这小肉虫到底是什么呢？陶弘景边看边想，就在此时飞来几只蜾蠃，他忽然发现，这几只蜾蠃都是成双成对飞来的，留心一看，他们既有雌的，也有雄的，由此便解开了蜾蠃无雄的说法。陶弘景高兴异常，决心进一步观察螟蛉是不是蜾蠃之子？等啊等啊，他猛然看到一条小肉虫去咬一条螟蛉，不多一会儿，就被它吃掉了一半，陶弘景顿时明白，这小肉虫才是蜾蠃之子，蜾蠃捉螟蛉是给自己的儿子找来的食物。这个结论是否正确，还得看小肉虫是否能长成蜾蠃。过了两天，他又去看这窝蜾蠃，发现窝里的螟蛉都没有了，小肉虫变成了蛹。再过了两天，等他再去看时，蛹已化成小蜾蠃，而且成双成对地飞来飞去。陶弘景终于证实了“螟蛉义子”的误传，纠正了民间根据这一传说，将领来的儿子叫做“螟蛉子”的说法。后来，又有人证实，蜾蠃是用自己尾巴上神奇的毒针，向螟蛉的运动神经球一螫，使其麻痹为半死半活状态，再将它衔回窝中，供自己的幼虫当食物吃，正因为螟蛉处于半死半活状态，其肉新鲜而不腐烂，极富营养。可见，蜾蠃是既自私又残忍的杀手。这千古之谜也就解开了。

陶弘景正是以这种在科学上来不得半点虚假的严谨治学态度用在炼丹和冶炼技术方面，成功地研究出了一种“灌钢法”的技术，在当时，堪称为世界先进炼钢法。这种技术是把生铁和熟铁混合在一起，进行冶炼，炼出的钢叫“灌钢”。

他对祖国山川地理了如指掌，加上他那勇于探索的精神。他还大胆指出：大禹治水，并没有探测到黄河的源头究竟在哪里？他抱着“修道所需，非止史官是用”的目的，编著了《帝代年历》，又尝试制作了浑天仪，为我国天文历法作出了突出成就。

陶弘景潜心修道养生，他告别喧闹的都市，厌弃险恶的官场，隐居山林之中。遍游名山，寻访仙药，在医药本草研究领域造诣尤深。著有药书《神农本草经集注》、《药总诀》、《肘后百一方》等，特别对前人编写的《神

《神农本草经》中关于药物的分类法进行改进，创造了“诸病通用药”的分类法，为后人研究祖国医学的分类方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汉代，有人编写了一部《神农本草经》，该书共搜集了 365 味药，编者按药物的毒性将这些药分类为上、中、下三类。这里所说的“毒性”并不是指对人体有无毒害，而是指能否具有给人治病的作用。作者将只有强身、补养作用，而无治疗疾病的药物归为上品，即无毒类；将补养和治病两者兼有的归为中品，即次毒类；把主要能治疗疾病的归于下品，即毒性类。陶弘景对该书进行研究后，认为此种分类法有不少缺陷，有些药按此分类法无法归入这三类之中，即使归于中间某一类的，查找起来也相当困难。故而，陶弘景根据自汉以来，几百年里不少医学家新的发现和自己的积累，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 365 味药。并且改革了前书的分类法，即按照药物的天然属性进行分类，共分为七大类，即玉石（矿物药）、草木、虫鱼、果菜、米食、禽兽和有名未用等，而且注明每味药的药性和它能治疗哪些疾病。这样一来，只要知道药物属于哪种类别后，就能对症下药了。

另外，他还自己研究出一种药物分类法，即按病名将药物分类，如，治胃病便可查找到广藿香、陈皮、桔梗、紫苏、半夏、甘草、白芷、厚朴、大腹皮、白术、茯苓等药物。治高血压病便可查找到硃砂、清半夏、怀牛膝、生赭石等。这种分类法称为“诸病通用药”，它具有明了、方便的特点，大受医家欢迎，因此沿用了一千多年，为祖国药物分类的发展提供了可鉴之方。

陶弘景博学多才，不仅是位卓有成就的科学家，而且在文学上也颇有建树，他除了精通琴棋书画外，还创作了不少诗、词、赋、论，流传于世，其风格典雅华丽。

陶弘景为人圆通谦谨，观人视物，心如明镜，悟性甚高，常能一语中的。其著《梦记》记叙的是建武三年（公元 496 年），齐宣都王萧铿被明帝所害的秘闻异事。作者写萧铿被害当夜，托梦与自己告别，于是陶弘景得以周游阴曹地府，访察幽冥之事，所闻尽是秘闻异事，由陶弘景披露于世。

陶弘景虽大半生隐居山中，以教授弟子为业。然而凭着他和梁武帝的交谊以及他聪慧机谨的过人才干和对天文、地理、医药、冶炼、文学、书法、命相、经文等无不通晓的渊博学识，朝廷每遇重大事情，便要请教于他，因而又有“山中宰相”之称。

陶弘景逝世于梁大同二年（公元 536 年），享年 81 岁，辞世时仍筋骨活动自如，童颜鹤发如在世一般。梁武帝令人监护丧事，并追认他为中散大夫，给他的是“贞白先生”的谥号。

暴君高洋

建立北齐政权的齐文宣帝高洋，生得大颊重踝、黑肤泛鳞，绝无一点儿尊者模样。

虽说其貌不扬，可执政治国，倒还真有手段。当他刚坐上皇帝宝座，万机待理之时，西魏宇文泰就带兵前来讨伐，魏军从恒农渡过黄河，暂屯建州（今山西绛县）一线，时刻都有逼进邺城的可能。

高洋闻报，却十分泰然，他一眼便看透了宇文泰的心思：这次发兵，不在城池得失，全为了摸清新君底细。高洋一时还无暇与宇文泰兵戈相见，只想示以颜色，让他退回巢穴就算了。于是也不声张，迅速调齐六州鲜卑将士，

在晋阳东演兵，只见他身着成装，威风凛凛指挥大军攻杀搏击，闹得沸沸扬扬。西魏哨马探得演习情景，禀报宇文泰，说齐军军容严整，极有章法，高洋用兵，不亚高欢。宇文泰顿时明白高洋是个不好对付的角色，长叹一声：“高欢看来没有死啊！”当即下令撤兵，经蒲坂退回关中去了。

慑服了宇文泰后，高洋料定西魏近期不会再兴兵来挑衅了，便放心治理国内事务。他重用杨愔（音 y n），倒不全因为此人是他内兄，更重要的是为向天下人表明齐帝对汉士族的信任与尊重，以固结民心。更何况杨愔确实有才，可堪利用，果然一经任用，便为他拟订齐律，并按他的意思革除了前朝广设官吏的弊病，抑制了贵族豪勋不断膨胀的物欲；同时又将百姓按上中下分等，让上等富户出钱，下等贫户出力，使赋役负担均衡，从而大大稳定了国内局势。

高洋当然不会疏于用武，为免除日后南征西讨的后顾之忧，齐军挥戈北指，以健斗的鲜卑人为宿卫军，号称“百保鲜卑”，又选勇武的汉人充实边防、名为“勇士”，于魏正光三年（公元 522 年），出击库莫奚国，一举截获牲畜 10 万余头；次年又师出卢龙塞，掩袭契丹，俘虏 10 万及牲畜几百万头之多，满载而归；接着，再征柔然残部，又俘获 3 万余人，掠得牛羊 7 万头。此后，还破山胡、拓淮南，威及长江北岸，从无败绩。

北齐国力因此大大上升，天保六年（公元 555 年），高洋下令征发 180 万民工修筑长城，从夏口（今北京昌平县居庸关）到平城 900 余里，限一年完工；次年又延至东海，共长 3000 余里，而且每 10 里便设置一座戍所，在战略要隘还新建 25 个州镇，以稳定边防。像这样规模的战守设施，对北齐边境的安宁自然十分有利。

高洋在位短短几年，北齐国力堪称鼎盛，有“王四渎之三，统九州之五”的美誉，成为有 300 万户共 2 000 万人口的强大帝国，占据着今黄河流域下游冀、鲁、晋、豫及苏北、皖北的广阔平原地区。中原富庶之地、米粮之仓已尽在其中。五谷丰，又带动了百业兴，特别是制盐、冶铁、烧陶、造瓷，达到很高水平，使齐国成为与西魏、梁朝鼎足而三的大国中最富实力的一家。高洋治国用兵之功，不可谓不卓著。

但高洋决不是个圣明贤君，恰恰相反，他是一个荒淫暴戾的人间恶魔。

为了一人的享乐，他可以征发 30 万工匠到邺下大兴宫室，修筑和改建成长达 27 丈的金凤、圣应、崇光三大楼台和一座极其奢华的游豫园，此外还建起了大庄严寺等一批建筑物，真不知耗费了多少民财。从此，他就沉缅其中，肆行淫暴，干了数不清的令人发指的罪孽。

高洋形貌丑陋，皇后李氏却是绝色美人，宫中还有后妃如云，但这些并不能使荒淫皇帝满足，又看中了他的内姐，于是把这个有夫之妇一次次召入宫中，干些苟且之事，还准备将她纳为昭仪。内姐的夫君是魏乐安王元昂，不知高洋是嫌他碍眼还是讨厌元氏是旧君后裔，一句圣谕将他宣到宫中，用箭射了 100 多下，射得他血流满地而亡，还当场抱住内姐，让宦官剥下她的衣裙施暴。直到皇后李氏闻讯赶来，哭天喊地要让位给阿姐，以致惊动太后，这才得以制止。

平日在宫中，总是裙钗环立，高洋或是饮酒击鼓、或是讴歌舞蹈，经常通宵达旦、日以继夜地胡混乱闹。他兴致一来，就越发出格，将衣服脱个精光，脸上身上涂脂抹粉，散乱头发，拔刀张弓，狂欢不止。这还不够，他又专门派人到各处征集淫妇，令她们脱光衣裤，将文武百官叫来，整天站在那

里观看，谁若稍不从命，便严加惩罚。高洋为寻刺激，又命人砍来荆棘，扎成草马，逼迫淫妇们骑在上面，拖来拖去，看到她们被刺得鲜血洒地的痛苦模样，便满意地哈哈大笑，以此为乐。

高洋也念佛，还常住甘露寺中，而他一去往往关起寺门，在里面不知干些什么。有次他竟忽发“慈悲”，指令宦官去寻来2600个寡妇，由他主持配给他部下军士，寡妇数目还缺三成，宦官就抓来有夫之妇冒充，弄得民怨沸腾。当他心血来潮时，不免要骑射演武，即使是这类活动，也不忘逼迫京城妇女悉数前往观看，谁若不到，就军法从事，而且一次折腾就长达七天。

有一次，他出游市井，见到一个女子，便上前问道：“你觉得当今天子为人如何？”那女子说：“痴痴颠颠，哪像天子！”他听完这话，当即将那女子杀了解恨。而在宫中，凡遇到他不顺眼的人，一律杀害，然后支解躯体，再用火焚掉，或者投入河中冲走，不留尸骸，真是残忍之极。

在后宫嫔妃中，有位他十分宠爱的嫔妃薛氏。一次高洋正与薛氏欢爱，忽然想到她是曾与人私通后才入宫的，心中马上泛起毒意，顺手从腰间抽出佩刀，将薛氏头颅割下来藏在怀中，便去东山赴宴，乘酒宴正酣，忽将头颅取出，放在桌上，把群臣吓得丧魂失胆。回宫后，又将薛氏髀骨取出，做成琵琶弹奏，还边弹边流泪道：“佳人难再得，太可惜了！”

高洋更有桩坏脾气，凡盛夏酷暑，便喜欢脱光衣服到烈日下暴晒；遇寒冬腊月，则偏爱赤膊在雪地里狂奔。外出巡游，不喜欢用车马，却要宦官一直把他背着，处处表现出一种变态的疯狂。

对于臣僚，高洋尤其喜怒无常。不知怎地，忽然看不惯大司农穆子容了，就命令穆某脱去衣裤伏在地上，他则取箭来射，结果没有射中，于是生气地操起木棒，朝穆子容下身狠命一戳，这一戳径直戳到下腹之内，大司农当场一命呜呼。即便对他所倚重的大臣杨愔，兴发时也会毫不顾惜地加以摧残。杨愔肥胖，高洋给他取名杨大肚，还用马鞭抽他背脊，抽得杨愔袍褂浸满鲜血，接着又用小刀扎进杨愔腹中，宦官崔季舒在一旁看不过，故意用俳优的语言，像做戏一般地边说“老小公子恶戏？”乘机将刀掣出。这样整治以后，高洋还不甘心歇息，又叫人将杨愔活活装进棺材，钉上铁钉，用车运了出去，算作送丧游戏。幸好杨愔命大，被人救起，才暂免一死。

高洋的残忍暴戾的确罄竹难书，他忽然想到高欢生前曾经宠幸过彭城王高湊的母亲尔朱氏，而且对她的敬重之情一度超过皇后匹娄氏，心里便老大地不自在，于是立即赶到彭城王府，叫出尔朱氏责问道：“你还记得受宠时差点夺了皇后之位的事吗？”不等尔朱氏回话，便举刀将她杀死。接着又赶到被他发配充军北地而死的崔暹家，逼问崔暹的妻子李氏道：“你还想念不想念崔暹呀？”李氏回答说：“我们结发夫妻，感情至深，实在很想念他。”高洋听了道：“如果想他，你自己去看嘛！”话音未落，又是手起一刀，将李氏杀死，割下头来扔到墙外。

高洋杀人，有时经常半点情由都没有。有一次在晋阳时，他手握长矛，正找地方刺，忽见都督尉子耀站在一旁，便顺手朝他戳去，尉子耀当场被刺死。又一次，在太光殿上，莫名其妙地召来都督穆嵩，然后下令将他按下锯成两段。还有一次，在开府暴显家，只因为喊得出当时在场的都督韩哲之名，便随口一呼，当众把他叫了出来，用刀砍成几段完事。

高洋造下种种罪孽，典狱丞李典实在看不下去，便舍命仗义直谏，当着高洋的面指责他比桀纣还不如，要他改正。高洋哪肯听谏，狂喊一声：“将

李典绑起来，沉入水中！”李典宁死个屈，过了好一阵，高洋又命人将他捞起来再问，李典仍然矢志不移。高洋无奈，再次命人将他沉入水中，就这样沉了捞起再问，问了再沉，就是不能折服李典。高洋忽将口气一变，狂笑道：“天下真有如此的痴人，我今天才相信古时候确实有龙逢和比干了。”说完，竟然下令给李典松绑，将他放了。众臣正自诧异，谁知转眼间高洋又召他上朝，装出从谏如流的样子，表彰李典忠心，可还没等李典开口谢恩，就又下令将他拖出去腰斩了。

高洋人面兽心，罪孽深重，人神共谴，很快遭到报应，于天保十年（公元559年），在他31岁之时，身患怪症，不能进食，只能靠饮酒维持残喘，最后酒精中毒，在晋阳宫德阳堂暴亡，结束了他极其野蛮罪恶的生命。

齐高竟腐败，王朝殁

高洋死后，他的儿子高殷继位。高洋的弟弟常山王高演、长广王高湛分别做了太师和大司马，掌握朝廷实权，他们在鲜卑勋贵平秦王高归彦和贺拔仁、斛律光的拥护和支持下，奉行了一条反汉化的政策，寻衅杀了汉士族的大臣杨愔、燕子献和宋钦道，揭开了新一轮的宫闱斗争大幕，由太皇太后匹娄氏出面，宣布废掉高殷帝位，改封为济南王，逐出王宫。不到一年时间，又把他勒杀致死，他死时年仅17岁。

高殷被杀，关键是因为他是李太后所生，而李太后是汉士族赵郡李氏的千金，代表的是主张汉化这一派的利益。匹娄氏所代表的反汉化这一派，最担心的就是高殷很可能在羽翼丰满后成为她们的政敌。匹娄氏恶狠狠地说：“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嫗斟酌！”

高演夺得帝位以后，十分坚定地贯彻鲜卑化的路线。早在他是常山王的时候，关系密切的朋友就大多是鲜卑勋贵，只有前秦丞相王猛的六世孙王晞是汉士族。这次坐上帝位，明知王晞才华出众，又对他忠心，却害怕犯忌而不敢重用，因为一旦鲜卑勋贵认为他接近汉士族大家，就会担心他倾向汉化而产生反感，那他的下场也就很不妙了。

政变的成功，使心情一度压抑的鲜卑勋贵眉飞色舞，他们势焰大炽，明目张胆地举起打击汉士族的旗号，汉族地主在北齐政权中最后一点地位也丧失殆尽，即便像杨愔那样在高洋执政时还能勉强被利用一下的机会也不复存在了。

北齐皇建二年（公元561年），高演在位15个月后，就在晋阳宫暴疾而亡，谥为孝昭帝，他死时也只27岁。

继承高演大统的是他的弟弟高湛，他就是历史上称为齐武成帝的暴君。高湛反汉化的态度比高演更坚决，因此，鲜卑勋贵的势力也更强大。高湛和他的皇兄齐文宣帝高洋一样，残虐淫乱之极，做了许多不光彩的事，特别是匹娄氏死后，他更是肆行无忌。心亏生暗鬼，一会儿是太原忽降血雨，一会儿是晋阳出现鬼兵；一会儿又看到扫帚星落于宫殿，再一会儿又在后园万寿堂前的山穴中发现“两齿绝白，长出于唇”的巨神显身，弄得惊恐万状、六宫惶惶，于是修庙、祈祷，大量耗费民财。而当时国库已经空虚，入不敷出，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剧搜刮，闹得民众怨苦不已。政治上的不景气，加上神情上的恐惧感，高湛觉得这皇帝当不下去了，为求解脱，更怕他死后帝位被诸王夺去，便于北齐河清四年（公元565年），在他坐位三年后，将皇位禅让

给他的长子高纬，自己当起太上皇来。

高湛当太上皇，监护高纬治国，而凡事还是要他决断。有一次，命人从驿站送诏书到邺都，此人刚出晋阳城，就感到有人骑马跟在后面，而细看又看不到人影，等传诏人到邺都时，诏书内容早已在那里传开了。这桩怪事报到高湛那里，高湛忧虑不堪，认定神鬼要盯住他了，害怕神谴的心情始终不得改善，终于在北齐天统四年（公元 568 年）死于邺宫乾寿堂。他总共活了 32 岁。

高纬亲政以后，这个仪容美丽的皇帝，倒是继承了乃父乃伯的浮暴脾性，而且大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势头，极其奢侈昏暴，民众当然也就更加穷困，以致于无法生活下去了。

在高纬政权里，国柄朝权都掌握在鲜卑勋贵手中，汉士族地主最多只能在政权机关领个办事的差使。对此，士族们当然不甘心，汉族地主冯子琮想了一个办法，通过他和高纬弟弟高俨的私交，影响高俨，鼓励他争夺皇位，然后利用高俨的力量，来推翻鲜卑勋贵的统治。高俨果然动了心，起兵杀了当时朝中亲幸贵重的鲜卑勋贵首领和士开，不料这计谋被高纬察觉，迅速调集斛律光的军队，抵挡高俨，并杀掉冯子琮，瓦解了汉士族的这次反扑。

和士开的死，迫使高纬考虑到应该缓和一下与汉人的矛盾，以减轻汉士族地主对朝廷的不满。于是通过他的乳母陆令萱和陆令萱的儿子穆提婆的关系，起用汉人祖珽为宰相、尚书右仆射，接着又有汉士族地主中的薛道衡、颜之推等人也受到任用，分掌机要。祖珽的起用，使汉士族地主们颇觉振奋，称赞他为“衣冠宰相”，要求他劝高纬杀掉鲜卑勋贵斛律光，并设法驱逐胡人在朝中的政治力量。祖珽也想乘机扩大朝廷中的汉族势力，又建议高纬把指挥六镇军人的大权从京畿大都督府改授为宰相掌握，实际上就是从鲜卑勋贵手中夺取军权。结果由于穆提婆、高阿那肱、韩长鸾等鲜卑勋贵的排挤，祖珽反而权柄尽失。穆提婆从此实权紧握，他吸取了起用祖珽的教训，公开宣言要杀尽“汉儿文官”，结果一大批汉族地主权要，如崔季舒、张雕虎、封孝琰、刘逖、裴泽、郭遵等，都在“汉狗，大不可耐，唯须杀却”的狂骂声中，被斩于殿庭。汉官被杀，汉官家属又被发配到北边，妇女罚作官家奴婢，幼男一律阉割，财产全部没收。朝廷官员中形成了清一色鲜卑人的局面，在鲜卑勋贵穆提婆掌权的专制统治下，政治极度腐败；赋役更加繁重，国库已经空竭，卖官鬻爵蔚然成风，富商大贾竞相贪纵，整个北齐成了官由财进，狱以贿成，乱政害人、民不聊生的黑暗世界。

高纬在重重压力之下，仿照他父亲高湛的样子，将皇位义禅让给 8 岁的儿子高恒。幼帝高恒除了因为年纪太小还不会淫秽以外，干别的坏事可不比他父辈、祖辈逊色，他自信而骄狂，喜欢弹着胡琵琶唱无愁曲，还要几百人陪他和歌，因此人们背地里都称他为“无愁天子”。宫中的奴婢、阉宦，以及善于钻营的商贾、胡户、歌舞伎、见鬼人，只要讨他喜欢，就可以获得封赏，什么王爷、开府、仪同、领军等等职要，以及成千上万的金钱，随便乱给，反正在纸上批个“依”字就行了，至于宫中奴婢当郎君的，宫女宝衣玉食的则不计其数，完全乱了章法。他还认为皇帝当然要奢丽，便下令广造宫苑，建偃武修文台、为嫔嫱起镜殿、宝殿、玳瑁殿，又造晋阳 12 院，壮丽胜过邺宫。他还不知佛教是怎么回事，也学着乃祖的样子，命人在晋阳西山凿大佛像，供奉万盆灯油，以致光照宫内。接着又要修大宝林寺，要求运石填泉，穷极工巧，费用达到几亿，累死的人、畜数也数不清。他的御马也与众

不同，马厩要铺上地毯，食物得十多种，马需要交配，还得给操办婚礼，并由他亲自主持。宫中的狗、马、鹰、鸡等禽畜，还各有官职，和朝中百官相仿。

这还不够，他又别出心裁取乐，下令在华林园立了一个“贫穷村舍”，自己穿上破衣烂裤，打扮成乞丐，做着讨饭的游戏。玩厌了，又就地改建为集市，自己装成穷人，讨价还价地做买卖。忽然又发现打仗更富有刺激，于是叫人再按西北风格造起城池，令侍从穿上黑衣装成羌兵，敲着战鼓攻打城池，他自己则带领众将开城迎敌，真弓实箭地朝装扮起来的羌兵射去，射死了人不仅不在乎，还觉得勇武过人。他不断冒出怪念头，有一次半夜里醒了，命人马上给他找蝎子，侍从以为要鞋，拿过来后却遭到一顿毒打，只好连夜去挑，到天亮，竟弄来三升，他这才罢休。像这样的事情，几乎隔几天就有一次，都是十万火急、朝征夕办，违者论罪，至于花多少钱，会不会被人敲诈，他恐怕连想都没有想过。他还喜欢杀人，杀了人竟要把脸皮剥下来，看里面是什么，这个8岁的皇帝从无知、无聊到无恶不作。

北齐几代君王的腐败不堪，民心丧尽，给了北周武帝宇文邕极好的机会，他就在这样的有利的形势下，南连陈朝、北结突厥，向北齐大举进攻，真如风卷残云，势如破竹，在北周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兵临邺下，灭了这个腐败的王朝，活捉了出逃的高纬、高恒父子，统一了黄河流域。

南天一柱洗夫人

梁朝末年，富饶的江南地区遭到空前浩劫，社会动荡、人心不安。这时，一部分公侯士人便举家、甚至阖族南迁，躲避祸乱。他们带去了当时先进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在温暖肥沃的岭南大地落地生根，并与土著居民渐多往来，在这一汉、“蛮”逐步同化的过程中，闽江和珠江流域都得到程度不等的开发，同时南朝政权也因祸得福，在当地部落的支持和帮助下，稳定政局，减弱了动乱造成的破坏力。其中，陈霸先得益最多，使得作为南朝弱国的陈氏政权维持了下来，经济上也获得了较快的恢复。而在这一点上功劳最人的当推女中英杰洗夫人，她确实称得上是南天一柱。

早在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当时北方的魏国灭了北燕，北燕首领冯弘逃到高丽（今朝鲜），又派遣他的族人冯业，带领300随从经海路投奔南朝宋文帝，后来在新会（今广东新会市）定居下来，宋文帝正想开发南疆，于是任命冯业世代为罗州（今广东化县）刺史，可是当地土著并不接受冯业管辖，各位酋长仍然自行其令。冯业因为不是当地人，手下的力量也很有限，只能空发号令，无法施政。

经过齐、梁两朝若干代人以后，冯氏后人与土著居民渐渐融合，到了梁朝末年，冯业的四世孙冯宝继承了祖辈的刺史头衔，并第一次被朝廷任命为高凉刺史，在高凉郡（今广东阳江县），他与百粤之一的洗氏部落酋长之女结亲，这位女子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洗夫人。

洗氏部落，世代居住在高凉郡地方，从秦汉以来，繁衍壮大，到梁末时已经发展成拥有十万多户的大部落了。部落中的人，一贯只听酋长命令，从来不受朝廷的管辖和驱使。

洗夫人自小就机敏过人，而且深明大义。父母爱她如掌上明珠，对她的教诲自然也就格外用心，还常常用部落中的事情考她，她都能对答如流。日

积月累，随着年龄的增长，竟也能帮助父亲处理公众事务，简直像个小酋长一样。说来也怪，到出嫁前，她已经能够把部落中的军勇们调抚得言听计从，义懂得行军作战的奥妙，这支部落武装在她的训练下，英勇善战，以致百粤各部酋长都甘愿对她俯首听命。

她以信立本，以善结缘，凡事秉公而断。以前，百粤各部落之间，常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相互攻击，造成双方的无谓伤亡。洗夫人为此没有少劝阻，而她的哥哥洗挺，仗着自己是酋长的儿子，又有南梁州刺史官衔，本族又兵强马壮，哪里把别的部落放在眼里，于是养成了好侵掠袭扰的坏习性。为此，岭南周围州郡的老百姓，吃了不少亏，对他颇多怨恨。洗夫人为此也十分不满，她多次用南朝几代皇帝亡国的故事劝哥哥三思，终于使洗挺明白了信义为立身之本的道理，消弥了怨隙，以致海南儋耳 1000 多位洞主纷纷前来归附，从而扩大了洗氏的声威和力量。

冯宝与洗夫人的婚姻，是冯宝之父罗州刺史冯融作成的。冯融慧眼独具，发现洗夫人德才非凡，亲自为儿子上洗酋长家求亲，洗家也愿意向中原上族靠拢，十分支持。从此冯、洗两姓成了亲戚，互相关照，高凉郡也因此更加兴旺。洗夫人出嫁后，一方面帮助夫君管理政务，一方面诫约娘家人要遵守国家法度。不管是冯姓还是洗姓，也个管是首领还是平民，无论谁犯了王法，都不轻饶，因此深得人心，没有人敢斗胆试法，并从此改变了长期以来百粤部落不服朝廷管辖的惯例，使皇朝政令得以通行。

侯景乱梁，广州都督萧勃接到建康台城发来的“勤王”文书，就地征集兵马，准备赴援。这时，高州刺史李迁仕据守大皋口，以勤王的名义召冯宝率兵参加援救，实际上是想借机调用高凉地方武装加强自己实力。冯宝接到文书，准备前往听命，洗夫人看着李迁仕为人奸诈，猜测他必有阴谋，日后可能背叛朝廷，因此劝阻丈夫暂不行动，以便观察。冯宝于是推托有病，拖了下来。过了几天，李迁仕果然背反，冯宝闻讯，暗暗庆幸，从此更加尊重洗夫人的意见。

李迁仕参与谋反后，遣他的主帅杜平虏带兵占据赣石（今江西赣江），冯宝忙把消息告诉洗夫人，洗夫人分析道：“杜平虏到赣石，是李迁仕让他据守要道，以便抵抗朝廷的征伐，看来一时回不了州城。这样，州城这边一定比较空虚，我们应该乘虚而入，夺下州城，灭了这个叛贼。如今我有一计，你马上派人给李迁仕送封信去，就说你病体未愈，还不能应召赴援，心里很急，暂时先派愚妻前来参见大人。这样，他一定不会戒备，我带上千把精干兵勇，装扮成慰劳叛军的样子，挑着沉沉的担子，一路说说笑笑，只要混到城内栅下，破贼的目的就可以实现了。”冯宝一听，鼓掌叫道：“妙计！真是妙计！”可转念一想，又担心妻子万一有什么闪失那可不得了，因此犹豫难决。洗夫人劝丈夫道：“国事为重，不可迟疑，否则坐失良机，悔之晚矣！”并告诉丈夫：“此行万无一失，放心好了。”冯宝深知洗夫人智勇兼备，只嘱咐多加小心，就同意了。

洗夫人准备妥当，十分顺利地到达高州城下，向城上大喊道：“高凉刺史有书来投！”城上守军见洗夫人一行的样子，毫无怀疑，接过信送了进去。李迁仕见信，满心欢喜，忙说：“快请进城！”城门洞开，洗夫人带着兵勇大大方方来到栅前，歇下担子。原来担中并非慰劳物品，装的全是衣甲兵仗，只听洗夫人一声暗号，众兵勇迅即披挂持械攻入州署，还不等署中守将明白过来，洗夫人已身先士卒，杀到堂上。李迁仕见状不妙，仓皇越墙脱逃，洗

夫人一举占据州城。

杜平虏在赣石，这时也遇到长城侯陈霸先的攻袭，抵挡不住，正准备回撤。恰好洗夫人率兵来到，截住了杜平虏的退路，杜某慌忙之际，丢下兵众，孤零零地从小路窜逃去了。洗夫人与陈霸先在赣石会师后，陈霸先要犒劳洗氏将士，洗夫人力辞不受。只说金帛当用于救国，陈霸先为此颇受感动。洗夫人就这样未丧一兵一卒，凯旋而归。

洗夫人亲眼见到陈霸先的军容军威，极其佩服，回来对冯宝细说了前后经历见闻，并劝丈夫道：“陈都督极得众心，必能平贼息叛，且能乘时立业，前途不可限量。夫君应厚厚资助他成事才是。”

后来，冯宝病逝，岭南一带又发生大乱，洗夫人出面安定各部，百粤州郡方才归于平静。这期间，陈霸先果然如洗夫人所料，抖擞威风，巧借时机，最后灭梁建陈，成了一代人君。

陈武帝永定二年（公元558年），即陈朝开国后的次年。冯宝之子冯仆9岁，洗夫人让他率领百粤各部首领到丹阳朝拜陈武帝。陈霸先见冯仆一表人才，并得知洗夫人就是他母亲，非常高兴。陈武帝一为表彰功臣，二为安定百粤，于是封冯仆为阳春郡守。

冯仆在阳春上任不久，广州刺史欧阳纥谋反朝廷，见冯仆年幼，想诱使他胁从叛乱，就派遣使臣召冯仆去南海。冯仆见召，急派亲信回高凉报告洗夫人。洗夫人深有感慨道：“我贞于国，矢志不移，如今已是两代，怎能有负朝廷？”于是，发兵攻打欧阳纥，欧阳纥军马抵挡不住，四下溃散，叛乱宣告瓦解。陈武帝闻奏，论功封赏，赐冯仆为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将，转任石龙大守。还特别下诏，命使臣持节南下，册封洗夫人为高凉郡太夫人，赏赐当时专为刺史制定的仪仗一套。洗夫人则以扶南（今广西扶绥县）特产犀杖献陈武帝。由此可见，陈武帝对这位女中英杰的尊重。

洗夫人寿数绵长，威如山重，陈朝灭亡后，岭南各部仍唯夫人之命是听，尊为圣母。完成中国统一大业的隋文帝派遣总管韦洸安抚岭南，不敢妄进，直到晋王杨广拿着陈后主的降表和命百粤归化的书信，以及当年洗夫人献给陈武帝而一直保存在宫中的犀杖作为凭证，洗夫人这才知道世事已变，于是召集各部首领几千人，痛哭了一整天，然后派遣孙子冯魂到广州去迎接韦洸，岭南百粤这才归顺隋朝，隋文帝则赐冯魂仪同三司，册封洗夫人为守康郡夫人。

不久，王仲宣在番禺造反，兵围韦洸，叛军屯扎在衡岭。洗夫人又派孙子冯暄去援救韦洸。由于冯暄与叛军将领陈佛智私交很好，故意拖延时间，迟迟不赴援地。洗夫人闻讯大怒，下令将冯暄抓进大牢，另派孙子冯盎为讨叛主帅，冯盎立即发兵，斩了陈佛智，继续进兵，在南海与朝廷军会师，平息了叛乱。为确保朝廷号令的执行，洗夫人还亲自出马，护卫隋朝使臣巡抚岭南各州，百粤各部首领闻讯便都来参谒，这样，隋朝在岭南的统治才得以落实。

隋文帝为褒奖洗夫人的功绩，特任冯盎为高州刺史，又将冯暄从狱中放出，任为罗州刺史，追封冯宝为谯国公、广州总管。同时将六州兵马印信送到洗夫人幕府，许她若遇紧急机要情形，可以便宜行事。此外，隋文帝还专为洗夫人颁发褒美敕书，皇后则将自己的首饰和一套宴会礼服赠送给她。洗夫人将所有赏赐物品装在一个金筐内，连同梁朝、陈朝所得的赏赐物品，收藏起来。每年到百粤各部大聚会时，才拿出来一一摆在庭院中让人观看，用

以训示后代道：“你们人人都应该为国尽心，我经过梁、陈、隋三朝，靠的是一片对国家的忠心，这些荣誉就是对国家尽忠所获得的报答。”

当时番州总管赵讷为人贪虐，执法偏私，导致徕、獠各部纷纷背叛朝廷，逃亡外乡。洗夫人得知此事后，派长史张融向隋文帝揭露赵讷罪状，并建议安抚逃亡者。隋文帝立即法办了赵讷，并委派洗夫人召慰受害百姓。洗夫人不因年高、不辞劳苦，亲自到十多座州郡，宣谕皇上旨意，让逃亡者回归故土，为百粤民众又做了一件大好事。隋文帝将临振县汤沐邑 1500 户赏赐洗夫人，并赐冯仆为崖州总管、平原郡公。

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 601 年），洗夫人仙逝，谥为诚敬夫人。洗夫人一生历经三朝，始终为国家统一，民心安定和民族和睦鞠躬尽瘁，确实堪称为南天一柱。

北周灭佛

大统十七年（公元 551 年），西魏文帝元宝炬病死，他的儿子元钦继位。这时，以尚书元烈为首的元氏宗室在元钦的同情下阴谋发动政变，意在从宇文泰手中夺取国家权力。由于阴谋泄露，政变流产，元烈被杀。宇文泰对元钦的态度十分不满，按捺了三年之后，终于将他废杀了，另立元钦的弟弟元廓为帝，这就是西魏恭帝。

恭帝三年（即公元 556 年），宇文泰出巡到北黄河（今内蒙古后套乌加河）时染病不起，在返回长安的路途中，死于一个叫云阳宫（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的地方。

宇文泰在世时，因儿子们年幼，凡有重任往往交由两个侄子担任，这两个侄子就是宇文导和宇文护。宇文导早死，得力的便只剩宇文护一人，又有大将于谨支持。因此，宇文泰临终前不能不把掌国大权委托给宇文护。宇文护没有宇文泰耐心，他觉得西魏元氏已经是多余的了，决定灭掉西魏，于是在东魏武定十五年（公元 557 年），推宇文泰的嫡子宇文觉取代魏恭帝元廓，改国号为周，称为周天王，这就是历史上的北周皇帝闵帝。

北周建立，宇文护大权独揽，大将赵贵、独孤信不服，商量要杀掉宇文护，宇文护察觉不妙，抢先下手，杀了赵贵，逼迫独孤信自杀，权威也因此一天比一天大，他又开始对周天王不满意了，同年，废杀了宇文觉，另立宇文泰的庶子宇文毓为天王，这就是周明帝。三年后，将天王称号改称为帝，刚刚称皇帝的宇文毓又被宇文护看不顺眼了，于是惨遭毒杀。

北周的第三任君主当然也还是宇文护选中的，他叫宇文邕，是宇文泰的四太子，历史上称为北周武帝。周武帝有两个哥哥的前车之鉴，对宇文护谨慎有加，他深知宇文护是北周政权的主宰，自己只能内藏机锋，而在表面上则处处遵宇文护而行，如履薄冰地熬过了 12 个春秋，未曾得罪。并在暗中逐步培养起自己的实力。精明强干的宇文邕，早对宇文护纵子贪残、仗势凌人的霸道作风深为反感，更不甘心长期充当他的傀儡，他要寻找机会爆发。北周建德元年（公元 572 年）三月，前后垄断朝政 15 载的宇文护，在疏于防范的情况下进宫朝见皇太后，被周武帝逮着机会，将他杀于宫中，夺回了皇帝实权。从此，周武帝励精图治实行改革，推行了一系列强国措施，他自己也成为北周最有作为的皇帝。

政由己出的周武帝首先想到的是民为邦本，想强国就得富民，要富民就

要先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由于他敢于解脱鲜卑旧俗，吸收了先进的汉文化的养分，所以很懂得垂范万民的作用，他决心从这里起步。平时，他和普通百姓一样，身着麻布衣衫，吃着五谷菜蔬，宫中不用金银珠宝装饰，一切都以朴素为上。他还要求官员廉政爱民，严禁侵扰百姓。北周建德六年（公元577年），他还颁行了《刑书要制》，立法规定凡持凶器合群劫抢，价值达布帛一匹以上者杀；不持凶器合群劫抢，价值达布帛5匹以上者也杀；官员监守自盗价值达布帛20匹以上者杀；官员诈取财物，价值达布帛30匹以上者也杀；正长隐瞒5户及10丁以上，或者土地3顷以上者，也都要杀。严厉的措施，有力打击了腐败风习，使社会风气明显变好。

周武帝很有眼光，他早就反对把战俘和抢来的百姓当奴隶使用，主张释放他们。建德二年（公元573年），他命令凡是在西魏攻下梁朝江陵时被俘兵士和被抢百姓成为官府奴隶的，一律释放为民。灭齐后，他又下诏将黄河以南各州郡被齐国掳掠为奴的人，不问官私，全数放免为民。接着，放免范围进一步扩大，对历来鲜卑人作战虏掠到的或是分赏而得的奴隶，统统加以释放。于是，这一鲜卑野蛮统治的标志不复存在，最后直发展到在北周统治范围内取消奴隶制。这件事，令奴隶欢欣鼓舞，他们成为北周最坚定的拥护者。

周武帝最大胆的改革措施要数禁灭佛教这件事了。当时佛教在中国已十分流行，光北周就有上万座寺庙，100多万僧尼。寺庙占有大量良田，而且免征税收；僧尼整天参佛念经，免服劳役、兵役。周武帝想：像这样大量的人力、财力，就在青灯古佛前白白损耗了，对国家没有一点好处，真是可惜。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想法没有错，专门从各地找来一些有名气的和尚，让他们讲信佛的好处。和尚们不知周武帝的用意，一个劲地吹嘘信佛可以得到菩萨保佑，福寿绵长；而且还可以用今生修来生，赎罪消灾，将来必有好报，甚至可以上天成仙，永无人间烦恼。就这样，吹得天花乱坠，好像亲身经历过一样。周武帝越听越不是味，他觉得和尚们说来说去都是空的，没有一样可以兑现，于是决心禁灭佛教。

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周武帝正式诏令禁佛，规定寺庙所有房产、土地、财物一律充公，用作军费；僧尼一律还俗，作工务农。该服劳役、兵役的，按律征调。僧尼听了，大叫“作孽”，可是圣谕已下，想再为僧为尼已经不可能，只好哭丧着脸各自回家去了。这样，劳力和兵源都充足了，老百姓的负担也轻多了。

经过改革的北周，老百姓确实感到比以前日子好过多了，国家逐年强盛，政权也日见巩固。原来北周地处西北，土地比较贫瘠，人民不如东南富庶，更不能和经济发达的南朝相比。经过周武帝的治理，此时北齐和南朝却又因为腐化而衰败，北周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占据着明显优势，使之得以一举灭齐，并直逼南朝，显示出虎虎生气。军事上的胜利跟周武帝善于带兵也很有关系，他纪律严明、赏罚公正，还能关心士兵。出征时，军队排列起来往往有几里路长，他却能从队伍排头查到最后，还能叫出各队将领的名字，让将领感到亲切，将领手下的兵士也感到光耀，愿意听他指挥，肯拼命杀敌。有一次，周武帝见有个士兵赤脚行军，就马上脱下自己的靴子赏给他穿，这又让士兵们念叨了好久。周武帝得了民心、军心，哪有不节节胜利的呢！就这样他统一了北方。

周武帝灭佛，开始时凭的是权力，可后来他发现僧尼们并没有心服，而

新近统一的地方也有大量寺庙，若不把道理说透，将来还会有麻烦的。于是，在攻下北齐邺都以后，就在那里开了一个论佛的大会，让大家都来听听，到底信佛有没有好处。他亲自到会，对大家讲：“你们知道造一座寺庙、建一座佛塔要花多少钱吗？可这些东西却一点用处都没有。有人说信佛可以得福，你们看到谁得了菩萨的福？那么多人烧香拜佛，可到头来还不是受苦受罪！快别信这一套骗人的东西了，我看应该统统灭掉！”来听会的人从来不敢想过这码事，深怕一想被菩萨知道了要罚下地狱，现在听周武帝一讲，还真感到是那么回事。这时，僧尼们可受不了了，乱嚷嚷道：“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周武帝知道他们就会这一套，便接着说：“父母养育子女，千难万苦，可出家人却抛弃父母，那心该有多狠？这叫天理难容！我就要订一条国法，让天下僧尼还俗，回去骨肉团聚，享天恩人伦之福。”

有个名叫释慧远的和尚，信佛的心志很坚，听周武帝要灭佛，急得什么似的，简直有点不顾性命了，他嘶哑着喉咙，拖着哭腔叫道：“陛下，万不可禁佛呀！不管是哪位尊者，得罪了佛，就会打入18层地狱受苦，永无翻身之日，您要三思而后行啊！”周武帝听了，觉得好笑，干脆答道：“只要对国家、对老百姓有益，就功德无量，就该上天堂。若是真有什么佛爷要打我入地狱，我也万死不悔！有什么可以吓人的呀！”释慧远又说：“陛下灭佛，百姓都不能信佛了，就都得下地狱，下了地狱，还有什么好处可说呢？”周武帝听他这么胡扯就火了，责问道：“什么地狱不地狱的？谁到过地狱？你到过吗？说呀！”释慧远被问得哑口无言，周武帝便向大家说：“今后可别再听这帮僧尼的滥调了，什么天堂、地狱、因果报应、死生轮回，全是他们编出来唬人骗人的呀！”从此，对灭佛的事就再没有人嘀咕了。

周武帝灭完佛，又统一了度量衡，还广开言路，任用贤才，北周也越来越富强了。

南朝陈主恋夕照

陈武帝的先祖在西晋末的永嘉南渡时迁居吴兴，很欣赏南朝的秀丽山川，认为陈氏必定会因为这山灵水秀而大为兴旺。到东晋咸和年间，朝廷实行土断法，陈氏于是成了吴兴籍人，世代相传，到了他父亲一辈，家世已日见衰落。

陈武帝倜傥风流，少有大志，喜读兵书，明达果断。有一次出游，夜宿客舍，梦见天幕裂开，从天上走下四个人来，他们身着红衣，手捧太阳，送到陈武帝口里。陈武帝心中一惊，醒来时还觉得腹中热烘烘的，于是心里常暗暗琢磨，认为这是天帝有意赐他福泽，从此便没忘记要实现欲当人君的目的。

他先在本乡当里司，后来到建康当油库史，接着升迁为当时梁朝宗室新喻侯萧映的传教。萧映走马上任广州刺史，他也跟着到了广州，因为帮助萧映镇压广州农民起义有功，不断受到重用，做到高要（今广东高要县）太守。

侯景乱梁，新任广州刺史元仲景与侯景勾结，背叛朝廷，陈武帝奉命讨伐，很快杀掉元仲景，并继续挥兵征伐侯景。陈武帝带兵从始兴（今广东韶关市）出大庾岭，沿赣江而下，经鄱阳湖到达湓城（今江西九江市），与王僧辩会师。他一路上高举讨侯旗号，得到人民支持，在粤、赣两省发展军队至3万人，装备了5000强弩、2000舟船，还贮积了50万石军粮，实力非

同一般。

当时，荆州一带缺粮严重，陈武帝拿出 30 万石粮食提供给荆州“王师”，从而大大鼓舞了荆州将士，战斗力自然为之大振。后来的破建康、灭侯景，陈武帝当论首功。

从侯景作乱到萧警荆州荒城称帝，南朝经济已彻底崩溃，世家大族的庄园也纷纷毁于战火，从而遭到致命打击，只剩下未经战乱的一小部分地方，那里的经济尚具实力，然而那里的地方豪强却乘势兴起，构筑坞壁，收买兵勇，剽掠劫夺，积聚财富，与朝廷抗衡。后来，陈武帝杀王僧辩而称帝，继而在江南民众的支持下肃清了欲图报复来犯建康的王氏余党，政权稍稍得以巩固。为了陈朝的生存，必须增强国力，于是他只能把目标放在笼络地方豪强方面，他采取了一系列封官措施，让豪强归顺新朝，并任其维持已有权柄，不加干涉。如封豫章（今江西南昌）熊昙朗为平西将军、永化县侯，封临川（今江西南城县）周迪为安南将军、临汝县侯；封晋安（今福建福州市）陈宝应为宣毅将军、官县侯；封新安（今浙江淳安县）程灵洗为安西将军、重安县公；封扶风（今四川郿阳县）鲁悉达为安南将军、彭泽县侯等。同时，对在梁朝时就支持或跟随他并逐步成为一方豪强的人物，如巴山新建（今江西乐安县）人黄法氍（音 qú）、始兴曲江（今广东韶关市）人侯安都、长沙欧阳颢（音 w i）等，也大加升赏，黄为镇西大将军、义阳郡公，侯为征北大将军、桂阳郡公，欧阳三兄弟分别为广州、交州、衡州刺史。而对一贯拥戴他的洗夫人则更是褒扬备至。

除封赏外，陈武帝还采取各种结好手段，如将女儿丰安公主赐嫁给留异的第三子贞臣、将陈宝应家族列为宗室等，形形色色，唯恐不周。

可是，不少豪强并不满足，往往继续扩展实力，对抗中央，拒不听命。陈武帝为求王朝平安，一再容忍，最后出于利益冲突的不可缓和，终于使用武力，先后剪灭了敢于对抗的熊、周、留、陈四大豪强，而对其余地方势力则仍作为支持力量加以利用，从而保证了政局的稳定。

本来，陈武帝还可以继续有所作为，尽管他的王朝只占有江南部分土地，而且经济困顿、百孔千疮，势如残阳，但是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毕竟显示出一些起色和光彩，给人们恢复经济带来一些鼓舞，然而上苍给他的时间毕竟太短，仅仅做了三年皇帝，就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了。

陈武帝的儿子陈蒨（音 qiàn）继位，他就是陈文帝。陈文帝承袭父志，力图恢复，在位七年，陈朝国力又见加强，可惜天命不永，天嘉七年（公元 566 年）病死宫中，其子 16 岁的陈伯宗继位，陈伯宗仁厚而懦弱，难以执政，其叔陈项便废帝自立，他就是陈宣帝。

陈宣帝在位期间，听信了北周“中分天下”的诱惑，于太建五年（公元 573 年）出兵讨伐北齐，这时北齐已衰乱到了极点，而陈朝则已见恢复，大军在吕梁（今江苏徐州东南）与齐兵一战，大获全胜，收复了淮南一带的全部失地。陈宣帝在旗开得胜、正应乘胜追击的情况下，一心想的是如何划淮而守，结果坐失大好时机，让北周武帝宇文邕（音 y ng）轻而易举地灭了齐国，实现了统一中原的目的。

这时，陈宣帝才似乎明白北周假手于他的计谋，心中不平，于是发兵争夺徐、兖，未曾想北周并非北齐，太建十年（公元 578 年）陈朝攻打彭城的水军 3 万人遭到北周拦截，全军覆没，主帅被擒，只有数千骑兵在骁将萧摩诃的指挥下，乘夜突围南归，淮南一带又被北人占领，陈朝好不容易才积累

起来的一点力量也因此而消耗殆尽，只有等死的命了。

凑巧的是北周武帝宇文邕还没来得及南下灭陈，就突然病亡，继位的宣帝宇文赟（音 y n）荒淫暴虐，胸无大志，根本没有出兵灭陈的统一意图，两年后周宣帝又死，再继周位的静帝宇文阐只有 8 岁，大权落在外戚杨坚手里，杨坚则忙于取代北周称帝，大杀宇文宗族，引发战事，等到他平定内部，废周建隋，又忙于新政权的巩固。这样一折腾，十年的时间就匆匆过去了，陈王朝才得以苟延残喘未致灭亡。

太建十四年（公元 582 年），陈宣帝死。次年，宣帝的儿子陈叔宝继位，陈叔宝是个荒淫奢侈之极的皇帝，经他醉生梦死地一番折腾，陈朝的大限终于到来，从此残阳西坠，余光尽收。历史上称他为陈后主，后世的人们一直把他作为亡国的典型加以评说，其中的教训还的确十分发人深醒哩。

错将臭草当栋梁

宇文邕振兴北周，一帆风顺，正准备兴兵南下，以图早日一统中华。可是，他担心北方重又兴盛的突厥国趁虚而入，到那时，岂不要腹背受敌了么？为消隐忧，他决定先平突厥，再行伐陈。

北周宣政元年（公元 578 年）五月，周武帝亲率大军，兵分五路，浩浩荡荡北上，可惜天不助人，师出不远，两军还未交锋，宇文邕便身患重病，只好下令退兵，结果在归途的辇车上，这位 36 岁的有为之君便命丧黄泉。

临终之际，周武帝为继承人的事很费踌躇，尽管他平日对儿子们管教甚严，但小的太小，大的两个又不争气，想来想去，还是按惯例让长子接了皇位。

周武帝的长子宇文赟（音 y n）确实是不肖之子，而次子宇文宪倒并非如乃兄一样，只可惜武帝错将劣材臭草作栋梁，以致毁了北周基业。

宇文赟为人心术不正，更兼荒淫狂乱，为太子时，就以酗酒作恶而善掩饰为人所忧。周武帝出丧，他毫无悲色，反怨其不曾早死。继位之后，第一件事便是掐断手足之情，杀了他的亲弟齐王宇文宪，接着又杀掉忠正直言的内史中大夫王轨、逼死宗室重臣宇文神举和宇文孝伯，同时将迎合他为非作歹的郑译、刘昉等辈起用宫中，参掌机要。

宇文赟见周武帝死得突然，误认作是灭佛的报应，于是下令恢复佛教，还自以为做了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而得意非凡，日后必有神灵护佑，因此便更加放纵，绝无顾忌。他是一个嗜酒如命之徒，从此无日不在醉乡。一天，宫伯下士杨文祐忍不住想劝谏一下，便利用童谚在席前唱道：“朝亦醉，暮亦醉，日久恒常醉，政事日无次。”宇文赟听后大怒，将他活活责打致死。有此为鉴，朝中便再无人肯开口了，而宇文赟倒高兴起来，越发任性而为，干出许多荒淫之事。

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选美，凡稍有姿色的女子，不计数量，一律纳入后宫。接着下诏，规定仪同以上职务的官家闺秀，不经他过目选刷，不得随便嫁人。他只要一进后宫，往往十天半月不出来，朝廷大臣有事求见不得，只好通过宦官转陈。

他还制定了一条极其荒唐的法令，规定除了宫人以外，国中女子只准乘坐无帐幔的木轮车，不得敷粉画眉，统统黄眉墨妆。

周武帝当年用重刑整治贪风的《刑书要制》，他却嫌定罪太轻，重新颁

布了一部苛刑峻法的《刑经圣制》，规定宿卫之官，一天不值勤便削除职务；逃亡者处死，并抄灭家口；凡施刑杖，无论所犯之罪何其轻微，一律以 240 下为起点。《刑经圣制》颁布后，上自公卿、内及后妃，很多人因为一点事不合他意，就被打得死去活来，搞得内外恐惧、人人离心，而他却很得意，觉得小施威虐，便已把所有人都慑服了。

宇文赟对国事全不放在心上，在即位的次年，就将帝位传给 7 岁的儿子宇文衍，自己做太上皇，称天元皇帝，所居宫殿改称天台，所颁文书称为天制、天敕。这个 21 岁的太上皇，住在金玉珠宝装饰的宫殿里，还嫌不够极丽穷奢，又下令营造更为壮丽的洛阳宫；他日用饮食的器皿已经天下无双，可他仍觉得不算尊贵，竟强令用祭祖的祭器来替代；他还严令凡是被允许入见的官员，每次朝拜太上皇都得斋戒三日，如敬神一般；他所用的车旗仪式，又必须是前朝帝王的三倍，表现得出奇的狂妄。甚至于立皇后也与其它任何帝王不同，一立就是五个，有天元大皇后杨氏、天大皇后朱氏、天中大皇后陈氏、天右大皇后元氏、天左大皇后尉迟氏，而这些皇后再加上后宫无数嫔妃，都不过只是他一时的玩物。就说尉迟氏，原来是祖辈西阳公宇文温的儿媳，因为长得有几分姿色，就被他召入宫中陪酒，然后强行奸淫，尉迟氏的丈夫杞国公宇文亮得知消息，便反出北周，而宇文赟却毫不在乎，干脆将尉迟氏立为皇后。

他从不谈治国之事，每天变着法子玩乐，一会去天兴宫，一会上道会苑，观赏散乐杂戏鱼龙烂漫之伎；或者令京城少年，穿着女人服装，打扮起来带入后宫，让后妃观看取乐。

宇文赟就这样折腾了两年不到，就精力耗尽，一病不起，于公元 580 年死于宫中，这时他的年龄是 22 岁，他那已经坐在皇帝宝座上的儿子静帝宇文衍也只 8 岁。

8 岁的孩子懂得什么，朝政得由大臣辅佐，从此北周大权一下子落到左大丞相隋国公杨坚手里，杨坚是周宣帝宇文赟的天元大皇后杨氏的父亲，于是朝廷内外，全由杨家主宰。

杨坚是很有心机的人，他以汉人执掌鲜卑宇文氏的朝权，深怕北周皇室在外面作藩镇的“五王”乘机发动兵变，便隐瞒了宇文赟的死讯，只说“五王”之一的赵王宇文招的女儿千金公主主要嫁给突厥可汗，将“五王”召回京城，囚禁起来，然后将“五王”和周明帝宇文毓、周武帝宇文邕的儿子陆续杀绝。只剩下宇文泰的外甥、相州总管尉迟迥还在京外，极有权力，杨坚派亲信韦孝宽去接替他，被他识破，起兵反对杨坚。接着，郟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起兵响应。三方兵起，整个北周有一半不为杨坚控制，汹汹鼎沸的声势，把杨坚推到十分危险的境地。

杨坚一方面调集兵力，应付三方叛乱；一方面革除苛政，笼络人心。经过四个月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全局性的胜利，稳定了政局。大定元年（公元 581 年）二月，杨坚废了周静帝宇文衍，将他改封为介国公，迁出宫中，不久便加以杀害。从此，杨坚代周称帝，国号隋，他就是隋文帝。

隋文帝登基，少数族统治了两百多年的北方大地又一次成了汉人政权。杨坚利用周武帝创下的坚实基础，整顿军队，理顺朝政，准备南征。

北周大定八年，也就是陈后主祯明二年（公元 588 年），隋文帝派他儿子杨广和大将贺若弼、韩擒虎统率大军，向江南陈朝杀来。

亡国之音弥后庭

陈叔宝做了皇帝，一时酸甜苦辣涌上心头，回想当初陈宣帝驾崩宣福殿，他正俯伏痛哭，以表哀悼。忽觉颈部剧痛，还没闹清怎么回事，只听身后众人已经大乱，原来是二弟始兴王陈叔陵用剗药刀暗算他，要趁先帝尸骨未寒抢夺皇位。幸亏太后来救，又得乳母将他拉起，挣扎脱身，躲入后宫，养伤于承香阁内。陈叔陵行刺未成，刀被夺下，匆忙逃回东府，聚集到 1000 人马，试图顽抗。结果被右卫将军萧摩诃击溃，丧身刀下。

经过这番惊吓，陈叔宝对朝政的凶险深怀厌恶，而他本人又是个生性荒淫的主儿，因此越发迷恋后宫，纵情享乐。特别是宠姬张丽华，貌若仙姬、聪慧无双，承香阁中温情绵绵，令他如饮醇醪，一刻也舍不得离开。另外还有一个孔贵人，长得十分乖巧妩媚，也是个惯于撒娇、极其得宠的角色。当然，后宫佳丽如云，个个争着讨好陈叔宝，把个昏淫君主逗得心痒痒的，整天醉生梦死还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管理国家大事？

为了玩得更痛快，更自在，陈叔宝嫌原有的宫殿不够气派，当即降旨有司，火速大规模营造更加高大的宫殿楼阁，至于大兴土木要耗费多少银钱，国库是否因之空虚，细民能否承受，这一切他是连想都不会想一下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拍马屁的小人从来就不曾绝种，于是，时隔不久，一批侈靡的建筑物就耸立起来了，其中尤其以三阁最为壮观，这三阁建在光照殿前，各高几十丈，直插云天，每座楼阁内又有几十间华屋，屋里的窗牖、壁带、悬楣、栏杆选用清一色的上等沉檀香木制造，还镶上金玉珠翠加以装饰，光艳极了。再配上珠帘、安上宝床宝帐，所有物品无一不瑰奇珍丽，实在是近古以来，见所未见的。大量的沉檀香木和金玉翠珠，使得微风一吹，就能香闻几里之外；朝日一照，立见光耀后庭。同时，还在阁旁积石为山，引水为池，种下奇树，植上花药。

陈叔宝见了大喜，亲自为三座楼阁命名，一座叫临春阁，他就搬到那里居住；一座叫结绮阁，给最宠爱的贵妃张丽华住；再一座叫望仙阁，让孔贵人和龚贵人居住。三座楼阁有复道相连，往来十分便捷。众姬之中，还有王美人、李美人、张淑媛、薛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也轮番应召到阁上侍候游乐。

皇帝不理朝政，几个大臣当然也不去公干，像尚书令江总、孔范就经常在阁中作陪。这些人在一起想尽心思吃喝玩乐。陈叔宝最喜欢的游戏是让张贵妃、孔贵人等一群爱姬夹坐在他左右，叫文士江总、孔范等一帮学士充当妍客，摆上精美食品，边吃边赋新诗取乐，互相赠答，你唱我和，不择日夜。然后选出最艳丽的篇章，配上曲子，叫上成千的美女演奏，其中皇帝御笔自然唱得最欢，经常酣歌醉舞、通宵达旦，闹得无休无止。

这些曲子唱的什么呢？无非是描写张贵妃、孔贵人如何可爱，如何美丽动人、光艳夺目。像陈叔宝的《玉树后庭花》就写道：“丽宇芳枝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还，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还有什么《临春乐》呀、《美人昼眠》呀，甚至连《变童》都写进诗里，还厚颜无耻地拿出来唱，真叫人恶心极了。

为了满足宫廷的奢侈需要，官员们必然加剧对老百姓的搜刮，赋税的繁重、刑罚的苛暴，都达到空前的程度，谁要稍有违拗，马上打入大牢，随时可以夺去性命。因此，小小一个陈朝，户籍一下子减少到前朝的一半，人口

数则只剩三分之一，也就是说，50万户的200万人，要养活一个庞大的寄生集团，负担高出以往的十倍。

朝廷中一些正派的大臣看着皇帝这样胡来，非常担心，都希望有机会进言规劝。可是皇帝不上朝，他们只好一次次上奏章，又多数被倖臣压了下来，等于白写。有一次，不知怎的，或许是陈叔宝玩腻了，竟拿起了大臣章华的奏本，他一看，脸色都变了，气得七窍生烟。原来章华在奏本上写道：“陛下即位已数年，不思先帝创业之艰，也不知人心之可畏，只知饮酒作乐，宠玩嫔妃。置功臣名将于不顾，偏信献媚小人。如今北朝杨广大军随时可至，若再不改过，必亡国无疑。”陈叔宝当即下令，命人以犯上之罪，将章华处死。他愤愤地说：“看谁再敢胡言，以章华为例。”

直臣傅縡（音 z ng）可不吃这一套，他宁肯为国而死，也要为民请命，于是又上了一本，写道：“陛下酒色过度，任用小人，对忠臣如仇敌，视万民如野草。宫中妾婢身着拖地长绣裙，厩里马肥得连豆料都不想吃，而百姓却流离失所，无家无业，饥不得食，死不得葬，以致抛尸荒野、惨不忍睹。如此下去，必遭天怒人怨！众叛亲离，陈朝必亡！”陈叔宝看了，拍案大怒，可又怕再这样杀下去，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于是装出一付宽宏大量的样子，派人告诉傅縡说：“你能改过吗？若肯改过，可以免罪。”傅縡回答道：“吾心如吾面，若面目可改，心方可改。”坚决表示志不可易。结果还是遭了昏君的毒手。从此，大臣们算是对昏君绝望了。

陈叔宝依然我行我素，抚着张丽华又黑又亮的七尺长发，欣赏那顾盼神来的乌眸，似乎进入神的境界。张丽华则飘若仙姬，善于察言观色，又才辩过人，记性极佳，以致皇帝连处理政事也必须将她置于膝上，让宦官蔡脱儿、李善度禀报，一切听凭贵妃裁决。这样一来，阉宦奸佞之徒趁机内外勾结，转相引进，把个朝政搞得乌烟瘴气，一时贿赂公行、赏罚无常，整个儿乱了纲纪。

开皇七年（公元587年），隋文帝杨坚灭了萧警的梁国；第二年，调兵51万，以杨广为统帅，准备渡江灭陈。消息传来，将军们都认为光靠边境这点儿守军无法抵挡，非得朝廷火速增派战舰和大军驰援方可保全。于是，军情警报像雪片儿送到京城。陈叔宝不理国政，掌管机密要事的大臣施文庆、沈客卿深知昏君的脾气，不敢贸然禀报，可又怕将来不好交待。想来想去，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告急文书递了进去。

幸好这次皇帝没有发脾气，只是若无其事地说道：“无须如此大惊小怪，我陈朝边将一以当十，足可抵挡敌军。从前北齐三度来攻，北周也二次进犯，不都大败而去了么？这次隋兵来了，必定送死无疑！若依奏增兵调舰，岂不令万民惊慌。没事了，大家快去吧！”说完，得意一笑。宠臣们在一旁听了，也跟着七嘴八舌地嚷嚷道：“是呀！圣上明决，隋兵决不能渡过天险，除非胁生双翼！”孔范更是恬不知耻，故作风趣地讨好道：“这都是守将贪功，欺骗圣上，故作危言，慌报军情。我也总嫌官小，若是隋军真敢渡江，我也可以上阵立功，当个太尉什么的了。”陈叔宝一听就乐，说声：“再莫言战争，免扰我雅兴，还是饮酒作诗听曲观舞要紧。”于是，昏君佞臣、宠妃爱姬继续歌舞饮宴，一点儿也不把隋军南下当成一回事儿。

几天之后，军情更为紧张，守卫将士见对江敌军烟尘冲天，陈朝江防危在旦夕，只好再修告急文书，据实陈奏，请求增援。陈叔宝这次才有点着急了，向宠臣们询问破敌良策，这帮只会吹吹拍拍的滥官，全哑了口。再召朝

中大臣们问计，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争论来争论去，谁都拿不出一个万全之策来，因为陈朝已经病入膏肓，即使天人下凡，也无计可施了。

祯明三年（公元 589 年）初，陈叔宝玩得晕沉沉的，直睡到次日午后才醒，接到紧急军情报告，说隋军大将贺若弼、韩擒虎已率大军分别自广陵、横江直渡京口、采石。陈叔宝这才急了，速命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并振振有词地训示道：“我要御驾亲征，驱除敌寇，众卿可献计立功！”大臣们听了，面面相觑，哭笑不得。这时，隋军已兵临建康城下，如秋风扫落叶，直逼皇宫而来。

隋军灭了陈朝，却不见陈叔宝，知他逃不出宫外，找到殿后，见有一口水井，朝井中一看，黑乎乎的，可能藏人，于是有人诈问道：“里面有人吗？否则我们要扔石填井了！”原来陈叔宝果然藏在井里，井水很浅，淹不着人。陈叔宝是个怕死鬼，唯恐石头真的砸下来，那可活不成了。不得已，忙在里面喊道：“里面有人，别扔石头！”隋军放下绳索，让下面系好，几名力士使劲往上扯，这才把昏君拉了上来。扯的人却说：“这皇帝怎么这么肥？”扯上来一看，才见原来是湿漉漉泥泞泞的三个人捆在一块儿，另两个就是他最宠爱的张贵妃和孔贵人。不知是谁骂了一句：“哪有这种人，跳井还忘不了美人，真是淫鬼！”

陈叔宝降了隋朝，被押到长安，后死于洛阳，葬在芒山，走完了可鄙的人生历程。隋文帝一统大业，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从此宣告结束。

